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六篇 目录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开辟革命征程

目录

第一章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一节 坚决回击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

第二节 要时刻警惕中间派突然倒戈

第三节 防止极左思潮的干扰

第四节 分清敌我掌握大方向

第二章 文革后的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

第一节 经济发展水平下降

第二节 经济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第三节 政治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第四节 文化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第五节 社会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第三章 高举马列毛主义的伟大旗帜 开辟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征程

第一节 当前中国社会的国际环境——外部矛盾

第二节 当前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性质

第三节 当前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

第四节 当前中国社会的革命任务——方向目标

第五节 问题讨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开辟革命征程

概述

本篇试图总结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现实，探寻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壹，关于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非常丰富，这里只列举了四个方面：

一、坚决回击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同右派势力的激烈斗争中走过来的。

大的斗争经历了八次：

第一次，一九六五年五月至一九六六年四月，同彭罗陆杨的保右反左的错误倾向的斗争，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

第二次，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三次，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一九六八年二月，同叶剑英、谭震林的二月逆流的斗争，批判二月逆流；

第四次，一九六八年三月至一九六九年二月，同林彪分裂活动的斗争，这一次没有识破林彪的阴谋，错误处理了“杨傅余”事件；

第五次，一九七〇年九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同林彪集团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斗争，开展批陈、批林运动，清查与林彪反革命活动有关的人和事；

第六次，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同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第七次，一九七五年一月至一九七六年四月，同邓小平、叶剑英的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第八次，一九七六年九月，同华国锋、叶剑英的军事政变的斗争。

前七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第八次是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失败了。

每次斗争出场的人虽然只有那么几个,但是,在他们的背后却站着一个强大的势力,这其中有八大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的部长主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地委书记,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中的相当大的数量。

毛泽东主席说:对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主要指的就是这些人。

(二)右派势力的社会基础

右派势力为什么如此顽强,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阶段上的社会基础决定的。

1,从经济基础来看:

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

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

2,从上层建筑来看: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

3,从共产党内的情况来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成长起来的县以上领导干部,许多人都是抱着民主革命的思想,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并不牢固。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

给他带来某种利益, 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 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 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 对不起, 让别人去干吧, 我已经到站了, 该下车了。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 这些人又不注意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相当大一部分县以上领导干部逐步形成官僚特权思想, 对群众起来批评自己, 抱着强烈的抗拒情绪。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 一是不满意, 二是要算账, 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4, 共产党内右派势力的阶级属性

右派势力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 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

右派势力还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 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 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

(三) 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对右派势力的认识有一个提高的过程

1, 建国以来党内的矛盾有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

2, 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

3,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教育干部和群众提高对走资派和复辟危险的认识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右派势力代表着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 发动猖狂的进攻。右派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是党内的也是社会的主要危险。广大劳动人民、广大党员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 是社会的也是党内的主要矛盾。

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右派势力的斗争, 焦点在于把被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到人民手中、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来。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 上海等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形式, 把被走资派篡夺的那一权力夺回来了。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在新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核心中，还进来了个别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还进来了一些没有基本转变立场的领导干部。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又发起新的进攻，夺取新的权力。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右派的一次次进攻，保持着高度警惕，每次都即时打击，并取得了胜利。毛主席逝世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无产阶级革命派非常不利。由于中央的革命派领导人对右派发动军事政变的危险缺乏足够的警惕，也没有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导致斗争的失败。

二、要时刻警惕中间派突然倒戈

（一）中间派在文化大革命中起过一定的有益作用

这里所谓的“中间派”，指的一批文革前犯有走资派错误、文革中逐渐转变立场拥护文化大革命、并参加革命委员工作的领导干部。

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曾经表示过拥护文化大革命，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担负重要的领导职务，做了大量工作。

这些人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有的人甚至政治立场也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

（二）中间派的右翼在紧急关头与右派合流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突变。中间派的右翼为了夺取权力，阴谋把革命派打下去，与右派合流。

（三）中间派右翼在政变后形成的新贵集团在出卖文化大革命成果中起了重要作用

他们从中央到地方主持逮捕、清除、批判、审判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革命派。

他们从中央到地方同意为叛徒、特务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翻案平反。

他们从中央到地方同意审判所谓的江青反革命集团。

他们从中央到地方同意《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新贵集团中的一些人至死都不肯承认叛变革命的罪行。

（五）要时刻警惕中间派突然倒戈

在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中，要注意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与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以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与犯有走资派错误的领导干部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在文化大革命中，争取、团结犯有走资派错误的领导干部，在他们有了觉悟、表示悔改以后，把他们结合到中各级革命委员会中、选进各级党的委员会中，这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在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任命华国锋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绝不是像后来右派宣传的那样——毛主席把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毛主席不可能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中央政治局也无权决定谁继任中央主席），而是作为一个过渡步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由右派转为中派，应该说对革命派更为有利。但为什么不直接转到革命派的手中，如王洪文或张春桥甚至江青？这需要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个人的因素。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以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中间派右翼突然倒戈，迅速与右派合流，这恐怕是革命派事前没有预料到的，也缺乏这方面的警惕，结果在突然袭击来临时只能束手待毙。这个历史教训极为深刻，革命的人们应该牢记不忘！

三、防止极左思潮的干扰

（一）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多次干扰斗争的大方向

- 1，运动初期，极左思潮漫延，形成一股打倒一切的风潮
- 2，运动兴起，群众组织中小团体主义思潮漫延，形成一种全面内战的态势
- 3，运动转折，一些人提出“打倒周恩来”“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斗争矛头发生了转移
- 4，运动深入，一些人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恶性膨胀，抢夺武器弹药、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
- 5，革委会建立以后，一些人提出“反复旧”的口号，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革命委员会

（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错误思潮产生的社会基础

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的社会基础，是由于在造反派中各种市民、游民、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学生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

（三）斗私批修，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

1，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广大的劳动人民、劳动知识分子、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但是，从意识形态领域来说，每一个人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每一个人都要在自己的思想中进行一场斗私批修的大革命，否则，你就当不好革命的动力，也当不好革命的对象。

2，从领导干部来说，并不说凡是领导干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对象。但是，从群众运动来说，群众起来揭发批判的时候，不可能等到对每一位领导干部作出结论以后，才允许群众揭发批判。只能是在群众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再作出结论。群众提出的意见，有些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的，有些可能是部分错误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作为组织来说，要经过调查分析研究才能作出，结论。作为被批评的领导干部来说，也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群众的批评。这就是要斗私批修。只有斗私才能破除私心杂念，只有批修，才能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有些领导干部由于采取了正确态度，很快由“对象”变成了“动力”，与群众结合在一起。有些领导干部由于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老是与群众闹对立，最后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3，从群众来说，并不是说凡是群众就是天然的革命派、造反派。

群众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对起来造反的人看不惯、甚至于反对。

参加造反的人也需要作阶级分析：有的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有的人站在个人利益的立场上造官僚主义作风的反，有的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造工人阶级的反，有的人站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立场上造人民民主专政的反。这后面两种当然是极少数。

即使是站在正确政治立场上的人，也难免带有个人的私心杂念以及其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都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甚至于恶性膨胀。

这种“全身浮肿，头脑膨胀”的情况，不是仅仅体现在个别人身上，而是在群众组织的头头中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这种情况恰恰说明：他们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距离一个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要求，还相当远。而他们自己恰好缺乏的就是这种自知之明，不能自觉地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清除头脑中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

四、分清敌我掌握大方向

（一）对错误思潮的处理，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一九六九年，把王、关、戚与“五·一六”联系起来，矛盾的性质也发生了转化，由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

2，后来，又把杨、余、傅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后台，这就更加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3，一九七〇年三月，又加了一个肖华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后台。

4，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运动由清查“五·一六”组织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转向清查重大反革命事件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而且，这些所谓的“重大反革命事件”，除了中央定的“火烧英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外，其它都是由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自己说了算。这样，把群众性的极左的、盲动的、无政府主义事件，看成了反革命事件；把有关的甚至无关的责任人，看成了“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把参加了有关活动的人，当成了嫌疑犯。围困中南海，“火烧英代办处”，因这两件事，作为清查对象的、进“学习班”的、受到“帮促”的、被“揪斗”的有成千上万的人。

5，1970年11月，蒯大富当选为四届人大代表，到北京出席代表会，清华大学党委对他进行隔离审查，说他是五一六分子，而且发展了几百人。一直到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打算放他回去，后来一直拖到一九七三年才把他放到北京市的一个工厂监督劳动。

（二）清查“五·一六”运动，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1，混淆了大是大非，把群众的造反行为，作为反革命行为，造反有理变成了造反有罪。

2，大批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群众代表，被以各种名义清除出革委会。

3，大批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支持造反派的革命领导干部，被以各种名义清除出革委会。

4，社会上出现一种新的舆论：参加造反、支持造反都不会有好下场！造反派中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甚至倒向右派一边。

5，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后，右派又抓住这些所谓反革命事件，栽赃到左派领导人身上，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

贰、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

一、当前中国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1，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早已不复存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消失。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搞垮以后，正在逐步恢复。

世界资本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之后，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它们曾经预言这是历史的终结。很快就暴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

当前的世界形势仍然是划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的两霸在苏联瓦解之后，只剩下美国一家独霸世界；第二世界增加了俄罗斯、东欧一些国家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印度、巴西；第三世界仍然处在分裂混乱状态，遭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当前中国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2，现今的中国对国际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外来资本，具有很大的依附性。但这种依附，不是殖民地依附，而是工业-金融依附、工业-技术依附。

同时，它也正在逐步向外扩张，特别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它具有很大的依附性。

现今的中国既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也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中等发达的、对主要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具有相当大的依附性的、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国家。

3, 当前的中国在外存在着复杂的的矛盾, 包括与美国的矛盾、与第二世界各国的矛盾、与第三世界各国的矛盾、与周边各国的矛盾, 等等。

其中主要矛盾是中国与美国的矛盾。这个矛盾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是中国各族人民同美国帝国主义的矛盾。

4, 当前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是相互联系的

从世界范围的人民革命来说, 头号的敌人无疑是美国帝国主义, 它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 它支持各国的反动派, 镇压一切人民反对剥削阶级的、一切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

从一国人民的革命来说, 头号的敌人是本国的反动统治阶级, 除非外国帝国主义直接出兵, 侵占本国的领土, 支持本国的反动统治阶级, 剥削压迫本国的人民, 镇压人民革命, 促使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使它们自己成为被侵略国家的头号敌人。

中国人民的革命与世界人民的革命是相互联系的。

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世界人民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现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1, 当前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包括以下几种:

1)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是指那些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演变而来, 挂着“国有经济”招牌, 具有垄断性、收益特大的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这些国企实际掌握在官僚、国企的高级管理人员中, 他们不仅享受高薪、股权, 而且可以运用这些资本谋取私利。这种经济既为其他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服务, 又与其他经济成分争利。在现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中,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居于主导地位。

2) 民企资本主义经济

主要是由民间人士举办的中小型企业。在现阶段, 民企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 对发展生产力、缓解就业压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 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 它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外来资本主义经济一起, 排挤、搞跨了社会主义经济。

3) 外来资本主义经济

第一，外来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了中国的“国有”银行以及其他国有金融机构。

第二，外国垄断资本实体经济企业，以各种形式大批转移到中国，利用中国特有的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和中国政府给予外资的特别优惠条件，以及它们本身具有的资本、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对中国企业不断进行参股控股，由产业并购而产业替代，在中国国民经济体系逐步形成优势地位。

第三，中国工业产品销售的外贸依存度高达 66.9%，超过那些国民经济立足于外贸的国家和地区。

外来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以及就业的好处，但是也挤占、甚至在某些行业垄断了中国的市场。并且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民企资本主义经济一起排挤、搞跨了社会主义经济。

4) 农村和城市的小私有经济

这种个体小私有经济正在日益分化，其中大多数日趋贫困破产，极少数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

社会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因此，现今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

2、当前中国社会由以下几个阶级构成

1) 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中包括：

a, 官僚资产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是掌握国家政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从总体上控制着国家的所有资产。（县团级以上的各级党政军的官员）。

他们是由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集团，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和美帝从内部摧毁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在毛主席逝世之后，篡夺了党和国家的全部权力，演变而成的。所以，它的行动多以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两面手法进行。他们大搞私有化，出卖国企，通过物权法。他们具有极大的买办性，疯狂地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b, 国企资产阶级

国企资产阶级是管理“国有企业”生产资料实际所有权的高层管理人员。

他们以高薪、股权的形式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对企业的支配权、管理权。

c, 民企资产阶级

现中国的民企资产阶级是现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以“国退民进”、“招商引资”、“能人创业”等政策，官商勾结，扶助起来的，和官僚资产阶级一起摧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以，现中国的民企资产阶级与生俱来就带有明显的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反动性。民间资本主义企业对工人剥削的残酷性，也十分突出，臭名昭著的“黑”字号煤窑砖窑和包身工，都出在官商勾结的民营企业里。 现中国民企资产阶级无论人数和经济实力都远远大于当年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其中很多人都已是执政党的党员、干部，不少人已经开始以专家身份进入国家和地方政权机构。 在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大方向上，官僚资产阶级和民间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具体的经济、政治权益上，官僚资产阶级对民间资产阶级主要是扶助，利用，勾结，但也有限制侵害的一面。民间资产阶级对官僚资产阶级主要是依赖，利用和勾结，但也有抵制争夺的一面。 d, 外来资产阶级

外来资产阶级包括港澳台来大陆投资的资本家以及其它国家来华投资的资本家。

e, 买办资产阶级

他们是有权与外资企业进行交易并从中谋取暴利的中方人员以及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的外方中籍高级管理人员，以高薪、股权的形式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对企业的支配权、管理权。

f, 黑恶资产阶级

他们打着合法企业的幌子，实际干着非法的活动——贩卖毒品、贩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赌博、走私、欺行霸市、打家劫舍，等等。

2) 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中包括

a, 现代产业工人

b, 公司职员

c, 农民工

3) 农民及个体劳动者阶级

其中包括

a, 农村个体劳动者

b, 城市个体劳动者

4) 知识分子阶层

其中包括:

a, 官僚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b, 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c,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d, 劳动知识分子

e, 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3, 当前中国社会阶级之间的主要矛盾

1) 当前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 包括地区矛盾、民族矛盾、生产矛盾、需要矛盾、阶级矛盾等等。其中主要的是阶级矛盾。

2) 当前中国社会阶级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3)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 重点是同掌握着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

4, 当前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 国家的统治阶级变了

占统治地位是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其他个体劳动者都成了被统治阶级。

掌握国家政权的是官僚资产阶级,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 政权的组织形式没有变, 但是它的功能变了, 它不再是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服务, 而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3) 现今社会的统治思想变了,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叁、当前中国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

一、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 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主要矛盾, 当前中国的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

二、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是当前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三、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革命的领导阶级，依然是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个体劳动的农民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劳动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应该争取的同盟军。

四、革命的任务分两步走：第一步，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恢复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第二步，对私有制、市场经济及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五、革命的形式包括积极开展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迎接政治斗争的新高潮，以及其他形式的斗争。

六、革命的政策既坚定又灵活：一切革命派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切爱国者在反对卖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在反对官僚腐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2012 年 8 月 22 日初稿

本篇全文约 11 万字

第六篇第一章第一节 坚决回击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一章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一节 坚决回击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

一、坚决回击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同右派势力的激烈斗争中走过来的。

大的斗争经历了八次：

第一次，一九六五年五月至一九六六年四月，同彭罗陆杨的保右反左的错误倾向的斗争，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

第二次，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三次，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一九六八年二月，同叶剑英、谭震林的二月逆流的斗争，批判二月逆流；

第四次，一九六八年三月至一九六九年二月，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处理“杨傅余”，开展反三右（右倾翻案、右倾复辟、右倾分裂）；

第五次，一九七〇年九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同林彪集团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斗争，开展批陈、批林运动，清查与林彪反革命活动有关的人和事；

第六次，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同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第七次，一九七五年一月至一九七六年四月，同邓小平、叶剑英的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第八次，一九七六年九月，同华国锋、叶剑英的军事政变的斗争。

前七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第八次是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失败了。

每次斗争出场的人虽然只有那么几个，但是，在他们的背后却站着一个强大的势力，这其中有八大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的部长主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地委书记，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中的相当大的数量。

毛泽东主席说：对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主要指的就是这些人。

二、右派势力的社会基础

右派势力为什么如此顽强，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阶段上的社会基础决定的。

（一）从经济基础来看：

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

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

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

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

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接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实行的是商品制度。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九七五年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

（二）从上层建筑来看：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

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

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三）从共产党内的情况来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成长起来的县以上领导干部，许多人都是抱着民主革命的思想，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并不牢固。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这些人又不注意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

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相当大一部分县以上领导干部逐步形成官僚特权思想，对群众起来批评自己，抱着强烈的抗拒情绪。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四）共产党内右派势力的阶级属性

右派势力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

右派势力还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

右派势力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

他们经常地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你要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他说这是反对党的领导。你要放手发动群众吗？他说这是搞无政府主义。你要夺走资派的权吗？他说这是反党篡权。

三、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对右派势力的认识有一个提高的过程

如果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能够识破右派势力的真面目，把它们孤立起来，事情就好办了。但是：

（一）建国以来党内的矛盾有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

- 1，一九五〇年，老区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农村出现了合作化的苗头，刘少奇反对山西省农村出现的生产资料入股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
- 2，一九五二年，刘少奇鼓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主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 3，一九五三年，薄一波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错误口号；中央召开财经会议；
- 4，一九五四年，高岗、饶漱石集团在党内进行非组织活动企图夺取更多的权力；七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 5，一九五五年，邓子恢大砍合作社，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
- 6，一九五六年，国际上发生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及波匈事件，国内右派蠢蠢欲动；中央报刊发表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 7，一九五七年，右派利用共产党整风，发动猖狂进攻，毛泽东主席领导全党反击右派；
- 8，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主席批评一九五六年刘少奇等人刮起的反冒进风，树立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刘少奇鼓吹共产风、冒进风；
- 9，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主席纠正共产风、冒进风，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乘机向党发起进攻；
- 10，一九六〇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队应该是生产小队，解决了农村人民公社的经济体制问题，并在经济建设中实行三年调整；
- 11，一九六一年，刘少奇鼓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困难还没有到底，经济上要退够，在农村搞包产到户；
- 12，一九六二年，毛泽东主席提出注意阶级斗争，反对包产到户，
- 13，一九六三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14，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反对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提出党内外矛盾交叉，在社教中搞神秘主义、人海战术，毛泽东主席提出主要对象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5，一九六五年，毛泽东主席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二）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

1，建国以来，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经过农村的土地改革、城市的民主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反右、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等等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思想上提高了觉悟，对共产党的领导更加拥护，对共产党的各级干部更加信服。

2，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一九五八年农村刮共产风，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扩大化，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二年的经济困难，这些事情，使一些人受到了伤害，使群众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但这些错误大都迅速得到纠正，得到群众的谅解。

3，一九六三年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广大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开始认识到在共产党内存在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一般都以为这就是指那些贪污腐化分子，很少人能认识到共产党的领导层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教育干部和群众提高对走资派和复辟危险的认识

1，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以后，广大党员干部及劳动群众都是积极拥护的。

但是，具体到各单位，当党委或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在群众中抓“右派”、抓“小三家村”时，就产生了分歧。一部分人拥护（这些人大多是党员、团员、和团结在原党委周围的积极分子），这部分人往往是多数；一部分人反对（这些人大多是政治运动中过去受到过打击或将来可能要受到打击的人以及同情他们的人）这部分人往往是少数。

2，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后，各个单位出现的上述分歧进一步发展，成为对党委、工作队及在它们领导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态度问题。一部分人拥护，认为这三者在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工作都是对的，认为应该相信党委、相信上级派来的工作队、相信经过群众选举出来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这部分人自认为是“左派”，被认为是“保守派”。一部分人反对，认为这三者在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中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的地方甚至提出“打倒三相信”的口号。这部分人自认为是“左派”、“造反派”，被认为是“右

派”、“反革命派”。

3，一九六六年十月，由于各单位的党委、上级派来的工作队都是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进行工作的，并且受到上级党委及其领导人的支持，这就涉及到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部委的党委及其领导人的责任问题。造反派主张对它们应该“炮轰”，揭露它们的错误，要它们承担责任。保守派认为“炮打”的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炮轰。

4，一九六七年一月，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造反派纷纷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结合一部分地方领导干部、军队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经党中央批准，代替原来的党政领导机构。这时，在党员和劳动群众中原来意义上的保守派就基本上不存在了。

5，一九六七年二月，中央领导层中发生了“二月逆流”，在它的影响下，一些省市的军区支左发生了偏差，把某些造反派打成了反革命，大规模逮捕人，甚至开枪打死人。

在这种新形势下，群众中又发生了的分裂。一些原来的造反派组织拥护军区支左，当然也包括军区把某些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这一部分组织自称为“拥军派”、被称为“保守派”。另一些组织反对军区把某些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这一部分组织自称为“造反派”，被称为“反军派”。

6，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至一九六八年底，经过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文革小组，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各省市自治区的两派对立的组织终于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7，一九六九年九大召开以后，中央作出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活动，反对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贪污盗窃）的决定。为了巩固革命秩序，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但是，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一些没有转变立场的领导干部，乘机对原来的造反派进行打击，形成一种“造反无好人”的社会舆论。

8，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四年，在全国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活动，中央在指导思想上有扩大化的倾向，各地混进革委会中不肯悔改的走资派乘机对文革中的革命左派骨干进行打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革命左派的革命造反活动说成是反革命阴谋活动，在群众中形成一种“造反无理，革命有罪”的社会舆论。

9，一九七〇年九·一三以后至一九七三年，在全国开展清查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各地混进革委会中不肯悔改的走资派，又乘机打击文革中的革命左派骨干和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把他们的革命造反活动，都说成是与林彪、陈伯达有牵连的反革命活动。

10，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中央的一些单位和部门，利用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在全国大搞批极左思潮，把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都归咎于极左思潮。造成一种反左不反右的社会风气。

11，一九七四年，中央号召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全国各地的革命左派奋起批判九大以后对革命左派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要求恢复革命左派在革命委员会中的权力。右派加以抵制，污蔑批林批孔的目的是批“周公”。

12，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实际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大搞“全面整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左派。十一月，清华大学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影响到全国。

13，一九七六年，中央号召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左派拥护，中派观望，右派抵制。四·五天安门事件，是右派组织的，真正参加闹事的人只有一小撮。

小结：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右派势力代表着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发动猖狂的进攻。右派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是党内的也是社会的主要危险。广大劳动人民、广大党员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是社会的也是党内的主要矛盾。

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右派势力的斗争，焦点在于把被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到人民手中、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来。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上海等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形式，把被走资派篡夺的那一权力夺回来了。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在新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核心中，还进来了个别死不悔改的

走资派，还进来了一些没有基本转变立场的领导干部。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又发起新的进攻，夺取新的权力。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右派的一次次进攻，保持着高度警惕，每次都即时打击，并取得了胜利。毛主席逝世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无产阶级革命派非常不利。由于中央的革命派领导人对右派发动军事政变的危险缺乏足够的警惕，也没有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导致斗争的失败。

2011 年 1 月 25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1 日修改

第六篇第一章第二节 要时刻警惕中间派突然倒戈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一章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二节 要时刻警惕中间派突然倒戈

一、中间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里所谓的“中间派”，指的一批文革前犯有走资派错误、文革中逐渐转变立场拥护文化大革命、并参加革命委员会工作的领导干部。在中央工作的如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等人。陈锡联是文革前的沈阳军区司令员，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华国锋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曾经表示过拥护文化大革命，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担负重要的领导职务，做了大量工作。当选第九届、第十届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华国锋这些人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有的人甚至政治立场也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

如华国锋，一九六七年在湖南的两派斗争中，虽经造反派多次做工作，他始终保持沉默。只到中央点名让他去北京，他才在上去北京的飞机前，发表一纸声明支持造反派。调中央工作后，他表面上紧跟革命派，其实内心对江张姚王等人“恨得要死”。

如吴德，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66年调北京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他“人在曹营，心在汉”，对文化大革命始终抱着敌视的态度。

如汪东兴，虽然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担任警卫工作，但一九六九后陷入了林彪反党集团，犯了严重错误，经过毛泽东的教育挽救，他自己作了假检讨，继续留在原岗位工作。实际上他的政治立场仍然是站在右派一边的。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主席又几次批评王张江姚不要搞“四人帮”，华国锋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革命派保持距离，向

右派靠拢。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向纪登奎、华国锋、吴德等人打招呼，让他们批判他，说，否则他们也站不住脚。他们几个人就搞假批判。

一九七六年一月，经毛主席提议由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取代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形式上看，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权由右派手中转到了中派手中，但此时的中派，已经由原来的表面上的中左变成了实际上的中右。

二、华国锋集团在逮捕革命派中的作用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突变。华国锋集团为了夺取最高权力，阴谋把革命派打下去，与右派合流。

华国锋集团由于得到元老中的右派支持而感到自己有成功的把握。

华国锋集团具体组织和实施了对江张姚王毛等人的抓捕及对各地各部门的革命派骨干的镇压。

有人说：“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应该承认华国锋是起了极为重要作用的。在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这场斗争中，叶帅的确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和许多中央老同志作了大量酝酿准备工作（详见范硕著《叶剑英文革“风云录”》），可以说华国锋与叶剑英是一同起了决定作用。由于华国锋当时所处的地位，是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主动与叶帅取得联系进行这场斗争，其决定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叶帅当时首先提议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等职务，并经政治局一致通过，就会是不妥当和不应该的了。”

就这场反对革命派的军事政变中所起的作用问题来看，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元老中右派势力如果没有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新贵集团的配合，他们要想搞政变或者军事政变，都只能是非法的，困难重重；有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新贵集团的配合，他们要搞政变或者军事政变，就可以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就顺利得多了。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新贵集团要搞政变或者军事政变，如果没有元老中右派势力的支持，他们就会受到左右两个方面的夹攻，也绝难成功。政变成功以后，华国锋首

先提出请叶剑英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也就是这个道理。

三、华国锋集团在出卖文化大革命成果中的作用

一九七六年十月，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以后，口头上他也表示要继续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提出“两个凡是”、“抓纲治国”，实际上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新贵集团，在出卖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上也起了极其重要的恶劣作用，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

华国锋主持逮捕、清除、批判、审判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革命派。

华国锋同意为叛徒、特务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翻案平反。

华国锋同意审判所谓的江青反革命集团。

华国锋同意《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华国锋集团中的一些人至死都不肯承认叛变革命的罪行

一九九九年，华国锋在与人谈话中还坚持认为，他一九七六年发动十月政变是完全正确的。二〇〇七年，他还出席了执政党的第十七届代表大会。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吴德死后，根据吴德口述整理出版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出版，表明了他死不悔改地坚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立场。

五、要时刻警惕中间派突然倒戈

在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中，要注意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与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以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与犯有走资派错误的领导干部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在文化大革命中，争取、团结犯有走资派错误的领导干部，在他们有了觉悟、表示悔改以后，把他们结合到中各级革命委员会中、选进各级党的委员会中，这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在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任命华国锋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绝不是像后来右派宣传的那样——毛主席把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毛主席不可能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中央政治局也无权决定谁继任中央主席），而是作为一个过渡步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由右派转为中派，应该说对革命派更为有利。但为什么不直接转到革命派的手中，如王洪文或张春桥甚至江青？这需要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个人的因素。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以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中间派突然倒戈，迅速与右派合流，这恐怕是革命派事前没有预料到的，也缺乏这方面的警惕，结果在突然袭击来临时只能束手待毙。这个历史教训极为深刻，革命的人们应该牢记不忘！

2011 年 2 月 14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1 日修改

第六篇第一章第三节 防止极左思潮的干扰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一章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三节 防止极左思潮的干扰

一、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多次干扰斗争的大方向

（一）运动初期，极左思潮漫延，形成一股打倒一切的风潮

一九六六年九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在党内和社会上，逐步形成一股极左的或形左实右的思潮，有人提出：“炮打九级司令部”、“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陶铸鼓吹“除了毛主席，一切人都可以炮轰”。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风潮。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林彪在接见革命师生的讲话中提出：要防止坏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些地方的走资派又利用这一口号打压造反派，攻击他们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再次发动“抓黑鬼”运动，把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打成反革命。一些地方的走资派煽动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反对起来造反的学生。

（二）运动兴起，群众组织中小团体主义思潮漫延，形成一种全面内战的态势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等地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夺权，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二月，右派在中央及各地掀起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流。在各地的夺权过程中，一些地方的军队支左人员，联合一部分造反派，攻击、镇压另一部分造反派。加之，在造反派内部由于小团体主义思潮漫延，唯我独革、以我为中心，造成造反派内部分裂，逐步形成一种全面内战的态势。

（三）运动转折，一些人提出“打倒周恩来”“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斗争矛头发生了转移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北京外语学院、钢铁学院极少数人成立“五·一六兵团”，不时贴出攻击周恩来的大标语、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北京群众组织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斗刘少奇的誓师大会。以此为开端，许多群众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参加的有四千多个组织 20 多万人，围困中南海，要求刘少奇滚出中南海。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中央报刊出现“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北京大专院校的一些人号召搞“第三次大串连”，到南京等地，串连当地的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枝弹药。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煽动夺外交部的权。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七千多人，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火烧了英国代办处。

（四）运动深入，一些人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恶性膨胀，抢夺武器弹药、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

一九六八年六月，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一些人破坏铁路交通，长时间不能通车；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武器，杀伤指战员。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群众组织头头下令，对开进该校的工人宣传队开枪，打死工宣队员三人，打伤多人。

一九六九年七月，在山西省的太原、晋中、晋南的部分地区，一些混在群众组织里的坏头头，蒙蔽一部分群众，抗拒中央发布的历次通告，组织专业武斗队，搞打、砸、抢、抓、抄；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口号；冲击军事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殴打、绑架、杀伤指战员；破坏交通，袭击列车，抢夺交通工具和旅客财物，危害旅客生命；抢占银行、仓库、商店，私设银行；用武力抢占地盘，残害人民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款；制造停工停产，煽动农民进城武斗。

（五）一些人提出“反复旧”的口号，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在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的支持下，山东省一些地区开展起了“反复旧”运动，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各级革命委员会和部队的领导人。

一九六八年六月，湖北、湖南等省的一些群众组织领导人，也搞起了“反复旧”运动。

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错误思潮产生的社会基础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指出：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

红军中还有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存在着。其表现如：一，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二，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三，军纪松懈，特别是打败仗时。四，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为。五，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的。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

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

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如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严重地干扰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

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所谓的“多中心论”和“以我为中心”。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人民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只能有这样一个中心，不能有第二个中心。全党、全军、全国必须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对毛主席的指示抱什么态度，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抱什么态度，这是一个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要不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当时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反扑的主要手段。如果不坚决打倒无政府主义，就必然会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种无政府主义既是对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也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桥梁。因此，必须把无政府主义思潮从工人阶级内部清除出去。

一九六七年六月，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的社会基础，是由于在造反派中各种市民、游民、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

三、斗私批修，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的

动力是工人阶级、广大的劳动人民、劳动知识分子、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但是，从意识形态领域来说，每一个人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每一个人都要在自己的思想中进行一场斗私批修的大革命，否则，你就当不好革命的动力，也当不好革命的对象。

从领导干部来说，并不说凡是领导干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对象。但是，从群众运动来说，群众起来揭发批判的时候，不可能等到对每一位领导干部作出结论以后，才允许群众揭发批判。只能是在群众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再作出结论。群众提出的意见，有些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的，有些可能是部分错误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作为组织来说，要经过调查分析研究才能作出结论。作为被批评的领导干部来说，也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群众的批评。这就是要斗私批修。只有斗私才能破除私心杂念，只有批修，才能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有些领导干部由于采取了正确态度，很快由“对象”变成了“动力”，与群众结合在一起。有些领导干部由于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老是与群众闹对立，最后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从群众来说，并不是说凡是群众就是天然的革命派、造反派。

群众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对起来造反的人看不惯、甚至于反对。

参加造反的人也需要作阶级分析：有的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有的人站在个人利益的立场上造官僚主义作风的反，有的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造工人阶级的反，有的人站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立场上造人民民主专政的反。这后面两种当然是极少数。

即使是站在正确政治立场上的人，也难免带有个人的私心杂念以及其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都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甚至于恶性膨胀。一个北京市高等院校的原造反派头头在总结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从我个人能力、资历来讲，或者说与当时同龄人比较，可能比一般同学稍微强一点，但和我处的地位来讲太不相称了。一下子在这么大的清华大学掌权后，我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就是毛泽东后来批评我的“全身浮肿，头脑膨胀”。

那种自我膨胀，那个时期都难以想象啊。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上，杨成武

把许世友带过来，介绍给我和韩爱晶，他说这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我是第一次看到许世友，黑黑的，有一个金牙，个子矮矮的。而许世友见到我们，一个立正，给我们敬礼啊！我们都感到很震惊啊！我说，许世友司令员，我们知道您。那时作为身经百战、忠于毛主席的老将军，他在我们心目里威望还是很高的。许世友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你们的士兵啊，你们是政府首长……”。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也就有点飘飘然，以为自己不得了了。当时我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都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常委一共 22 个吧。北京市革委会经常开常委会，大概每周一次以上吧，北京的大小事情都是这个会上决定的。我们这些常委权利也太大了，但实际上这和我们当时的信息和能力根本不对称，应当说没有参与决策的资格，但实际上却参与了。

那膨胀的速度简直快得不得了，就导致得意忘形。1967 年 5 月清华大学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5 月 29 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谢富治已经批准，而且已经宣布明天要开成立大会庆祝了。他说，你今天晚上就决定，若清华明天成立革委会，我明天就出席你们的会议。如果四一四有不同意见，我们去说服他。他就一夜没睡觉，跟我们在一起，等我做决定。我也一夜没睡觉，当时我真是矛盾死了。后来就想，说不定缓一下更好一点。谢富治说，如果你这样子考虑的话，说明条件还不太成熟，我们要进一步做四一四的工作。这一下子宣布推迟以后，就完全不可收拾了，两派越闹越僵。我恨懊悔，这个决定是我做的嘛。

清华的武斗也是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很容易被人家鼓动，一激一怒就起来了，而一旦决定就不可收拾，想回头都回不来了。最早的武斗是我们的责任，一个呢，我们团派当时的力量比四一四强得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想把矛盾激化，争取中央的明确支持。清华武斗之前呢，北大 3 月 29 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我们也想学这样做。这之前，虽然毛主席没有公开讲，但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啊，都讲了很多话批评四一四。当时我有这么个心态，认为清华打起来对我更有利，中央领导会发表严厉的讲话，就是让四一四垮台，结束两派纷争的局面。

清华武斗比较晚了，1968 年 4 月 23 号开始的。武斗的导火索是四一四那边抓了我们团派保护的一个干部陶 X，我们把这个看的很重，认为你太过了。于是我们

就去攻数学馆，把四一四的人都赶出来了，这一打就不可收拾了。

毛主席说了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之后，（何时发表的？）我们就更极端了，把四一四说成是代表国民党的。武斗表面上似乎也就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这样，大家武斗的时候特别勇敢，当时喊冲的时候，同学们真的是不要命，硬往上冲啊。当时我们攻一个楼，是二层的，地面距楼顶有 8、9 米高。我们用云梯强攻，两个梯子绑起来有十几米长，踩上去就忽悠悠的。四一四贴着那个楼顶的边上焊起来铁栏杆，你梯子搭上，一个人往上冲，人家三四个人，你还没爬上去呢就被挑下来了。就这样连续硬被挑下了十几个人，有两个人当场死了，可后面的还继续往上冲！战争期间黄继光堵枪眼啊，董存瑞炸碉堡啊，这些英雄行为我就特别能理解。我指的是英雄的那种心态，就是在悲痛和激情之下，他们同时也为自己的“高尚行为”而自我激励，感觉在为崇高的事业奋斗。我特别不能接受把文革武斗中这些被打死的孩子，说成像疯子一样死得活该。当时留在校内的同学大概一千人吧，没有任何补助，都是自己掏钱吃饭。也没有命令说必须参加，纯粹是自愿的。这些人的绝大多数当时确实是抱着崇高的目的，在共产党的领袖号召下，为那种理想主义战斗。

武斗死人以后，我很快就懊悔了。我本来是一种投机心理，利用武斗获取中央文革的支持。结果中央根本不表态，我们失算了。所以当时说实在的，我是巴不得停止武斗。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韩爱晶他们也找四一四谈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儿沈荣槐坚决不同意。当时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他们当时是这么说的。我真是骑虎难下，感到非常大的压力，不仅有社会压力，有同学压力，自己也体会到，清华武斗责任呢，肯定要追究到我这儿。我当时很清楚，武斗会死人啊，清华哪怕死一个人，账都会记到我头上的。1968 年 5 月份，我曾提出让解放军把两边隔开，但也没能实施。

四一四最后的主要据点是科学馆，四周所有的房子全部被我们占领，他们想从角上挖地道通往外边，运吃的东西什么的。后来就像地道战电影里演的一样，我们在周边埋上大缸，就知道他们在挖地道。发现后就拿来炸药，一炸就给他封死了。当时我们把科学馆断电了，但没断水。因为那里面还有我们的人质啊，几个很重

要的人。当时不攻其中也有这个顾虑。而且那个楼非常结实，你要攻打的话除非你死很多人，我们下不了这决心。

这场武斗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七一七事件”才停止。我从不同意武斗到同意武斗，后来这几十年都懊悔不已！清华团派当中主张武斗坚决的，就是总部的任城中，刘杰长，陈继发这几个人。二把手他也不主张武斗。我没能抵制住诱惑，懊悔的很。清华的武斗我肯定要付很大责任，如果我不打肯定就打不起来了。

这种“全身浮肿，头脑膨胀”的情况，不是仅仅体现在个别人身上，而是在群众组织的头头中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这种情况恰恰说明：他们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距离一个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要求，还相当远。而他们自己恰好缺乏的就是这种自知之明，不能自觉地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清除头脑中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

2011 年 2 月 21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1 日修改

第六篇第一章第四节 分清敌我掌握大方向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一章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四节 分清敌我掌握大方向

对错误思潮的处理，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重在思想教育，对造反派犯错误打击过重，削弱了文革的社会基础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经毛主席批准，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一月，戚本禹被审查。这时，仍然是作为内部矛盾来处理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周恩来等人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讲话中指出：要反对从极左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要揭露“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目出现把矛头直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罪恶阴谋。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毛主席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

一九六八年，出现了“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案，嫌疑人涉及到一些中央级的领导人，又出现了“杨傅余事件”。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通知》指出：“‘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说：“五·一六”的后台就是王、关、戚。起头，我们想分化他们，把戚本禹分出来，实际上他们是一伙。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江青说：“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左”实右，这就难免有人上他们的当，所以我们对于“五·一六”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只要交待好的，完全可以从宽处理，可以不扣反革命的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隐藏起来，

那要查出来，可就不客气了。

这时就把王、关、戚与“五·一六”联系起来，矛盾的性质也发生了转化，由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

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开展不到半年，毛主席发现了问题。

一九七〇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意见指出：

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二个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这个通知首先肯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在黑后台中又增加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另一方面通知又着重指出：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各级党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军管会、军代表、各工军宣队的负责同志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参与“五·一六”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受社会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人。对于各种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极“左”的和右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应当深入批判，在批判中要注意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因为受欺骗而犯错误的人，在他们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就不要戴反革命帽子。就是骨干分子，在交代罪行以后，也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出路，其中表现好的，也可以从宽处理。总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这个通知发出以后，一些单位的清查运动实际上就停下来了。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日，根据有人反映情况，毛泽东指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意见，中央又开始狠抓清查运动，以北京为重点，在全国铺开。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说：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这就是说，运动由清查“五·一六”组织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转向清查重大反革命事件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而且，这些所谓的“重大反革命事件”，除了中央定的“火烧英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外，其它都是由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自己说了算。

这样，首先在指导思想虽然强调了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在具体指导上仍发生了错误：把群众性的极左的、盲动的、无政府主义事件，看成了反革命事件；把有关的甚至无关的责任人，看成了“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把参加了有关活动的人，当成了嫌疑犯。其次在具体执行上，虽然是强调了依靠各级党委和革委会，但是在各级党委和革委会中，都混有一些文化大革命怀有敌对情绪的人，如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利用清查运动对革命派进行打击报复。再次，此时，中央领导的主要注意已经转向对付林彪反党集团的活动，放松了对清查工作的指导。

在这种情况下，清查运动又进行了一年。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吴德说：

全国都在抓“五·一六”，搞协同作战，北京地区又是重点。

北京市有一百多万人参加，经过群众议，摆、查，揭发出有“五·一六”嫌疑有五万七八千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办各种学习班的包括留宿的，走读的三四千人，根据大家报的重点人七百多人。

第六建筑公司四营共有职工 1052 人，在一段时间里 20 几天，搞出“五·一六”嫌疑 283 人，占职工总数 27%，占在职干部 43%，占党员 28%，占老工人 26%，搞过揪斗、“帮促”的占 60%。

面宽的有的到了 30%、40%、60%，有个单位把一派群众组织都说成是“五·一六”。有的工厂把二分之一的职工都搞成了“五·一六”嫌疑对象，还有的把一派组织

90%列为嫌疑对象，有个人一供就二、三百。

火烧英代办处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大量事实证明是“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姚登山、周景芳这些王八蛋们搞的。

“围困中南海”是以揪刘为名，向中央施加压力，也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这些人干的。

“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也是“小小老百姓”他们搞的，现在查得很清楚了，连“小小老百姓”的手稿也搞到手了。

吴德说：围困中南海，列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重点审查的只有 30 几个人。火烧英代办处，列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审查的只有十几个人。可是因这两件事，作为清查对象的、进“学习班”的、受到“帮促”的、被“揪斗”的却有成千上万的人。

下面是原清华大学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谈他在清查五·一六中的情况：

1970 年，准备开四届人大的时候，我是当选为北京市选区的人大代表。1970 年 11 月，上面通知我参加北京市的人大会议。北京提名我当四届人大代表时，遭到北京市工人的反对，后来毛主席做工作，谢富治做工作，才通过。王力告诉我，说中央给我保留了一个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位子。当时我去北京的时候，我们厂都以为我去开四届人大的嘛。宁夏很隆重，是送我坐飞机去的，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到机场后，北京市革委会派车接我，并在市革委会吃的晚饭。饭后，清华就来人了，说找我有点事，把我接到清华去了。我到了清华大学工字厅，在党委办公室旁边的一个房间，迟群、谢静宜、刘冰等，大概五六个常委都在等着我。迟群开门见山地宣布：蒯大富，你有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待，清华党委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我一下子就被打蒙了。我说，组织上对我审查，我完全服从，我保证积极配合，但是我严正声明，我没有隐瞒任何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待，所有问题我都已经在办学习班的时候全部交待清楚了。

那段时间，我一直关在清华工字厅第一个院子里边靠北边的房子，现在大概是校办的房子。他们没有打人，只是不断施加精神压力。揭发我的都是我们井冈山总部的几个委员，揭发的内容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我给他们发了表，发展他们参加了五一六；还有就是说我们所有干的坏事都是我指挥办的。当时，迟群到我这儿来核对，说揭发我的这些人都是我发展的。我说：你肯定搞错了。别人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五一六，更没发展过五一六。而且据我所知，清华也没有五一六。他们也没搞对质，那几个揭发我是五一六的人，实际没人敢跟我对质，因为确实没有的事。怎么对质？

后来，迟群他们下了很大决心，施加了多大压力，我最后也没有违心承认，也没有乱说去揭发别人。迟群气得说：“难道那么些人做梦都做到一起去了”？意思是说揭发我的这些人交代的口径都一致。当时迟群给我拍桌子，我也敢使劲对他拍桌子。我说，你还拍什么桌子，你们根本就是逼供信，全胡说八道。

“九一三”事件以后，迟群跟我说：有些事他不能说，实际上有些是搞逼供信搞的，就算了，过几天就放你回去。1971年他曾打算放我回去了，但是又没放，一直拖到73年才让我去东炼（东方红炼油厂）劳动改造。清华也抓了好几百呢，事后证明完全是假的，清华一个“五一六”也没有，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全国各地情况类似，都列出了本地的重大“反革命事件”，进行清查。涉及到的人，据说有数百万。

全国整“五一六”整得最狠的是江苏，就是所有造反派都给扫荡了。据说逼死搞死了一万多人，反响太大。江苏后来有个寡妇上告团，就是被逼死人的妻子到北京告状。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谢静宜向毛主席汇报清查“五·一六”问题时，毛主席说：“没那么多吧？有的是打击报复打成的吧？”

历史证明：

第一，从事件来说，“火烧英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等，是极左的、过火的行动，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是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二，从组织来说，这些行动不是“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搞的，而是各种群众组织进行的。

第三，从个人来说，“王关戚”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杨傅余”也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即便是陈伯达，也没有证据说明他就是这些事件的幕后指使人，是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

在文化大革命中，批极左、清查“五·一六”运动，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第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人民内部的左倾盲动行为，作为反革命事件处理。

第二，混淆了大是大非，把群众的造反行为，作为反革命行为，造反有理变成了造反有罪。

第三，大批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群众代表，被以各种名义清除出革委会。

第四，大批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支持造反派的革命领导干部，被以各种名义清除出革委会。

第五，社会上出现一种新的舆论：参加造反、支持造反都不会有好下场！造反派中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甚至倒向右派一边。北京一所大学的原造反派头头说：挨了整后，头脑清醒了许多，我们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形色色，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搞法是错误的。对“四人帮”把我们当替罪羊，用完了一脚踢开的作法深恶痛绝，对文革中被整的人特别是老干部十分同情，尤其是对邓小平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从理论上和社会实践中认识到，邓小平的许多讲话和观点是正确的，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我们不应当站在个人恩怨立场上再反对邓小平。当时正批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反击右倾翻案风。我看了“三株大毒草”后，认为老邓说得对，说得好，便搞了一套拿回了 7 3 8 厂传阅，并主动交给一个当官的看。

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被严重地削弱了。

第六，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后，右派又抓住这些所谓反革命事件，栽赃到左派领导人身上，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

2011 年 2 月 28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1 日修改

第六篇第二章第一节 经济发展水平下降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二章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

第一节 经济发展水平下降

一九七六年以后的历史，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以下从中国社会几个方面的变化来说明。

第一节 经济发展水平下降

(以下为网文摘录)

一、经济边缘化

GDP 的高速增长被看作中国市场化转型取得成功的主要依据。然而，众所周知，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其发展水平相对低下而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

在此或许需要首先简述如下常识，即现代世界体系建立在统一的国际劳动分工上，其中发达国家占据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在西方公然的殖民掠夺停止之后，建立在比较优势原则上的国际劳动分工有效地维护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分工。长期发挥所谓比较优势的结果，就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被锁定在分工劣势之中，没有也不可能爬到更高的分工链条上。几百年来的经济史表明，无论如何起劲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直到今天，发展中国家鲜有成为发达国家的。发达国家执世界经济的牛耳，它们不允许发展中国家动摇自己的优势地位。

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意义在跨越常规，为尽快摆脱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开辟新的发展道路。中国在这个时期保持了相当高的持续增长，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经济结构。到改革前夕，中国已经拥有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许多边缘国家不能生产的产品。“超常规”发展战略使中国在建国后短短十几年就拥有了核武器，成为多年来世界核大国中唯一的低收入国

家, 在科研领域也推出了世界级成果。因此, 尽管人均收入水平类似于其他边缘国家, 但中国的经济结构却类似半边缘国家, 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特例。与同为发展中人口大国的印度相比,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印度人均收入相当于中国的两倍。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超出印度, 不但人均收入超过印度, 工业化程度更是远远高于印度。改革后, 中国开始把追求 GDP 增长放在首位。为此, 中国采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 包括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 建立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 大量引进外资, 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参与国际分工。1980-2005 年, 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高达 15.6%, 大大高于 GDP 增长速度, 相当于同期全球贸易总额年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结果, 中国进出口占全球进出口比重从 1980 年的不到 1% 上升到 2005 年的大约 7%, 在全球排名从第 22 位上升到第 3 位。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 到 2005 年, 外资在中国的工业增加值、税收总额、工业企业就业人数等方面已经占有四分之一的份额, 支撑着中国出口的半壁江山。

按照外贸占 GDP 的比重衡量, 目前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经济最为开放的国家。中国经济增长的这种明显外贸导向或外向型特征, 被认为严重到患上了“外资依赖症”的地步。经济史告诉我们, 一个国家要对外开放并不难, 因为强国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决定本国经济开放度, 而相对弱小的国家则通常难以抵御内外压力尤其是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 不得不打开国门。但是, 对外开放程度并不是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标准, 无论美国还是日本, 它们目前的开放程度都大大低于今天的中国。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很大差别, 甚至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 其经济反倒是高度开放的。需要分析的是, 外向型增长模式是否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中国的国际分工角色是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 还是越来越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 判断一国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 有一个简单标准可做参考, 那就是该国基本出口产品的结构或类别。有研究用出口商品构成衡量国家的生产力, 发现它与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密切相关。例如, 富国的出口产品往往类似其他富国的出口产品, 即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但也有例外。如果出口产品的结构高于人均收入通常预示的水平, 说明该国生产力超过人均收入水平通常达到的水平。有研究表明, 1992 年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类似于人均 GDP 比中国高 6 倍多的国家, 表明中国拥有强大的产业能力, 生产力表现出半边缘国家的特征。

然而，这个优势在改革中不是保持或扩大，而是逐步缩小了，尽管与类似人均 GDP 水平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仍然要好一些。

中国产业优势逐渐下降的时期，正是中国开始大量引进外资，强调运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时期。为了保持价格优势，以便充当外资企业的加工车间，扩大劳动密集产品出口，中国竭力维持低工资。这一做法的结果是在国内造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在世界市场则难以跳出依靠低附加值产品进行恶性竞争的陷阱。中国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所谓“竞底”或“竞次”即打到底线的竞争（race to the bottom）中，各国比的不是谁生产力更高，产品科技含量更多，人力资本更雄厚，而是比谁更次、更糟，更能苛待本国劳动力，更能容忍对本国资源环境的破坏。事实证明，这种朝向工业文明底线的竞争不但不能提升一国的地位，不能使之迈上一个台阶，反而使之陷入不发达陷阱难以自拔。如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国内市场同样充斥着外国品牌的各种产品和消费品，许多原先著名的国产品牌大多已销声匿迹。中国可以大量出口，本土产业却不能制造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的产品，“有出口而无产业”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GDP 高速增长带来了经济总量增加，但经济总量与工业化/现代化并不是一个概念。一直到 1820 年，即西方工业化开始后二十多年，中国的 GDP 仍占世界 50% 以上，是整个欧洲的 1.22 倍，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欧洲，出口制造品世界第一，当时的世界上充斥着“中国制造”。但那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弱国，抵挡不住西方的侵略和打击。改革后的中国经济总量扩大，但经济结构恶化，对外依附性增加，国内消费规模得不到相应扩大甚至相对萎缩。在某些方面，其日趋边缘化的增长模式与成功实现了赶超的国家形成鲜明对照，例如日本。

经济结构趋向边缘化的结果就是，中国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而是拉近了与“正常的”发展中国家的距离。

二、资源环境恶劣化

1、高速度、高能耗的发展，加剧了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

我们的国家,从总量上看是资源大国,但从人均资源上看则是资源小国。国际上认为直接关系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有四大资源,即土地、淡水、森林、草地。我国人均土地为世界人均量的 1/3,人均淡水量为世界人均量的 1/4,人均森林面积为世界人均量的 1/6,人均草地量为世界人均量的 1/3。此外,45 种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大多数相当世界平均量的 1/2 上下。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单位 GDP 的能耗高出经济合作组织 30 个国家平均值的 2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出 2 至 3 倍。这一低一高,加剧了我国资源短缺与经济发

展的矛盾,形成对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压力,凸显了节约自然资源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国消耗的原油约有 50% 依靠进口。我国作为世界产煤第一大国,一向是净出口的,但 2007 年第一季度出现了煤净进口的现象。这种现象要经过努力才能改变。

顺便说到,前几天报纸上有这样一条短讯:一个日本学者就“中国的资源总量与人均占有量在世界上的排名”问题问了中国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工作人员,竟无一人能准确地回答出来。但同样就日本的此类情况问及日本人,就连小学生也能给出准确的答案。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人民日报》2007 年 4 月 9 日)

2、高速度、高污染的发展,使 GDP 的增长大打折扣,并且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损害人民健康。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度发展,而环境保护工作严重滞后,因而产生了大量污染。在全球 20 个污染最严重城市中,中国占 16 个(《参考消息》2007 年 7 月 4 日报导的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关于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还缺乏全面而确切的统计数字,但许多学者和有关机构作了大体的测算:

——据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政策研究中心孙炳彦在《90 年代初期中国环境污染损失和思考》一书中测算:1990、1992、1994 年我国污染损失分别占当年 GNP 的 7.4%、6.9%、6.5%。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在《求是》杂志 2000 年第 3 期发表的文章称:据专家估算,我国每年的大气污染、河水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当年 GDP 的 4%—8%。

——据中国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测算,1993 年环境污染损失占到当年 GDP

的 3.16%，生态破坏（森林、草原、农田、水资源、湿地、土壤侵蚀、人为灾害）占到当年 GDP 的 6.87%，两项合计损失占 GDP 的 10.03%。

——据世界银行计算，中国 1997 年的环境污染损失占到当年 GDP 的 7.7%。

——据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04 年全国污染损失占当年 GDP 的 3.05%。但并未包括自然资源核算，环境成本中也未计入生态破坏损失，即使环境污染损失，其内容也是不全面的（《人民日报》2007 年 3 月 28 日）。

高污染的后果包括致人疾病甚至早亡。据媒体报导：“世界银行的中国污染报告近日完成。这份报告称，中国每年约有 75 万人早亡，主要死因是大城市的空气污染。该报告是世界银行花费数年时间与中国政府部门合作完成的。世界银行的该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导致每年有 35 万至 40 万人早亡，每年还有 30 万人因室内空气污染早亡。另外，还有 6 万多人因水质严重腹泻、胃癌、肝癌和膀胱癌而早亡，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参考消息》2007 年 7 月 4 日）。

又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2007 年 7 月 17 日公布的、经过 18 个月的调查写成的首份《中国环境绩效报告》中称：“预计到 2020 年之前，空气污染会导致中国 60 万城市人口过早死亡，每年发生 2000 万例呼吸系统疾病、550 万例慢支气管炎和健康受损病例。这可能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损失 13%”（《参考消息》2007 年 7 月 18 日）。

上述资料，由于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的不同，所得数据不尽一致。但大体可以看出，污染损失占 GDP 的比例在 3%到 8%之间；生态的损失所占 GDP 的比例 6%到 7%。如果再加上由于污染而使人患病、早亡的损失，比例就更高了。如果从高速增长 GDP 中，扣除实际存在的、巨大的环境代价，那就不是发展的高速度，而是低速度。

环境资源问题。我国人均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我国单位 GDP 的能耗却高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30 个国家平均值的 20%；资源供应紧张，所需石油约 50%依靠进口。目前世界污染最严重的 20 个城市中，中国就占 16 个。据测算，我国环境污染损失约占 GDP 的 3%到 8%，生态破坏（草原、湿地、森林、土壤侵蚀等）约占 GDP 的 6%-7%。两项合计约占 GDP 的 9%到 15%。大气和水质污染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损害居民健康，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据世界银行估计，

中国平均每年因大气污染而早亡 75 万人。据经济合作组织测算，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疾病和早亡的损失占 GDP 的 13%。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还认为：“中国虽然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中国的环境标准更接近某些最贫穷的国家。”这些事实说明，如果扣除环境损失的过高代价，GDP 的增长不是高速度，而是低速度，有的甚至是得不偿失。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中国环境绩效报告》中还指出：虽然中国是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而且在迅速赶超德国、日本和美国，但中国的环境标准常常更接近某些最贫穷的国家。该组织在北京与中国政府签定了备忘录，并在《报告》中给中国提出了 51 项建议，其中包括把中国的环保总局升级为“部”。

3、高能耗、高污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私有化是其深层次的重要原因。

高能耗、高污染为什么会形成？为什么问题的解决又如此艰难？人们指出了许多原因：思想认识上重速度轻环境、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行业结构不合理、政绩考核不全面、法律法规不健全、有法不依而又监督不力、等等。这些原因确实都是存在的。针对这些原因，解决的办法主要是：提高思想认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改进政绩考核办法、加强宏观调控、加大执法力度、等等。这些措施确实也是必要的。

但是，为什么采取这些措施之后收效不大？许多违法违规行为屡禁屡犯？究竟深层次的原因在哪里？这就不能不涉及这些年来私有制经济的大发展问题。上面列举的形成高能耗、高污染的种种原因，归根结蒂，主要是追求高额利润问题，而追求高额利润正是私有制经济的本质特征。为什么思想认识不到位？为什么行业结构调整困难重重？为什么有法不依？都与追求高额利润密切相关。例如：2006 年原来国家要求 GDP 增长 7.5%，能耗降低 4%；但执行结果，GDP 增长 11.1%。而能耗仅降低 1.33%，而在 GDP 增量中，高耗能行业也就是高利润行业的贡献在 60% 以上，“这必然导致能耗整体处于高水平上”（参看《人民日报》2007 年 7 月 13 日：《节能降耗任重道远》）。

私有化导致高速度、高能耗、高污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新建的私营企业，大多数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环保设施差，特别是小钢铁、小水泥、小炼钢、小煤窑等等，污染程度特别严重。国家多次下令关闭这些小企业，虽然收到一定效果，但在官商勾结的情况下，往往明停暗开、多次反复、进展缓慢。

2011 年 3 月 7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2 日修改

第六篇第二章第二节 经济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二章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

第二节 经济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以下为网文摘录)

一、一九七六年以后，大肆鼓吹私有化、市场化理论

他们大讲“经济人假设——人性自私论”，说什么社会主义公有制违反人的本性，注定要失败，但极力回避苏联建国后半世纪依靠公有制使经济落后的沙俄变为唯一可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半世纪主要依靠公有制使经济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差距大大缩小的事实。

他们大讲国有经济“产权不明”“产权虚置”，只有卖给个人，使“产权明确化”才能旺盛发展，但极力回避俄罗斯把国有企业卖给私人造成国民经济大倒退的事实。

他们大讲“国有企业低效率论”，只有私有化，由中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才能提高效率，但极力回避 1952 年到 1998 年间我国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大大高于非国有企业、大大高于“世界 500 强”的事实。

他们大讲“靓女先嫁论”“冰棍论”，以“靓女”要老化、“冰棍”要融化为“理由”，要把国有企业尽快贱价卖给或者白送给本企业的厂长、经理或中外资本家，把全民所有的财产转化为个人的财产以“深化市场化改革”，

有的地方政府官员还大讲“放手、放心、放胆”地扩大私营经济，东北某省省长甚至鼓吹“公有制与多种经济成分换位”（《经济日报》2006 年 6 月 1 日）。

一些人认为应当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属于国家经济命脉的垄断行业和领域，包括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依法取得矿产资源的探矿权、开采权，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矿产资源的勘察开发；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甚至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为了实现这一新的方针，国家要从减税、出钱、

让利以及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大力支持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对国有企业进行并购、控股、参股,做到国退民进。

有些人主张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不体现于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即比重在 50%以上,而主要体现在它的控制力上。

他们鼓吹“股份制是国有制经济最好的实现形式”,因为在股份制企业,国有资本既可以绝对控股,即占 50%以上;也可以相对控股,国有股只要占到 20%到 30%,就可以控制 70%—80%的私人股份,从而扩大国有资本的控制力。

他们还大力宣扬通过国有控股公司扩大控制力,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发展。因此,国家计划(或规划)中不必列入公私经济比重的指标,国家统计局也不必统计和公布公私经济所占比重的全面数字。

二、一九七六年以后私有化的进程

(一) 私有制经济已经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

近十年来,大批国有企业被贱价甚至“零售价”出卖(包括 MBO),从而变成私营企业。推行国企股份化,实际是把国有企业变成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国有控股、私资参股)。集体经济更受到多方挤压而被边缘化或私有化。据国家统计局 2005 年经济普查所得的数字,在第二和第三次产业的实收资本中,从 1996 年到 2004 年,公有资本所占比重由 83.3% (国有占 58.6%,集体占 24.7%) 下降到 56% (国有占 48.1%,集体占 7.9%),减少 27.3 个百分点;非公有资本(国内私营和港澳台、外商资本)由 16.7%上升到 44%,增加 27.3 个百分点。同一时期的就业人员,在由国有、集体企业组成的公有制企业中就业的人员,由 1.5 亿人减少到 5020 万人,仅剩三分之一,占全部企业就业人员的比重由 83.8%下降到 29.8%,减少 54 个百分点。其中,国有企业人员所占比重由 43.4%下降为 18.4%,集体企业由 40.4%减少到 11.4%。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一个雇佣劳动者占多数而公有制企业的劳动者占少数的社会基础,能够长期支持住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吗?

又据全国工商联在 2006 年 3 月 1 日发布的《‘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

析报告》提供的资料：“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及全国工商联推算，2000 年，内资民营经济在 GDP（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 42.4%，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比重为 12.6%，二者之和占 GDP 的 55%。2005 年，内资民营经济在 GDP 中的比重约 49.7%，外商和港澳台经济比重约为 15%-16%，两者之和约为 65%。”（《中华工商时报》，2006 年 3 月 4 日）。这就是说，“十五”期间“民进国退”的结果，前者进了 10 个百分点，后者退了 10 个百分点。须要说明的是，这个《报告》中所说的“民营经济”是“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但不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如果扣除集体经济 GDP 中所占的比重（估计约为 8%），加上国有控股企业中私资部分的比重（估计至少 4%），则非公经济 GDP 所占的比重约为 61%，公有制经济 GDP 所占的比重约为 39%。这就是说，公私经济比重大体上是“四六开”，而且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还在继续下降。

据有些专家估算，目前个体私营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 40% 左右，加上外资企业，则非公有制工业的增加值就占到全国工业增加值的一半以上（陈全生、陈永杰，2005，2）。另一位专家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6 年 3 月 1 日发布的 2004 年《统计公报》中提供的工业部门“规模以上”（年销售收 500 万元以上）各种所有制企业增加值数的数字，加以必要的补充和调整，估算全国工业增力口值中，私有制经济大体占 62%（个体私营占 38%，外资占 24%）；公有制经济大体占 38%（国有经济占 32%，集体经济占 6%）（史正明，2005，3）。由此可见，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工业部门，占居优势的已经不是公有制经济而是私有制经济了。

关于目前整个国民经济中公私经济的比重，有的学者估算，非国有经济大致占我国国民经济的 2 / 3（吴敬琏，2003，11）。有的民间组织负责人估算，目前已形成国有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三足鼎立的格局（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2005，2）。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国务院研究室的负责人估算，目前个体私营所有制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 1 / 3 左右（2005，2）。这两个机关的负责人没有提到外资经济。如果加上占国民经济 13% 强的外资经济（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取得的 2001 年资料：外资实收资本占全国各类单位实收资本总量的 13.32%），那么，私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 46% 强（33%+13

%强)。

更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私有制经济的增长速度正在更大幅度地超过公有制经济的增长速度。据《中国信息报》(国家统计局主办)2005年6月14日报导,自从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出现了“政策助跑,全面发力,个体私营经济冲上快行道”的新局面。个体和私营经济增长速度,由2月份的13%跃升为3月份的23%;以后的4月、5月,又进一步提高到24.7%和26.6%。同全部工业增加值同期增长14.7%、16%、16.6%的速度相比,3月份高出8.3个百分点,4月份高出8.7个百分点,5月份高出10个百分点。有的专家估计,现在不仅在工业部门,而且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私有制经济的比重也已经超过公有制经济了。

据测算(国家统计局未提供全面准确资料),1995年,在全国企业注册资本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包括内资与外资)的比重,分别为73%与27%;全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78%与22%。

经过近十来年的剧烈变化,2006年,全国企业实收资本(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48%与52%;全国就业人员(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32%与68%;全国GDP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比重分别为37%与63%。

目前,私有制经济比重还在继续上升,向电力、铁路、邮电、航空乃至国防工业等特别重要的部门进军。

1, 当前各种所有制的资本的结构

表 1 企业法人来自各种所有制的实收资本

所有制	2001 年		2004 年		增减	
	万亿元	%	万亿元	%	万亿元	百分点
国家资本	7.5	1.5	54.4	11.3		
集体资本						
		8.7				
	1.4					48.1

	7.9	+ 1.2			
	- 0.1		- 6.3		
	- 3.4				
	公有制资本		9.0	65.7	10.1
56.0	+ 1.1		- 9.7		
	私人资本				
	港澳台资本				
	外商资本	2.5			
	1.1				
	1.1	18.4			
	8.1				
	7.8	5.1			
	1.3				
	1.6	28.0			
	7.3				
	8.7	+ 2.6			
	+ 0.2				
	+ 0.5	+ 9.6			
	- 0.8				
	+ 0.9				
	私有制资本		4.7	34.3	8.0
44.0	+ 3.3		+ 9.7		
	合计	13.7	100.0	18.2	100.0
+ 4.4	——				

注：本表来自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二、三产业）的材料，其中未包括二、三产业中 3332.9 万个个体经营户的资本。

从表 1 可以看出：公私经济实收资本比重，2001 年为 65.7：34.3；2004 年则变为 56：44。这三年，国有资本的绝对值是增长的，但增长速度比私有制慢；集体资本绝对值则是减少的。因此，公有制资本比重减少 9.7 个百分点，平

均每年减少 3.23 个百分点。

关于 2005 年和 2006 年公私经济资本变化的情况,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中只提供了固定资产变化的材料:2005 年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及国家控股参股等混合经济、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23.6%,而私营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40.6%,后者为前者的 1.72 倍;2006 年公有制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21.6%,而私营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5.3%,后者为前者的 1.63 倍。这说明,私营经济固定资产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公有经济固定投资增长幅度。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额并不是全部资本增长额,但它是投资额增长主要部分;而且统计部门提供的上述公有制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数字中,还包括了公私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私有部分未曾剔除,但是大体看来,还是可以反映公私资本变化的基本趋势的。由此,可以判断,2005 年和 2006 年私有资本比重增长的速度,明显高于前几年平均每年增长 3.23 个百分点。按每年增长 4 个百分点测算,2005 年公私经济的比重是 52:48,2006 年公私资本的比重是 48:52。这是二、三产业的情况。

关于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其 2005 年的 GDP 占全国 GDP 的 15.8%)的数字,不在这次经济普查范围内。所以无法将第一产业各种所有制的数字补入经济普查所得的第二、第三产业的资料。

2, 当前各种所有制从业人员的结构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说明:从 1996 年到 2001 年,在二、三产业中由国有、集体企业组成的公有制企业中就业的人员,由 15281 万人减少到 5020 万人,减少三分之二,占二、三产业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由 83.8%,减少到 29.8%,下降 54 个百分点。其中:国有企业就业人员由 7916 万人,减少到 3102 万人,所占比重由 43.4%下降到 18.4%,下降 25 个百分点;集体企业由 7365 万人减少到 1918 万人,所占比重由 40.4%,减少到 11.4%,下降 29 个百分点。经济普查资料还说明:2004 年末在我国私营、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就业的人员达到 7636 万人,占全部企业就业人员的 45%,1996 年以来平均每年净增加就业人员 696 万人,年均增长 17.8%,其中私营企业就业人员 5305 万人,占 31.4%,1996 年以来平均每年净增加 560 万人就业,年均增长 26%以上。

上述数字表明:2004 年在第二、第三产业中,在公有制企业中就业的人

员占 29.8%，在私有制企业中就业的人员占 45%，两者相加为 74.8%。那么，其余 25.2%的就业人员是在什么样的企业中就业的呢？回答是在混合所有制的企业中就业。在全国经济普查资料中，对这类企业的人员没有按所有制性质划分。我认为，这部分人员可以按混合所有制企业中不同所有制资本所占的比例来划分。

根据经济普查资料，2004 年公有制企业的实收资本占二、三产业全部实收资本总数的 40.4%，私有制企业实收资本占 34.6%，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收资本占 25%。从前面第一节表格中所列的各种所有制资本所占比重，减去本节所列的相应所有制企业的比重，即可得出各种所有制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所占的比重。由此可以推算出：公有制资本在混合所有制中的资本为 15.6% ($56\% - 40.4\%$)；私有制资本在混合所有制中的资本为 9.4% ($44\% - 34.6\%$)，两者合计为 25%，与本节所列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就业人数占 25.2%的数值十分相近。现在，把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就业人员按上述资本比例划分（略作技术性微调，将 15.6%和 9.4%各加 0.1%，使二者之和与 25.2%相一致），再分别与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人员所占比重相加，即可得出：公有制经济的就业人员比重为 45.5% ($29.8\% + 15.7\%$)；私有制就业人员比重为 54.5% ($45\% + 9.5\%$)。这是 2004 年的数字。

那么，2005 年和 2006 年公私经济就业人员的比重是多少呢？从上述资料中看出，从 1996 年到 2004 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人员所占比重由 83.8%减少到 29.8%，下降 54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 6.75 个百分点。按照每年继续下降 6.75 个百分点测算，则 2005 年公有制经济就业人员的比重为 38.75% ($45.5\% - 6.75\%$)，私有制经济人员为 61.25% ($54.5\% + 6.75\%$)；2006 年前者为 32%，后者为 68%。

3, 当前各种所有制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所占比重的结构

全国工商联于 2006 年 3 月初发布了《‘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报告》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及全国工商联调查数字推算，2000 年，内资民营经济在 GDP 中所占比重为 42.4%，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经济比重为 12.6%。二者之和占 GDP 的 55%。2005 年，内资民营经济在 GDP 中的比重为 49.7%，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比重约为 15%—16%，两者之和约为 65%（《中华工商时报》，2006 年 3 月 4 日）。从 2000 年到 2005 年，民营经济平均每年增长 2 个百分点。

该《报告》说明，其中所说的民营经济是“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这就是说，上述民营经济数字包括集体所有制经济，但不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如果从 2005 年民营经济的 GDP 所占的 65% 中，扣除集体经济比重中所占的部分（估计约为 8%），加上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估计至少为 4%），则非公有制经济 GDP 中所占比重为 61%（65%-8%+4%）。相应地，公有制经济 GDP 所占比重为 39%。按照上述每年民营经济增长 2 个百分点测算，2006 年公私经济 GDP 的比重为 37：63。

综上所述，2006 年我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在三大指标中所占的比重大体如下：

- 1、资本：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48%与 52%；
- 2、就业人员：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32%与 68%；
- 3、国内生产总值：公私经济所占比重分别为：37%与 63%。

所有制结构问题。国家统计局未提供全面准确的数字。据全国工商联 2006 年 3 月初发布的《\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提供的数字：2000 年，内资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为 42.4%，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经济比重为 12.6%。二者之和占 GDP 的 55%。2005 年，内资民营经济在 GDP 中的比重为 49.7%，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比重约为 15%-16%，两者之和约为 65%。这五年中，民营经济比重增长 10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 2 个百分点。该《报告》说明，其所称的民营经济是“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这就是说，上述民营经济数字包括集体所有制经济，但不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如果从 2005 年民营经济的 GDP 所占的 65% 中，扣除集体经济比重中所占的部分（估计约为 8%），加上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估计至少为 4%），则私有制经济在 GDP 中所占比重为 61%（65%-8%+4%）。相应地，公有制经济 GDP 所占比重为 39%。按照私营经济每年增长 2 个百分点测算，2006 年全国 GDP 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比重分别为 37%与 63%。另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2004 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 15.3%（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 年》第 505 页资料计算）。这一比例比建国之初的 1949 年国有工业占 26.2% 的比例还要低得多。这说明私有制经济已经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目前，私有制经济比重还在继续上升，并向电力、铁路、邮电、

航空乃至国防工业等重要部门扩展。

到 2010 年，我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在三大指标中所占的比重，大体上达到了三七开，即公有制经济占三成，私有制经济占七成。

（二）国家所有制已经变质成为官僚资本所有制

现在统计部门常常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捆在一起作为一个指标，列入国有经济。国有控股、私人参股的企业（包括国有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实质上是一种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在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国有资本可以控制参股的私人资本的使用方向，但并没有改变参股资本家对其资本的所有权、收益权和处分权，这就是说，并没有根本改变这部分资本的私有制性质。可以看出，这些论者试图用“控制力”的概念取代或混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概念，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取代或混同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概念，用国有控股企业的概念取代或混同国有企业的概念。从实际情况看，事情往往并不到此为止。接着，主管者往往又提出股份制企业中的国有股要“减持”，三减两减，往往用不了多少时间，原来的国有控股企业就变为私人资本控股了，有些甚至减持为零，变为纯粹的私营企业了。

现中国挂着“国有”牌子的经济成分，无论从哪个层面上来看，都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绝对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成分，而只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第一，从国家政权这个层面上来看，现中国的国家政权早已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工农群众直接参与管理，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科研”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而是修正主义叛徒集团领导的，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主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国家的一切大权包括挂着“国有”牌子的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完全掌握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中，工农劳动群众和下层知识分子，被打翻在地，成为被剥夺、被压迫的“弱势群体”。所以，挂着“国有”牌子的经济成分当然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二，从企业这个层面上来看，现中国挂着“国有”牌子的企业，都是规模大、利润高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垄断性企业，这些企业早已背叛了《鞍钢宪法》中“党委领导，政治挂帅，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度，企业的领导管理，变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头子们的子女、亲

友担任主要领导，管理职务的权门领导，“精英”管理，执行发展资本主义路线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工人群众和下级职员成为被剥夺了在企业里一切权力，只不过是供他们剥削的雇佣奴隶。这些企业里的工人群众之所以还反对改变“国有”牌子，不是由于它是什么“公有制”，而是由于如果它还挂着“国有”的牌子，它就难以取消工人群众原有的一些集体福利。当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会放松对工人群众的剥夺，他们正在以各种借口逼迫正式工人下岗，而雇用工资低且不享有集体福利的农民工。 第三，从生产关系这个层面来看，

(1) 生产关系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制度。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是决定生产关系性质的主要因素；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制度，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也有巩固和破坏的反作用，后两者（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制度）之间也有相互影响的作用。

(2) 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劳动群众，上级与下级，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社会分工虽有不同，但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必须是平等一致的同志式关系，而无尊贵卑贱之分。如果这种同志式关系受到损害或破坏，各级领导干部、脑力劳动者成为高踞于劳动群众、下级和体力劳动者头上的高官厚禄，养尊处优，享有特权的阶层，而劳动群众、下级和体力劳动者则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那么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就不可避免地要落到前一种人手中，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要变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中，特权阶层中那些民主革命时期参加党的“同路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人，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等，在国内资产阶级复辟愿望和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的影响下，就会成为修正主义思想的鼓吹者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提倡者，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

(3) 社会主义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消灭了生产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法权；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脱胎出来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需要的程度，人的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不计报酬的劳动的水平。因此，在分配领域里还不可避免地要实行“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而不顾个人的实际需要的表面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分配制度，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分配制度。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把这种分配制度，叫做分配领域内的“资

产阶级法权”，按照这种分配制度，工资待遇，等级悬殊；上下尊卑，界限森严。如果不加限制，必然要“从各个方面妨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一致的同志式关系的建立，从而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变质。

现存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虽然这些企业的资金还是国家所有，但多数国有企业中，工人阶级已丧失了主人翁的地位。在经济上，广大一线职工的工资与“高管”的工资相差悬殊，工人与企业之间完全成为雇佣关系，工人随时有被“炒鱿鱼”的可能；在政治上，工人对企业管理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所谓“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即“政企分开、产权明确、权责合理、管理科学”，全盘照搬资本主义企业的一套办法，根本没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一条。因此，这样的国有企业可说是已发生了质变。

三、经济体制已经由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

中国的改革从改变经济计划开始，逐步转向了由所谓“国退民进”引导的产权改革。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私有经济为主要部分的市场经济，从而具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产权改革开始成为改革的重头戏。产权变动的趋势表现为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实质上就是一个私有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300 多万个中小型国企和上百万个集体企业几乎完全退出了舞台，县级和以下行政地区已经看不到国有企业的踪影。2000 年到 2005 年，二级以上国企由 23 万家减少到 12 万家，省属国企中 90% 已完成改制。

根据全国工商联、国家统计局等 8 部委及各地方工商联的研究，截止 2005 年底，私有部门在中国 GDP 中的比重已经达到 50%，如果把外资统计在内，广义上的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 65%；2005 年底，民营企业（即私有企业）上缴的税收已经超过国有企业，在有些地区，地方政府 70-80% 的收入来自这些所谓民营企业。（5 黄孟复、胡德平主编：《2006 年民营经济蓝皮书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6 年》计算，2004 年，国有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 15.3%，目前的比重可能更低。6 另外还有资料表明，中国私有经济的比重目前

占 GDP 的 2/3 甚至更高, 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

2007 年 3 月 16 日,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物权法》, 国外很多人将此举看作中国在法律上对私有经济重新确认的一个里程碑。

在私有制重建之前, 中国已经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改革的最初对象是集体的经济计划体系。随后, 改革的市场取向越来越突出, 从不断降低经济计划的作用, 相应扩大市场力量, 到完全放弃经济计划, 重新确立市场经济制度。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中国不但重新确立了市场经济, 而且选择了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国家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贸外资。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最为开放的国家。如果说, 商品化程度是市场化最重要的标志, 那么, 今天的中国无疑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国家。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质就是把原先不是商品的东西转化为商品。现在, 不但生产资料、劳动力、生活资料成为商品, 而且, 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也在“产业化”名义下加速商品化了。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主要取决于个人购买力。这些领域的高度商品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在发达国家, 政府通常限制这些领域的商品化或市场化。例如, 它们大多倾向于把教育、医疗作为公共产品, 通过社会化方式统筹提供, 而不是作为一般商品进行买卖。在今天的中国, 市场可以说无处不在。市场经济的种种要件, 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一片空白, 到如今无不繁荣昌盛。从广告、股票、期货、保险、消费贷款、彩票, 到相应的从业人员如广告商、经纪人、“黄牛党”等, 可谓应有尽有。政府在改革期间公开提出“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口号, 把“效率”即“利润”置于社会公平之上。相比之下, 发达国家的政府似乎更愿意强调后者, 至少表面上不能不考虑公众对社会公平的普遍要求。

中国的市场经济身份是中国政府公开认定的。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 中国政府不但强调中国具有市场经济地位, 而且积极寻求其他国家的认可。到 2008 年 2 月末, 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已经得到 77 个国家的承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 由于中国的工会力量薄弱, 劳动立法滞后、不完善以及实施无力, 难以对资本形成必要的制约, 因此, 当今中国工人的工资远不如资本家的利润那样有保障。资本家可以不劳而获, 而劳动者却常常劳而不获, 以至劳工在不得已情况下, 甚至采用自杀或自杀相威胁讨要应得的工钱。这种破坏“等价交换原则”的公然掠夺现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不再流行, 但

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则比较普遍。中国当前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权钱交易盛行。在所谓优胜劣汰的竞争中，无处不在的潜规则似乎远比所谓“公平交易”更能克敌制胜。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资本的背后往往是政府或官员的影子，无论怎么看都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因此被认为是一个官僚化的市场经济或权贵市场经济。在一些人看来，存在这些现象是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成熟，不完善，处于初级阶段，而出路在于继续深化市场改革。事实上，完善的市场经济只存在于教科书和人们的想象之中，而“不成熟”或“不完善”的市场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经济体制特征。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大多更自由、更放任，同时也更无序、更脆弱。此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工业化程度较低，经济中的垄断程度较低，而政府管理和调控能力更弱，例如政府或者更少干预，或者干预效率更低。中国建国后建立起一个强政府，尽管直到目前其行政能力依然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但这种能力在市场转型中日趋削弱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就越来越带有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

四、经济格局已经由自主经济变成了殖民经济

1、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加快了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200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42万亿美元，顺差1020亿美元，2006年进出口总额1.76万亿美元，顺差1775亿美元，外汇储备达10663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实际利用外资，1978年到2005年累计达8091亿美元。2006年又实际利用外资735亿美元。这些都促进了我国GDP的快速增长。

2、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国内消费偏低；对外技术的依存度过高，自主创新能力偏低。

首先是对外依存度过大。2005年进出口总额相当我国GDP总额的63.6%，2006年进一步上升。这个比例较之美国、日本这样的外贸大国18%-20%的外贸依存度，都大大超过了。相对之下，我国的国内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支出构成中的比例明显偏低，而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1990年为62%，1995年为57.5%，2005

年为 52.1% (其中政府消费 14.1%, 居民消费 38%)。居民消费比例偏低, 是同我国贫富悬殊、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密切联系的。

再看看国际上的统计数字: 2005 年世界平均的国内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构成的 75.2% (其中居民消费占 62%), 发展中国家消费占 72.2% (其中居民消费占 58.9%)。由此可见, 我国的消费比例特别是居民消费比例, 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且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现在,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对外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同时又是国内消费比重最低的国家之一。这种现象是很不健康的。有一家国外媒体说: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国内消费、投资、净出口), 在中国是“两匹壮马(投资、净出口)配一匹瘦驴(消费)”, 并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存在某一天会翻车的危险”(《参考消息》2007 年 7 月 23 日载香港《亚洲时报》文)。2007 年上半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出现了多年少有的快速增长的态势”。这是好消息, 但要大幅度提高国内消费比例, 还是很不容易的。

另一个问题, 是对外技术依存度居高不下。过去原想引进外资可以做到“以市场换技术”, 实际上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虽然在引进外资的企业中, 我方通过“技术溢出”(FDI) 获得了一些浅层次的技术和某些经营管理经验, 但没有也不可能取得核心技术。目前, 我国对外技术的依存度高达 50%, 而美国、日本仅为 5% 左右。我国大约 90% 的企业没有自己的专利。在我国的出口商品中, 60% 来自外国投资的企业。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人士说: “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得到的只是一些漂亮的数字, 而美国和外国公司得到了真正的利润。”“反映巨大顺差的贸易统计数字, 使人误以为中国非常繁荣。”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董涛说: “所有这一切, 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一个芭比娃娃的售价是 20 美元, 但中国只能得到其中的 35 美分。”(美国《纽约时报》2006 年 2 月 9 日文, 载《参考消息》2006 年 2 月 11 日)。由于我国劳动力的工资只相当于美国的四十分之一, 所以外商获得超常的高利润, 而且这种高利润还在不断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 2006 年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 26.7%, 而同期其增加值的增长率为 16.9%。

3、若干地方的“外资饥渴症”和“洋腐败”, 损害了国家利益, 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达到更高的 GDP，提出所谓“不问所有，只问所在”的原则，患了“外资饥渴症”。他们往往向外资低价出售土地，不惜损害农民利益。某些人收受外商贿赂（包括由外商安排其子女出国等多种好处），出卖国家利益，对外商违法事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近年来，跨国企业在我国的行贿事件一直在增加。我国 10 年内至少调查了 50 万件腐败案件，其中 64% 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这种“洋腐败”现象严重地损害了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检察日报》2007 年 1 月 2 日）。

对外资的依赖，引起了包括爱国私营企业家在内的广大经济界人士的不满和反对。全国工商联主办的《中华工商时报》以《警惕外资依赖症》为题，发表署名文章说：“目前，江苏经济的主力是外资投入，一家跨国公司到江苏来设厂，产值动辄就是几亿、几十亿，经济指标迅速就能得到提升，所以各级政府都乐意通过招商引资来获得政绩，也因此招致了‘苏州经济患上了外资依赖症’、对本土企业的发展产生‘挤出效应’的指责。长三角一些地方政府既不相信国有企业能做好，又不相信民营企业能做大，于是为了追求政绩或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盲目引进外资，过度超前开放，甚至大搞‘外资崇拜’与‘内资歧视’，将好的土地等生产要素优先供给外资企业，导致地价越来越优惠，税收减免越来越大胆，各种政策底线不断被冲破，结果是加重了本土企业在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发展空间受到人为挤压，江苏本土企业难以与外资相抗衡，发展举步维艰。”该文还说：“随着外资依赖症的日益明显，江、浙地区的许多企业技术进步、自主研发的积极性，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化。例如浙江省的模具业曾经被日本企业纳入全球产业链，并在生产过程中进行了一定的技术转移。但就在当地企业决定进军高端市场时，却遭到日本企业的‘围追堵截’，对其进行设计封锁、技术封锁，甚至市场封锁。”（《中华工商时报》2007 年 7 月 17 日）

我国引进的外资企业，长期来让他们享受着低税率的“超国民待遇”。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 15%，内资企业名义税率 33%。这种对民族经济的自我歧视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当 2005 年我国政府要纠正这种不合理现象时，在中国的 50 家最大跨国公司竟然联合上书中央，反对取消这种不合理的低税率优惠，公开抛弃了他们一贯高唱的外国企业要享受与国内企业平等的国民待遇的口号。经过几年的反复讨论，终于在 2007 年 3 月 16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上通过了中外企业统一税率为 25%的《企业所得税法》，但如何贯彻落实，尚待今后努力。

4、外资大举并购我国优秀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各行业的龙头企业，使我国国民经济面临附庸化的严重危险。

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外资对我国从合资、合作到独资建厂，再到大举并购我国发展潜力巨大的优秀国有企业。他们的要求是：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 15%。这三个“必须”是一些跨国公司目前在华并购战略的基本要求。他们对我国的一般国有企业拼命压价，对好的国有企业则不惜高价收购。一些跨国公司认为，现在是收购中国国有企业的最好时机，收购价格正像中国的劳动者的工资那样，远远低于欧美；还可以利用中国企业原有的销售网络、原材料和能源供给渠道以及品牌，再加上外商的资本和技术，就可以逐步实现垄断中国市场的目标。

最近一个时期，外资并购我国企业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态势，其矛头直指产业控制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外资并购重点转向我国重要行业的排头兵，抢占制高点。其意图已不完全是商业性的，而具有明显的操控中国市场的战略指向。例如，工程机械制造行业的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轴承行业的西北轴承公司，油泵油嘴行业的无锡威孚有限公司，齿轮行业的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常州变压器厂，陕西鼓风机有限公司等。这些在我国制造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已经或正在被外国跨国公司并购重组。

第二，外资在我国的并购还表现出整体并购、“全行业通吃”的战略意图。美国的卡特彼勒公司，从 1995 年开始与徐工集团建立第一个合资企业起，就着眼于对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整体并购，已并购了山东工程机械厂，最近又试图通过控股投资方式收购厦门工程机械公司，还在谋求并购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工程机械集团、河北宣化工程机械集团。如果美国这家公司的这一布局得以实现，就可能“通吃”我国工程机械行业。

第三，外资在我国的并购还出现了联合行动，既有外国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也有它们与有关国家的投资公司或基金的配合。

据有关研究部门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

许多产业排名前 5 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我国 28 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 21 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这是何等严重的问题！

在钢铁行业，产能规模全球排名前两位的米塔尔公司和阿塞洛公司，目前都已完成了它们在中国的并购布局。2005 年 7 月，米塔尔以 26 亿元收购华菱钢管 37% 以上的股份；2006 年 2 月，阿塞洛以 20.86 亿元收购莱钢 38.41% 的股份。阿塞洛虽然没有取得控股地位，但是已经与莱钢的另一大股东集团的股份持平。有消息指出，米塔尔、阿塞洛等已广泛接触国内地方钢厂等二线企业，如包钢、昆钢等，大有“将并购进行到底”的势头。

在机械行业，2005 年 10 月，国际著名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美国凯雷集团，宣布以 3.75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控股权，这是国际投资基金收购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控股权的第一例。徐工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开发、制造和出口企业，徐工机械则是其最核心的企业。又如：大连机电厂是中国最大的电机企业，一直是国内电机行业技术发展的领航者。1996 年与新加坡威斯特公司合资后，连年亏损，仅 3 年时间就被新方收购，一半以上职工失业，技术平台瓦解。再如：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是全国唯一能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其产品占居国内市场的 95%。1997 年以它的优质资产与美国一公司合资，7 年后被美国公司全部收购。从此，中国大型农业机械领域的技术平台瓦解，农业大国中国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市场被美国公司垄断。再如：中国化工机械制造的设备生产基地和龙头企业锦西化机，拥有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制造、维修技术，2004 年全集团盈利 800 多万元。2005 年，在葫芦岛市政府的主导下，锦西化机与德国西门子合资，丧失了对其最大且唯一盈利的分厂的控制权。从此，国内大型化肥设备制造、维修依靠的对象变成了外国公司。

在水泥行业，并购风潮也不断涌起。2006 年 1 月 6 日，海螺水泥发布公告称，摩根士丹利旗下添惠亚洲有限公司与国际金融公司，分别买下海螺集团持有的海螺水泥 10.51% 和 3.82% 的股权；3 月初，世界第二大水泥企业瑞士豪西蒙公司宣布，以 1.25 亿美元接下华新水泥为其定向增发的 1.6 亿股，如若审批通过，豪西蒙在华新水泥的股权将由原来的 26.1% 增加到 50.3%，从而实现对华新的绝对控股；4 月 18 日，世界水泥业老大拉法基公司一举收购了贵州本土 3 家大型水泥厂，此外拉法基公司还控制了四川双马 89.72% 的股权。外资在我国水

泥行业的并购及参股已到了全面开花的地步。我国前五大水泥企业,除了浙江三狮外,其他 4 家企业均被外资并购。

在流通行业,2005 年商务部共批准流通行业外资企业并购项目 24 个。其中,上海永乐电器公司一次性向外商转让 61 个店铺;英国 TESCO 公司在境外收购了我国内“乐购”25 个大型超市 50%的股份。

对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如果发生西方跨国公司对我国企业的大量并购,势必对我们民族经济的成长与发展形成遏止,对我国的某些幼稚的新兴产业更会形成“封杀”的威胁,从而危及我国经济的独立自主,面临附庸化的严重危险。特别是在能源、基本原材料、交通等基础产业和金融、流通等关键行业,外资市场控制率过高,将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不可忽视的威胁。如果我国的一些关键装备部门包括轴承、齿轮等骨干机械企业被外资并购,还有可能对我们的国防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张承耀研究员在总结这些事件的共性时说:我们要“利用外资”,结果反而“被外资利用”;企业往往“拱手相让”,合资成了“外商与官员的双赢”。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授路风等专家尖锐地指出:各地正在把引进外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国企改革的主要途径,而地方政府往往追求短期政绩,其主导的这类合资与引进技术没有必然关系;相反,合资后由外方控股,原有的研发队伍和技术积累将会大部分解体、流失(引自《半月谈》记者周盛平、赵文:《受制于‘外’,中国企业入骨之痛》,见该刊 2006 年第 3 期)。

在对外贸易和外商在华投资迅速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国内消费过低和对外技术的依存性过高、自主创新能力过低的问题。2005 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 64%,大大超过美国、日本这样外贸大国 18%-20%的对外依存度。同年,我国国内消费只占 GDP 支出构成的 52%(其中除政府消费外,居民消费只占 38%),明显低于 1980 年国内消费支出占 65.5%(其中居民消费占 50.8%)的比例,这说明,GDP 这块“蛋糕”切给居民消费的比例比过去明显地变小了。同国际上比,更是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国内消费支出平均比例 72.2%(其中居民消费占 58.9%)。这种很不健康的状况是同我国贫富悬殊、社会保障严重滞后的问题密切联系的。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 50%,而美日等发达国家

只有 5%。以市场换技术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巨额出口贸易的利润绝大部分归于外商，我国工人只得到相当美国工人四十分之一的低工资，却给我国留下了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工人患职业病等诸多问题。最近，外资在我国从合资、独资建厂发展到大举并购，特别是不惜高价并购我国发展潜力巨大的优秀国有企业，已出现了“井喷式”的态势。许多行业的排头兵已经或正在为外商并购。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 5 名的企业几乎都为外资控制；我国 28 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 21 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这一过程中，“外商与贪官双赢”现象所在多有。我国 10 年内调查的 50 万件腐败案件中，有 64% 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检察日报》2007 年 1 月 2 日）。这说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面临着日趋附庸化的严重危险。

正如北京大学哲学系赵光武教授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资本的国际大循环；其中存在着不平等交换，存在着中心与外围的差别，其结果必然是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应以内向型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辅，发展外向型经济为内向型经济服务，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区域性经济合作，抗拒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见《21 世纪中国的战略选择》第 2 页，西苑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六、收入分配已形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格局

关于我国最富人群与最贫穷人群的差距，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 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财产最多的 20% 的人口拥有 59% 的财产，而财产最少的 20% 的人口只拥有不足 3% 的财产，两者比例约为 21: 1。又据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共同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指出：“最高收入 10% 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 45%，而最低收入 10% 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 1.4%。”（该书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第 3 页）这就是说，贫富收入的比例约为 32: 1。

贫富分化的现象明显地表现为基尼系数的变化上。我国 1984 年基尼系数为 0.24（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信息报》报导）。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

特别是 90 年代初以来, 基尼系数迅速增大。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主持的抽样调查材料: 1994 年我国基尼系数为 0.434 (李强《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的分析》, 载《科学导报》1995 年第 8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在美国福特斯基金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赞助下进行抽样调查的材料: 我国 1995 年基尼系数为 0.445 (经济所课题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 财经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同志所说的数字: 我国 1994 年的基尼系数, 按人计算为 0.434, 按户计算为 0.445 (见《中国信息报》2001 年 3 月 10 日对该报记者的谈话)。

——社会学家周景彤测算的我国的基尼系数: 1996-0.424, 1998-0.456, 1999-0.457, 2000-0.458 (见《经济日报》2001 年 8 月 30 日, 周景彤:《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有多大》)。

据世界银行测算, 中国基尼系数, 1998 年为 0.403, 2003 年为 0.447。该行最近出版的《世界发展指标——2007 年》测算, 我国 2004 年的基尼系数已达 0.469。这一报告中列举的各国基尼系数见表 4。

表 4 中国与若干国家的基尼系数比较

国家	年度	基尼系数	国家	年
中国	2004	0.469	美国	2000
0.408				
印度	2004-2005	0.368	巴西	
2004	0.57			
印尼	2002	0.343	保加利亚	
2003	0.292			
日本	1993	0.249	法国	2000
0.283				
韩国	1998	0.316	德国	2000
0.283				

伊朗	1998	0.43	意大利	2000
0.36				
泰国	2002	0.42	荷兰	1999
0.309				
埃及	1999-2000	0.344	俄罗斯	
2002	0.399			
南非	2000	0.578	英国	1999
0.36				
加拿大	2000	0.326	澳大利亚	
1994	0.352			

注：世界银行编《世界发展指标——2007年》第60页。

从表4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基尼系数，虽低于南非、巴西等极少数发展中国家，但已经超过了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美、英、法、德、意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从上述数字看，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现在我国离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越来越近了，还是越来越远了？

近十多年来，随着所有制公退私进的发展，我国居民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据现有材料，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1995年已高达0.445（中国社会科学院收入分配课题组，1999），2004年又扩大到0.465，2005年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2005）。这样严重的贫富悬殊，显著地超过了国际一般公认的0.4的安全警戒线，不仅高于若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高于印度、印尼、埃及、韩国等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资料）。一方面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纷纷涌现；一方面是工人农民的大部分相对贫困化和部分的绝对贫困化。这种状况必然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

根据国家工商管理局和全国工商联关于工资情况的调查，私营企业雇工的月均工资，上世纪末相当于国有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83%，2003年降到55.1%，差距更大了。

从国际上用以描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以0为绝对平均，1为绝对不平均，一般以0.4为安全警戒线）来看，据我国有关学者和学术单位调查测算，我

国 1985 年为 0.24, 1995 年上升为 0.434 (或 0.445), 2000 年又上升为 0.458。据世界银行测算, 中国基尼系数 2004 年进一步上升为 0.469。1995 年及以后的基尼系数, 越来越大地超过了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仅低于巴西、南非等少数国家), 也超过了法、德、英、美、意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公开复辟资本主义的国家。关于我国富有人群与贫穷人群的差距, 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共同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 (2004)》指出: “最高收入 10% 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 45%, 而最低收入 10% 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 1.4%。”这就是说, 两者的比例约为 32: 1。新资产阶级兴起, 工人阶级不仅经济上贫困化, 而且政治社会地位大大降低。据上海市关于居民就业意愿的调查, 愿意做工人的只占 1%。近年来, 国家在二次分配 (财政分配) 上采取的对贫穷居民的各种补助措施, 对于缓解社会矛盾有一定的作用, 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富悬殊的状况, 何况私有制经济的比重还在继续提高。这说明, 我国已形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格局。现在, 离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是更近了, 而是更远了。

由于所有制结构的上述变化, 必然产生收入分配的不公。极少数人短期内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 工人、农民大部分相对贫困化 (绝对值有增长, 但幅度远低于经济发展速度), 小部分人人绝对贫困化。从国际上用以描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 (以 0 为绝对平均, 1 为绝对不平均, 一般以 0.4 为安全警戒线) 来看, 从 1985 年的 0.24, 上升为 1995 年的 0.434, 2004 年的 0.469, 已超过了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仅低于巴西、南非等少数国家), 也超过了法、德、英、美、意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公开复辟资本主义的国家。又据我国权威部门专家调查结果: 我国最高收入 10% 的富户财产占全部居民财产的 45%, 而最低收入的 10% 的穷户的财产仅占 1.4%, 两者比例约为 32: 1。国家在二次分配 (财政分配) 上采取的对穷者的各种补助措施, 虽有一定缓解作用, 但不可能根本改变贫富悬殊的格局, 何况私有制经济的比重还在继续扩大。

我国公私比重和分配格局的上述变化, 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形成的基础上于二十几年的短期内实现的。这一实现过程与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官商勾

结、贪污渎职是密不可分的。有关方面总结了“国有资产流失的五个主要方面”和“职务犯罪十大特征”(见本文收入分配的部分),有助于了解我国新生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腐朽现象。

收入不平等和社会两极分化

改革以来,尤其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中国人口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社会呈现两极分化趋势。中国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在没有发生革命、没有出现社会剧烈动荡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面貌在不到 20 年时间发生如此巨大改变,的确不同寻常。很多人还不习惯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因此,有关改革的正义性问题不时被提了出来。放眼世界,人们很容易发现,如果说中国贫富分化的速度异乎寻常,那么,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目前高度不平等状况则完全不是特例。无论经济水平如何,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都比市场经济国家更平等。当今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例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和南非。发达国家中,既有贫富差距很大的例如美国,但也有更多国家的收入差距低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例如北欧和欧洲实行福利或社会市场经济的国家。这样说来,没有如此明显的收入差距,中国很难算得上是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究竟多大?不同来源提供的具体数字不太一样,但有几点不存在很大争议:第一,按照通用的基尼系数衡量,中国属于世界上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第二,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惊人;第三,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甚至超过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和世界组织以及各种研究都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存在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贫富分化导致了社会人群的两极分化。有研究表明,自 1992 年以来,中国总体基尼系数一直等于或者大于 0.4,2004 年达到 0.4418。20 亚洲开发银行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的贫富差距已位居亚洲第二,超过了除尼泊尔之外所有亚洲国家。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 2006》显示,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 94 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 29 个,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基尼系数比中国高。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在 0.2-0.3,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处于类似水平,在世界上属于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那时中国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城乡差别,根源主要是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改革后,无论城乡还是城乡内部的收入差

别都显著扩大，推动整个国家贫富化加剧。1978 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的比例为 1 比 2.57，到 2004 年已经扩大到 1 比 3.21。在城镇人口中，1997 年最低与最高收入差距是 4.22 倍，到 2004 年，两者的差距拉大到 8.87 倍，7 年扩大了 1 倍多。²² 据称，鉴于富裕人口的收入中通常相当一部分属于黑色和灰色收入，因此，他们的收入增长幅度很可能比显示出来的更大，城镇人口高低收入估计可能高达 12 倍以上。在世界银行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国家排位中，2005 年中国在 120 个国家中排第 85 位，在中国后面只有 35 个国家，其中 32 个是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大于所有发达国家，大于所有已经转上资本主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在休克转型中以造就金融寡头著称的俄罗斯，也大于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之外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依然没有任何逆转的迹象。照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问题不是在经济发展上赶上发达国家，而是在贫富差距上赶上世界上两极分化最极端的国家。

收入不平等导致两极分化，中国社会中的阶级/阶层分化不亚于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个特点是社会上不存在一个富豪阶层，从各级政府干部到国家最高领导人，从大小企业管理者到工程技术权威，从各类专家学者到著名文艺体育界人士，这些传统上被视为社会精英的阶层，当时却并不拥有传统上与其身份地位相称的财富，基本上是有名望而无财富。社会“精英”的这种状态堪称中国特色或社会主义特色，在任何“正常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改革后，一个新富阶层随着市场经济的回归重新崛起，在国际化/全球化的潮流中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了与世界上流社会的接轨。这个新富阶层在财富水平、消费模式、生活方式、趣味爱好以及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都与世界各国的上层越来越接近，而与本国的工农劳动阶层越来越疏离，虽同为国人却实际上形同路人，各自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2007 年，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估算，这个所谓“中国新社会阶层”大约有 5000 万人，在中国 13 亿人口中不足 0.4%。尽管如此，就绝对数量来说，中国的新富阶层人数已然相当于一个世界人口中等大国。这个比例极小而绝对数庞大的新富阶层拥有巨大消费能力，成为国际奢侈品销售商的新宠。改革近 30 年来，中国人均财富在世界排名仍在一百多位，只不过是美国人均财富的 2%，但中国近年来的奢侈品消费却高居世界第二。

中国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根据国家统

计局的数字, 2006 年, 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过 11,759 元 (大约相当 1500 美元), 同期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更是只有 3,587 元 (不到 500 美元)。就在这样低下的人均收入水平上, 中国却造就了世界级的巨富。在《富布斯》2007 年身价十亿美元以上的全球 946 名富豪榜上, 中国大陆与巴西和西班牙一样, 各拥有 20 人, 超过法国、意大利、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墨西哥、韩国等国家。另据统计, 2007 年中国已成为亿万富豪人数第二多的国家, 仅次于美国。美国《富布斯》杂志 2007 年 3 月 8 日发布, 上榜者分属于 55 个国家/地区, 其中美国人最多, 高达 415 人, 其次为德国 55 人, 以盛产暴富寡头著称的改制后的俄罗斯位列第三, 印度以 36 人上榜名列第四位, 第五位和以后依次为英国 29 人, 土耳其 25 人, 日本 24 人, 加拿大 23, 香港 21, 台湾 8 人。

全球最大富翁榜上既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有所谓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也有经济落后、人均收入低下的人口大国例如印度和中国。在市场经济中, 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实力根本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 但弱国穷国照样能够出产超级富豪, 少数富人的富裕程度毫不逊色, 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无疑, 中国在这个领域中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迅速接轨。富人阶层的另一端是贫困阶层或所谓“弱势群体”。他们中除了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所谓边缘人群例如乞讨、流浪者之外, 主要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广大劳动者。也可以说, 除了比例极小 (尽管绝对数量可观) 的暴富阶层以及大约 15-20% 的所谓中产阶级之外, 其余人口都属于这个群体。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状态虽然并不相同, 但有一个共同的弱势, 那就是, 相对于有产者特别是掌握生产资料的大资本家阶级, 他们在经济地位上处于绝对劣势, 不得不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缺乏在劳动报酬、工作条件和劳动保护等方面讨价还价的能力。与富翁群体一样, 弱势群体也是改革后出现的“新兴”阶层, 是社会分化硬币的两个方面。这个“新兴”群体的出现在农村与解散集体经济、重返个体生产有关, 而在城镇, 则是企业改制或私有化的直接后果。企业改制导致国企纷纷败北, 尤其是中小企业在抓大放小的口号下或者关闭或者转为私人所有, 导致职工与生产资料彻底分离, 大量劳动者失去工作, 流向了社会底层, 形成了以中小企业下岗失业职工为主体的城市弱势群体。他们丧失了原有就业提供的医疗、养老等福利待遇, 社会地位越来越向原来就缺乏这些保障的农村进城劳动力靠拢。这个群体距离赤贫往往只有一步之

遥。改革初期，由于当时的收入分配仍然比较平等，经济的快速增长显著减少了贫困人口数量。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到 20 世纪末彻底消除贫困人口的政府目标宣告破产。根据政府公布的数字，2006/07 年，中国贫困人口仍有 4800 万，其中农村 2600 万，城镇 2200 万，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 3.7%。由于中国贫困人口的标准很低，远远达不到国际上通常采用的人均日生活费 1 美元的水平，中国的贫困家庭算得上是一种高度贫穷。如果采用国际通用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约为 1.35 亿，相当于总人口的十分之一。2006 年 12 月 1 日，世界银行专家在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在 2001-2003 年期间，中国经济以接近 10% 的速度增长，但 13 亿人口中最贫穷的 10% 人群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 2.4%。还有迹象表明，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这份报告再次表明，人口的收入并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水涨船高。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一个实际收入减少的庞大群体，据说全球还是第一次记录到。这也许算的上中国改革创造的另一个“奇迹”。经济增长与贫困共存的现象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顽症。例如，在人均收入大大超过中国的拉美地区，早就存在这种所谓“增长性贫困”，即一方面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贫困现象恶化。看来，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无论经济是否增长，都必须接受社会两极分化这个后果。

由于财产收入分配的两极化，必然出现生活的两极化。一方面，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不仅享受着住豪华宅、吃豪华宴、坐豪华车、穿名牌服等等超乎常人的生活，而且若干人豪赌、嫖娼、包二奶（包三奶、包四奶……），挥金如土。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虽居世界第 4 位，但每人平均国民总收入尚居世界第 128 位的情况下，我国已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三大国，并正向第一大国迈进（奔驰车销量已占世界第一）。另一方面，众多的劳动人民处于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的困境中。有些贫苦居民为生计所迫，卖血、卖淫（估计全国至少 500 万人）、卖器官、当包身工、自杀甚至铤而走险。全国每年“群体事件”数万起，刑事犯罪层出不穷。

各方媒体对上述情况有种种评说：

英国《每日电讯报》2004 年 2 月 27 日报道：据中国政府自己的研究人员说，在共产主义制度实行了 50 年之后，现在中国城市的富人与农村的穷人间

差距是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的一家主要研究机构社科院的一份报告说，城镇居民的收入目前是农村居民的 3 倍。如果将非货币性因素——如只有城镇居民才能享受的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好处——考虑进去，城乡收入的差距将达到 6 倍。令政府感到不安的是，这个国家快速的经济改革已经将很多人抛在后面。这些人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美国《纽约时报》2004 年 2 月 29 日刊登了题为《中国富人的生存信条》的文章说：如今中国的富人都住进了大城市郊区的别墅里。这些别墅平均售价 80 万美元，四周有围墙，还有 24 小时保安巡逻。尽管如此，这些富人几乎总是成为被抢劫的目标，抢劫犯在情况危急时会起杀机。社会学家用于判断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的最新标准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比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的更大。中国的一些精英开始相信世界信奉的是达尔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这个世界上，关系和智慧意味着一切，平等这个古怪的观念毫无意义。（以上两条均见 2004 年 3 月 3 日的《参考消息》）

美国《纽约时报》2006 年 2 月 26 日的文章说：“中国至今虽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中国大陆虽然早已经事实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但现今中国人仍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为了达到新世界的远景，部分人要做牺牲。只不过，过去的历史前进的终点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现在则是市场经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达到使少数人富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远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解释穷人必须老老实实地受苦的合理性的工具。”

香港《南华早报》2003 年 7 月 3 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领导人“宣布共产党今后将接纳私营企业主加入它的队伍。这一宣布是共产党的惊人之举。”“在共产党方面，它的调整反映了中国社会人口构成成分的改变。这种变化是过去 22 年中实行经济改革的结果。”“正在宣传的一个理论——被称为‘三个代表’——的过程中，已经认真地为扩大党的队伍奠定了基础。”“中国完全可以这样肯定中国的资本主义，那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我国国内的媒体上，对于目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有多种说法。

有人说：“收入不均等是发展的动力。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基尼系数不适用于中国。以此炒作，是反对改革。”

有人说：“现在所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看上去好象有道理，其实是在蛊惑人心。”

有人说：目前存在部分居民收入悬殊问题，但不存在两极分化。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应当由国家财政增加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拨款来解决，不应当涉及企业所有制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是：国家管公平，企业管效率。

有人说：每人平均 GDP1000 美元——3000 美元的时期，是一个必经的“事故多发期”。等到我国人均收入再提高，度过了这个时期，贫富悬殊情况就会自行改变。

有人说：根据“库兹涅茨定律”，低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是比较低的；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基尼系数必然提高；再上升到高收入水平时，基尼系数又会降下来，全部过程是“倒 U 型曲线”。我国目前正处在“倒 U 型曲线”曲线的左侧（上升），等达到高峰后就会由右侧下降。

从目前实际情况看，改革的结果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正在甚至已经被私有制所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甚至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样，就造成了大批工人下岗、失业或者由国有企业的主人翁变成私营企业的雇佣奴隶，大批农民失地，官商勾结，贪污腐化，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反思改革的声浪越来越高。

2010 年 06 月 13 日 07:49 北青网-北京青年报陈筱红

在中国，追求新贵族的生活方式现在需要 1.1 亿元，比去年提高了 22%。昨天，胡润发布了其最新的“2010 胡润富豪消费价格指数”，其消费价格指数为 11.3%，去年同期则为 4.6%；这意味着，现在要花更多的钱才能进入中国的精英圈。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已拥有 87.5 万个千万富豪，比去年增加了 6.1%，其中包括 5.5 万个亿万富豪，比去年增加 7.8%。

2011 年 3 月 14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2 日修改

第六篇第二章第三节 政治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二章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

第三节 政治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以下为网文摘录)

一、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斗争的概况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修正主义，这是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在社会制度、政权性质、政治领导权和意识形态主导权四大领域中坚持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这四大领域的斗争都是全局性的、主导性的斗争，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只限于“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

回顾一九七六年以来的历程，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一九七六年十月，毛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右派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逮捕了中央领导层中文革左派领导人。

一九七〇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右派领导人不仅在全国范围内清除了文革的骨干力量，而且在领导层中清除了在文革中提升上来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公开审判所谓“江青反革命集团”，彻底否定文革大革命，否定建国以来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

八十年代，社会上就有了所谓“解冻社”，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有个“中国人权小组”，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上海有个“民主讨论会”，鼓吹“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

90 年代以来的阶级斗争又以新的形式（除了从外部进攻以外主要从内部进攻）出现，而其深度又大大超过以前，斗争的后果更是令人震惊。睁开眼睛看看当前的实际情况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正在甚至已经被资本主义（中

国的和外国的)私有制所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导地位正在甚至已经被资产阶级理论和修正主义所取代;新资产阶级已经在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内取得了合法地位,其力量日益膨胀。

近年来,在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们当中,出现了大同小异的两种观点:一种主张推行野蛮的资本主义,公开宣称贫富差距拉大是“前进的动力”,贪污腐化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滑润剂”,等等。这种观点当然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另一种观点是推行文明的资本主义,主张在收入的再分配(财政、税收、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资金等)中给人民群众、包括农民群众一些好处;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程序上加以规范,不要让个别资本家独占,要照顾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等等。

资产阶级提出新的政治要求

2006年3月4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西山召开的、若干“主流派”学者参加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被称为“新西山会议”)。与会人士声称:现在经济改革“大局已定”了(当然他们还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即私有化,包括土地私有化),今后重点是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有人提出了下列的政治纲领(会上无人反对):

——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没有注册登记”,因而是非法的,要求“共产党分成两派”,最好是实行“多党制度”,效法“台湾模式”;

——取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大会“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具有“反议会性质”,要求建立西方式的议会制度;

——取消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剥夺共产党的军权”;

——实行个人自由:要给他们以“真正的个人自由”、“言论自由”;但同时又主张“不要争论”,不准人民对他们提出不同意见。

这种新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者明目张胆地向《宪法》、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挑战,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坚决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2006年12月,又有些人采用一种比较隐蔽的手法,妄图在新的伪装下实现上述主张。有一篇文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文中歪曲客观事实,说什么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胜利了”,欧盟的15个国家中已有包括英、德、法国在内的13个国家实现了民主社会主义,甚至说美国只要民主党执政,也就“赤化”了。文中还用断章取义、肆意篡改的手法,

胡说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已经否定了他们提出的消灭私有制、暴力革命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主张。文中竟然把受到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判的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斯坦，硬说成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诬蔑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修正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一是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三是反对共产主义作为科学思想体系和理想的社会制度。这就彻底暴露了它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本质。这种思想不是要“救中国”，而是要颠覆社会主义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某些缓解社会矛盾的改良主义主张，也只是为了充当资本主义的“医生和护士”。最近已有许多人写文章批驳这种假社会主义。应当说，这种违背我国宪法、违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荒谬言论，同样会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坚决反对。

二、国体的变化

（一）人大、政协组成人员发生了变化

1975 年四届人大，代表共 2885 人，工农兵代表占 67.95%；1978 年五届人大，代表共 3497 人，工农兵比例为 61.68%；1983 年六届人大，代表共 2978 人，工农兵比例 35.57%；1988 年的七届人大，代表共 2970 人，工农兵比例 32%；1993 年八届人大，代表共 2978 人、工农兵比例 29.6%；1998 年九届人大代表共 2979 人，工农兵比例 27.8%；2003 年十届人大代表共 2985 人，工农兵比例 27.4%。现在的比例，只会比 2003 年更低。

据《中国统计》2007 年第一期有关文章指出：“统计数字表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从 1980 年初到 1990 年代末，工人代表的比例从 27%降到了 11%，农民代表的比例从 21%降到了 8%，而干部的比例由 13.4%升到了 33.2%。这使得强势群体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优势，而弱势群体无法与之抗衡，制约能力由此被大大弱化了。”（见李鸥《和谐取决于结构》一文，载该刊第 45 页）

十一届全国人大安徽团 114 名代表构成比例：各级官员为 52 名；文教卫界别为 26 名；企业家界别为 35 名 农民界别为 1 名，工人界别为 0

何帮喜（安徽希玛欧美佳装饰材料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安徽企业商

会会长，安徽省工商联副主席）如何成为全国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2000 年，周光全带队到北京招商时与无为县在北京创业人员何帮喜相识。期间，何谈到准备回家乡投资，周表示欢迎。2001 年底的一天，何帮喜到周光全家以看望周母的名义送给周 5000 元人民币，并请周对其 2002 年回来投资，搞地办企业给予关照，周答应。2002 年上半年，何帮喜在无为县二坝经济开发区征地办企业，认为该县提出地价每亩 2 万元的价格太高，遂请周帮忙解决，周即电话要求时任无为县县长在地价上要给何以优惠。同年 7 月 12 日，二坝经济开发区以每亩 1.4 万元的价格与何帮喜签订了 87.63 亩土地转让合同。

2002 年 9 月 29 日，何帮喜在无为县注册成立了安徽希玛伟业科技工业有限公司。同年 10 月，何帮喜以扩大企业知名度为由，请周帮忙将其推荐为全国人大代表，周答应。同年 12 月 2 日，周光全主持市委常委会，研究确定何帮喜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后经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何落选。但当选为省第十届人大代表。为对周光全的帮助表示感谢并想继续得到周的关照，何帮喜于 2003 年 5 月份的一天，在北京送给周 4000 美元，周收下。2003 年 8 月，何帮喜在无为二坝经济开发区征用的土地上开始兴建装饰材料厂，何要求安装双电源两路专线供电，而供电部门认为没有必要。何遂请周帮忙解决，周即电话要求时任巢湖供电公司总经理满足何的要求。2003 年 8 月 25 日，巢湖供电公司为其安装了双电源两路专线供电。

2003 年 9 月份的一天，何请被告人周光全为其在北京的保龄球生产基地迁到巢湖，需要征地之事给予关照，周答应。同年 9 月，周光全与何帮喜以及时任巢湖开发区主任徐某等人出国考察，在上海浦东机场，何送给周 2000 美元，周收下。出国期间，周光全要求巢湖开发区主任将何帮喜的保龄球生产基地争取到市开发区。关于地价问题，巢湖开发区主任提出每亩地的土地出让金 2 至 3 万元，何帮喜提出 180 亩地，土地出让金 200 万元；为此，双方僵持不下。后周光全要求巢湖开发区主任为留住名牌企业，按何的条件办。2003 年 11 月 18 日，巢湖市开发区规划土地局与何帮喜签订了 180 亩土地（200 万元土地出让金）转让合同。何帮喜为表示感谢，在 2005 年、2007 年春节期间的，各送给周光全 3000 元人民币，计 6000 元人民币，周均收下。

何帮喜于 2003 年初在周光全的帮助下，“当选”为安徽省人大代表后，又

攀上了安徽省政府驻京办事处某主要领导，并很快取得了对方的认可。这位领导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将在北京的一些安徽籍的重要领导，向何邦喜一一引见。2006 年上半年北京安徽企业商会成立时，由于上述领导的极力推荐，何邦喜涉嫌被安徽省驻京办直接“内定”为北京安徽企业商会会长。2008 年 1 月安徽省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时，此领导也为了给何邦喜增加选票调动了诸多人脉关系。

何邦喜终于在 2008 年 1 月“升格”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1 年 3 月 4 日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他做过一些调查，发现有 38 名全国人大代表都是亿万富翁，要比美国国会最富有的议员还要富有。想问全国人大在解决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方面将采取怎样的措施？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发言人李肇星对这个数据回应，“我也感到钦佩，你做了那么多调查研究，我没有做过，所以我也不知道你说的 38 名亿万富翁代表的情况是否真是如此。”

不过他强调了宪法对人大代表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对于贫富差距问题，李肇星表示，中国的目标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使全国人民逐步都过上小康生活。但现在确实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存在着城乡差别、存在着贫富差距等一系列问题。

他表示，希望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富人，但是富人必须依法致富。“我已经发现有许多这样的好公民，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变富了，不仅严格遵守法律，而且还慷慨地做一些公共事业，比如扶贫、建立希望小学、救灾等等。”

（记者杨华云）

调查

胡润：代表委员中有 156 位亿万富豪

胡润富豪榜统计去年富豪参政情况，称所占比例下降

胡润富豪榜从 1999 年发布首届榜单开始，就一直统计拥有政治身份的富豪数量。昨日，胡润表示，去年 1300 多名富豪中有 156 名是全国人大代表或者全国政协委员。

“我的印象是，比较大的变化出现在 2002 年党的十六大之后，2003 年上榜富豪

100 人，其中政协委员有 23 人，人大代表是 11 人。”胡润表示，随着中国的亿万富豪群体急剧扩大，这些年来拥有政治身份的富豪绝对数量是增加的，但占据富豪榜的比例却是下降的。

胡润对于越来越多的富豪拥有政治身份表示：“这也反映了民营企业更多受到政府的认可。”在去年 10 月发布的 2010 年富豪榜中，1300 多名财富超过 10 亿人民币的富豪中，共有 167 位富豪拥有国家政治身份，其中包括 80 位全国人大代表和 76 位全国政协委员。除此之外，部分富豪拥有多重政治身份，例如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是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全国工商联常务执委。其中，大连万达老总王健林拥有政治身份最多，他既是全国政协常委，又是党的十七大的代表，还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2010 年胡润百富榜共有 1363 名富豪上榜。（记者张奕）

“当人大代表跟钱没关系”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研究室主任程湘清认为，之前专家也曾经讨论过“企业家当人大代表”的问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里不存在企业家不能当人大代表的规定。

“对于代表的身份没有什么限制条件，只要符合法律程序就能当代表。”程湘清表示，人大代表无论挣多少钱，只要是靠劳动正当得来的，就会受到法律保护。“当人大代表跟钱完全没关系，关键是这个人是不是有责任心和民主法制意识。”程湘清认为，人民群众选举人大代表时肯定不会因为对方是富人就投选票，而是会考虑对方是否能替百姓说话，能帮百姓真正办事的人。（记者 杜丁）

“参政议政跟贫富没有关系”

这个新闻我也看过，对于富豪代表或委员参政议政，我觉得任何一个社会上的群体都应该有代表在人大和政协里，这个应该是正常的，这跟是否贫富没有关系。作为一个参政议政的平台，应该能使各方面的代表委员有正常表达自己真实诉求的机会。

人大代表是选出来的，政协委员是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等推荐，然后进行协商才产生的。对于是否富豪并没有名额规定。当然，我们在选举代表、推荐委员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到社会方方面面的代表性，要注意他们之间合理的人员结构和合理的比例。

——全国政协委员张皎（记者 汤旸）

（二）基层政权组成人员发生了变化

一些“先富者”占有了较多的财富，必然要求政治上的统治权。2004年初，《重庆日报》记者写道：“‘富人’治村是大势所趋，”“‘富人’治村的时代已经到来。”该记者报导了重庆市北渝区玉峰镇6个村的24名村官中，私有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占一半以上。又据浙江省民政局提供的材料，该省2002年选出的13万新一届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占到30%。其中，“先富群体”在义乌市村委会成员中占60%，在村委会主任中占65%。（见《商界》2004年第1期）。又据中央电视台在一个以《村官的价格》为题的节目中报导，河津市下化乡老窖头村村民王玉峰为拉选票，发给选民共计223万元现金。后被人揭发，才被依法没收。还有一篇题为《600万元选出高价村官》的电视报导。村官本来是基层的小小“芝麻官”，为什么有人出如此高价贿选？主要是可以从征地和乱收费中捞取钱财（见《中国电视报》2002年2月2日）。

三、政体的变化

（一）政治体制的基础、结构和职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确

在一些西方国家看来，以共产党执政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政治体制不民主，是权威主义甚至极权主义。中国内部也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要求实行西式民主或曰“民主化”，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尽管如此，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似乎并不能说明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

首先，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以政治体制的多样化特征。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多党大选的所谓民主制，发展中国家则存在君主制、个人独裁、军人政权、大选民主等多种多样的政治制度。按照西方的标准，所谓真正的民主国家大致只有它们自己，其他国家最多只能算“有缺陷的民主国家”，否则便是“混合体制”或甚至“集权国家”。因此，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西方排名机构把中国归入非民主国家，顶多只能说明中国还不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一员，与他们的所谓民主制有所不同。8

其次，中国目前虽然维持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但其基础、结构和职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不再主张“共产”即公有制，而是以发展经济为己任，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强调建立“和谐社会”。政府也不再直接组织生产，而是转变职能，服务于市场，在竞争中充当“裁判员”，调和社会不同集团之间的对立和矛盾。

再次，在国际舞台上，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政府提出改变现存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不打算和不愿意按照西方设定的游戏规则行动，而是努力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力图冲破这种国际秩序设置的障碍。改革后的中国政府则逐步接受了现存的世界秩序，热衷于与世界“接轨”，遵循现有规则，积极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加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各种国际组织。最近一些年，中国开始提出愿意做“负责任的大国”，言外之意是中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不负责任”，即不会做破坏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事情。中国从一个反对现有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斗士，变成了它的积极参与者和维护者，认可自己在国际分工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总之，无论在政治体制的基础、结构和职能上，还是在政府的主张上，中国与世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本质区别。但即使如此，国内外一些势力仍然对中国政治体制表示特别“关注”，念念不忘施压促变，要求中国转向所谓民主制。事实上，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对共产党这个字眼过于敏感。国内外资本主义势力反对的是共产党执政的一党制，而不是一般的所谓一党专政。因此，尽管改革后的中国把西方大国当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承认自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利益相关者”，也早已放弃了推动世界革命的立场，但由于中国名义上仍然由共产党执政，这些势力仍然不放心，必欲彻底消除“共产党因素”而后快。

有人提出了一个富有洞见的新观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不断打压和试图和平演变的目标，准确地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因素”。所谓共产党因素，就是试图在全人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因素，它把跨国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人类实现大同作为自己的目标。拿民主说事，不过只是一个借口罢了。

（二）政府能力弱化

政府的规模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急剧膨胀。依靠国家财政供养的人员大幅

度增加，以至官员在平民中的比例翻了一番还多。同时，行政经费出现惊人增长，1978 年到 2003 年，中国 GDP 增长了 31 倍，年均增长 1.2 倍，而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了 87 倍，年均增长 3.5 倍

1986 年到 2005 年，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4.6 倍的情况下，中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 20.5 元增加到 498 元，增长 23 倍。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政府在改革中变成了一个成本昂贵、资源耗费越来越多的政府。

在依法治国的口号下，改革后立法突飞猛进。法律虽然多了，法律法规得不到切实执行却越来越变成寻常之事。

刑事犯罪活动猖獗，导致社会安全感低下，遍及城镇的防盗门窗成为大众自我防护的无奈选择，也显示了公众对政府维持社会治安的能力信心不足。

从庄严承诺的大政方针到政府限期目标，政府越来越说得到却做不到。政府甚至没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官员。改革以来，官场和官员腐败不断升温，以致中国由一个清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在国际透明组织的统计中，中国早在 1995 年已经成了极端腐败的国家之一

（三）官员贪污腐化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于 2008 年初宣称：过去五年中检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 18 万件（平均每日近 100 件——引者注）、20 万人。其中，省部级以上官员 35 人，地厅级官员 930 人，县处级官员 12964 人。（新华社 2008 年 5 月 18 日电）又据媒体报道，经过对近年来 3000 多起典型贪污等职务犯罪案例的研究，发现具有十大特点：一是群体效应（办一案带出一片）；二是长久腐败（有的人边腐边升）；三是权钱交易（涉及工程犯罪多）；四是商业贿赂（潜规则大肆横行）；五是渎职犯罪（不落腰包的腐败）；六是以礼代贿（贿赂也讲究包装）；七是贪官蜕变（与生活作风有关）；八是金融腐败（团伙作案、携款潜逃、利用高科技手段）；九是会计犯罪（手段多为做假帐）；十是村官腐败（侵吞土地补偿款）。（《检察日报》2007 年 3 月 27 日）

当今中国腐败之烈，不仅为国内人民深恶痛绝，而且在国际上造成很坏的影响。最近，“国际追踪”网站宣称：中国索贿案居世界第三位，85%的索贿案与政府工作人员有关，其中 11%与司法人员有关（《参考消息》2008 年 7 月 18 日）。

三、执政党的变化

到 2002 年的十六大, 党的性质却被改为: “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从而成为“全民党”(人民和民族中包括着不同的阶级阶层); 并据此规定允许不愿放弃剥削的资本家作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份子”加入共产党。这就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向, 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建党以来一贯明确坚持的党的性质和入党条件。这个大转向是如何造成的? 应当如何对待? 这里有必要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

当前却存在着马列主义伟大旗帜被淡化、架空、回避、篡改和否定的严重问题。例如, 党的十六大通过的党章, 在未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 删除了十五大党章中关于马列主义的下列重要表述: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 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 最后必然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 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又如, 有的领导人宣扬“共产主义渺茫论”, 回避或否定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科学理论, 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人对人的剥削, 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以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和行为, 就是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的重要的共产主义因素。社会主义每前进一步, 就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靠近一步。再如, 有的领导人只提“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而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此外, 还有一些共产党员“精英学者”肆意歪曲篡改马列原著, 胡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论, 并宣扬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者的民主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科学的理论”,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等等。对于这些反对马列主义的错误思想和倾向, 必须进行批判和纠正。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而创立的。它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自从党的七大以来就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伟大旗帜。但是, 当前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存在着被淡化、架空、回避、篡改和否定的严重问题。有的领导人讲到党的指导思想时, 既不提马列主义, 也不提毛泽东思想。有的领导人有时也讲毛泽东思想, 但不讲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从而架空和歪曲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指出：“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89 页）后来毛泽东又把这一理论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告诫全党继续进行政治、经济、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特别要警惕和坚决防止资产阶级分子篡夺党的领导权、进行“和平演变”，以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和发展。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已经被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变质和解体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也被我国已经或正在发生的许多事实所证明。近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和阶级关系的空前大变化，不是证明阶级斗争“长期存在”，“谁胜谁负”的问题尚未解决，“继续革命”不可避免吗？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决不能丢掉它的核心和灵魂。否则，就是假高举，而不是真高举。对于邓小平理论应当如何看待？它能否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须要认真地加以分析。从实践的检验来看，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言论中，有正确的部分，也有错误的部分。两种观点纷列杂陈，往往自相矛盾，因而不能构成系统的理论。他本人也从未承认过有个“邓小平理论”。例如，邓小平一方面受中央的委托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另一方面又否认坚持还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宣传变相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又如，他一方面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同富裕，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失败了”、“走了邪路了”，另一方面，又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作为一个“大政策”，特别是允许一些干部及其子女（大部分是中共党员）下海经商，让共产党员去当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再如，他在 1992 年“南巡讲话”中一方面讲要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止二十年，另一方面又要求长期反“左”为主，并认为经济领域只能反“左”不能反右，为推行私有化铺平了道路。诸如此类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例子不胜枚举。之所以形成这种混乱状况，从思想方法上讲，就是他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以资产阶级“有用即真理

“的实用主义，混淆和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科学命题。总的看来，邓小平在思想上可能是错误的东西更多些，这些错误思想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对邓的全部言行究竟如何评价，可以从长研究。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用含混词句包装起来的修正主义思想。在前面关于坚持党的领导一节中已经说到，“三个代表”是为了改变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允许资本家、入党而提出来的。这种“重要思想”，抛开先进生产关系，只讲代表先进生产力；抛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讲代表先进文化；抛开阶级分析，只讲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三个抛开”的理论基础是“三个否定”。一是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那位核心领导人一再强调新兴的私营企业主群体是个“新社会阶层”，否认它是新资产阶级；二是否定劳动价值论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论，公开讲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了；三是否定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和消灭阶级，他所主持的十六大，在没有作出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删除了原来《党章》中关于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的条文。从此，关于“阶级”、“剩余价值”、“剥削”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基本上被打入禁区了。然而，为了蒙蔽群众，他还宣称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十分明显，他用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用否定阶级斗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用否定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和阶级，“发展”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这哪里是什么“发展”，分明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彻头彻尾的背叛！

为了把“三个代表”跟“全民党”一起强加给十六大，这位核心领导人除了采取前面说过的践踏《党章》、压制反对意见的几种手段之外，又加上了两种手段。一是在 2002 年 7 月 23 日由主管机关公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把“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列为党政干部的“基本条件”。这就是说，如果你敢于无视或反对“三个代表”，不乖乖地遵照实践，就让你得不到或者丢掉“乌纱帽”和“饭碗”。二是由中央重要干部出面，在媒体上宣称：凡是不积极拥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党员不能当选为十六大代表，从而为“三个代表”在十六大的通过提供了最牢靠的“组织保证”。应当指出，这一切都是在“三个代表”未经党代会批准、更未写入《党章》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是又一次对《党章》的大践踏！正是在这样的非法手段

的操控下，“三个代表”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十六大党章。 “三个代表”思想实践的结果如何呢？一是抛开先进生产关系只讲先进生产力，推动了私有制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二是抛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讲先进文化，推动了各种资产阶级思想、金钱至上、极端个人主义的空前大泛滥；三是抛开阶级分析只讲代表广大人民利益，推动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新资产阶级的兴起，工农大众沦为弱势群体。这三项结果的事实说明：“三个代表”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资本主义的复辟！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原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中，说到当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抛弃阶级斗争学说时，指出：“需要出现转变，其中最重要的莫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抛弃这个观点，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别样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历史竟然如此惊人的相似！

总之，从“三个代表”思想的“一个目的”、“三个抛开”、“三个否定”和“三项结果”来看，它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是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个时期以来，一批“精英学者”主要宣扬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这种思潮成为践行“三个代表”思想、推行私有化的有力助手。但随着私有化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的凸现，这种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思想遭到越来越强烈的反对。于是，他们改换了另一种形式，即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把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斯坦的民主社会主义奉为圭臬。这种假社会主义一出台就遭到相当强烈的批判。他们见势不妙，正在转向第三种形式，即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护下，以反“左”、反“教条主义”为名，攻击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或者宣扬“民主”“自由”具有“普适价值”，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马克思主义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两条基本原理：一是必须坚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二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两条，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照妖镜。不论什么人，不论怎样用马列主义的外衣来伪装，只要用这两面照妖镜照一照，任何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谬论立即原形毕露，无处躲藏了。

（1）新资产阶级的兴起，要求进入执政的共产党。私营经济的发展意味着新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从 1995 年到 2005 年这十年间，私营企业主即资本家的户数从 66 万户增至 430

万户，增长 5.5 倍；雇工从 822 万人增至 4715 万人，增长 4.7 倍，资本从 2262 亿元增至 61331 亿元，增长 26 倍。2005 年的新资产阶级与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的民族资产阶级相比，户主数相当那时 16 万人的 26.8 倍，雇工数相当那时 250 万人的 18.8 倍；资本额相当那时 24 亿元的 639 倍（扣除价格变动因素）。新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他们要求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实现这一要求，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最便捷的办法就是钻进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来阻挠和改变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2）大批有权势的党员变成资本家而仍然保留其党籍，推翻了共产党员“不准许剥削他人”的根本原则——对《党章》的第一次大践踏。在改革中，大批国企实行经营者购买（MBO），“公产变私产，党员变老板”；大批官员子女、亲属和其他干部下海去当资本家。这部分人是新资产阶级中最有权势的群体。按照我们党建立以来的一贯原则，这些已经成为剥削者的党员是应当“无条件开除其党籍”的。但是，这批党员却是按照党的指示进行改革、争当“先富”的积极分子，其中不少是中高级和最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和亲属，权势大，根子硬。于是，在 1989 年 8 月中央的有关文件中作了原则性的重大退让，规定这些人“在严格执行国家政策法令、平等对待工人、把大部分利润用于发展生产或公益事业的条件下，仍可保留党籍。”十分明显，这只是一个守法资本家的条件，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而这个规定却默许了他们可以不放弃剥削，这就违反了党章关于党的性质和入党条件的规定，是对党章的公然践踏。这个错误的规定，铺平了“党员变老板”的道路，实际上也为“老板变党员”埋下了伏笔。

（3）不仅党员可以当资本家，而且资本家可以当党员——对《党章》的第二次大践踏。前面已经说到资本家中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从 1993 年的 13.1% 上升到 2001 年的 29.9%。据调查，在资本家党员中，党员变资本家的占 78.6%（其中国有或集体企业的“高管”收购公有企业的占 43.4%，官员子女和其他党员下海经商的占 35.2%）；资本家变党员占 21.4%（《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研究》、《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1999）》、《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2002）》）。所有这些事，都是在党章规定不允许资本家入党的条件下干出来的！

（4）为资本家入党抛出新的“立党之本”，公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并蛮横地压制一切反对意见——对《党章》的第三次大践踏。资本家在党内的人数越来越多了，但这与党章特别是党的总纲所阐述的理论相抵触，名不正，言不顺。于是，

一位核心领导人在 2001 年初抛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并且自封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要以个人的讲话取代原来的立党之本——党章。不久，这位核心领导人在 2001 年 7 月 1 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又提出两大论点：一是新兴的私营企业主群体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不是新资产阶级，根本否定了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二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剩余价值论）只能解释“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解释当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不能解释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一来，中国私营企业主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摘掉了，“剥削者”的帽子也摘掉了，他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作为“普通劳动者”入党了。这位核心领导人一方面组织一批“理论精英”大力宣扬，说“七一讲话”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突破”，是“与时俱进”的典范；另一方面，动用行政手段从多方面压制反对意见。一是对上书反对的老干部、老战士施加政治压力，有的人被剥夺了行动自由权；二是对不赞成资本家入党的某些省委领导人提出警告，如果不能与中央（实际是领导者个人）保持思想一致，就要“调整”工作岗位；三是不经正常程序，粗暴封闭敢于宣传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入党的《真理的追求》和《中流》杂志，以此惩一儆百，使全国所有主流媒体噤若寒蝉。这种做法不仅践踏了《党章》，而且践踏了《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从而充分暴露出他理屈心虚的精神状态。

（5）违背全党意志，半明半暗地把一些资本家抬进党的十六大庄严会堂——对党章的第四次大践踏。关于十六大让资本家作为代表参加大会的情况，官方主要媒体均默不作声，而由个别次要的官方媒体吹风。如《中国青年报》2002 年 10 月 28 日透露：“十六大中将出现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并列举了其中四位资本家的姓名及其企业名称；还说：“福布斯杂志刚刚公布了新一届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在列名的 100 名富豪名单上，有 3 位名列十六大代表之中。”并赞扬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突破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及时团结、整合了各种新生社会力量。”这位核心领导人用这种非法手段抬高资本家的地位，就是为了进一步显示：资本家入党已经成为“铁定”的既成事实了！《党章》早已成为废纸、不值一顾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十六大通过了修改党章、改变党的性质、允许资本家入党的决议！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党的性质的改变起源于经济的私有化。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或迟或早总要变。新兴的资

产阶级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党外兴起的资本家；一部分是党内利用权势兴起的资本家，他们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改派”）。这两个部分密切结合，浑然一体，而后一部分起主导作用。他们在党内大权在握，目无党章党规，并利用我们党缺乏民主监督的缺点，一步一步地摧毁了建党的根本原则。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改变了，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必然随之改变，不管用什么外衣加以包装，都改变不了问题的本质。

新资产阶级进入了执政的共产党内，使共产党发生了部分质变。

资本家中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1995 年为 17.1%，2000 年为 19.9%，2001 年为 29.9%，大大超过了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尽管当时的党章是不准许资本家入党的）。十六大修改党章、准许资本家入党后，资本家中共产党员的比例上升到 33.9%（2004 年），

新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兴起，必然要求政治上享有相应的地位和权力。共产党是我国一切事业的领导核心，资本家必然要求进入共产党内。根据全国性抽样调查，早在中共党章尚未规定允许资本家入党之前，1993-2001 年私营企业主当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已悄悄地由 13% 上升到近 30%。

表 3 1993-2001 年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所占比例

（以私营企业主为 100%）

年份	1993	1995	1999	2000
2001				
有效样本（个）				3060
3258				
党员人数				609
972				
党员%	13.1	17.1	18.1	19.9
29.9				

资料来源：①1993、1995、2000 年数字，见《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1 年第 3 期，第 75 页。②1999 年数字见《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1999 年》第 107 页。③2001 年数字，见《2002 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003 年 2 月 26 日。④历年抽样调查的样本

是从全国各地区的私营企业中随机抽样而得的。

这些资本家党员的来源，据调查，由党员成为资本家的，占 78.6%（其中公有制企业变私有制企业的占 43.4%，党员下海创业的占 35.2%）；由资本家成为党员的占 21.4%，大体是“倒二八”。

自十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私营企业主中的先进份子可以入党之后，“公产变私产，党员变老板”，“私企大发展，老板变党员”的做法公开合法地推行。据全国工商联调查，2005 年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达到 33.9%。这个比例大大超过了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中共产党员的比例。

一时间，中国大地上一下子涌现了无数的红顶商人、红色资本家。凭着他们的财富和实力很快地进入了要害，成了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或核心人物。紧接着便是要求私营企业成立党组织，有政治眼光的私营业主马上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纷纷竖起了“共产主义”的大旗，成立了党支部或党委，自己或者自己的代理人自然就成了党委或支部的一把手。党组织进军私营企业，或者说私营企业成立党组织，本来是一件好事，党可以像以前那样，组织工人群众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同剥削压迫工人的资本家作斗争，维持社会公正公平。然而，事情恰恰相反，私企的党组织往往成了资本家的保护伞，他们是在为资本家保驾护航，党组织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资本家可以披着共产党合法的外衣，来对工人阶级实施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首先，私企的党组织事实上是资本家把持着的党组织，他代表的是资本家的利益。从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形，至少有以下这些方面能说明私企党组织已经被资本家所把持。

1，所有私营企业党组织均是在业主的主动要求和亲自参与下建立起来的，其主要负责人没有哪一家是普通工人党员或工人党员推选的代表在担任，都是企业老板或者是老板指定的代理人担任党组织的主要领导，这些人领导的党组织自然就不可能代表广大的工人群众。

2，再看党员的比例，私企中发展党员往往是看这个人是否对老板忠诚，是否肯为老板的事业做贡献。所以，私企发展的党员往往是管理层的较多，普通工人就要看出于某种需要，有时主要是为了安抚民心或者是普通工人为老板，做出了相当的贡献。既然结构决定了向心力，所以，这个组织便成了老板的帮手和

工具。党组织的服务对象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3，组织活动和组织教育，每次的组织活动无非就是一次老板的工作会议，都是谈如何来加快企业的发展，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让职工为工厂多做贡献，如何来取得更大的利润等等。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早就扔到一边去了，因为这不符合老板的利益。所以，现在私企的党员，有几个是真正地接受过党的正规教育？有多少年没有学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有哪家私企的老板（党组织的负责人）敢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4，私企党组织已经为资本家独家操持，为资本家独家服务。不信，你可以在资本家的工厂内让一名普通的工人党员组织申请另外成立党组织，独立开展活动，你看有谁敢答应你，不给你扣个分裂党组织的罪名，就算是幸运的了。

其次是，中国共产党有很多优良传统和作风，可以被资本家用来更好地统治和奴役工人阶级，为他们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

1，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在长期的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铁的组织纪律，就被资本家所利用了，他们用强制的手段强迫工人劳动，为他们卖命，谁要是反抗，就说你违反纪律，自由散漫。工人阶级只能忍气吞声地为他们卖命。

2，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资本家利用这条组织原则用于压制不同声音，谁要是想替工人讲话，他就会用党的组织原则来排斥你、压制你。到时候你必须服从，因为你是少数、是下级、是个人。所以，工人阶级的利益往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得不到保障。至于他本人有没有服从哪一级，只有他自己知道。

3，中国共产党有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这一点，资本家也利用的特别好。一方面，他们自己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另一方面，他们让工人阶级过猪狗不如的生活，谁要是敢有怨言，他们就会扣上丢掉党的优良传统的帽子。工人阶级只能安分守己的过这种生活。

4，中国共产党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资本家可以永远的批评你，永远地教训你，让你永远做自我批评，永远站在被告席上，让你永远有一种负罪感，以至于将自己的贫穷也认为是自己的罪恶，而他们，则不管何时何地，不管什么事情都是对的，工人阶级生来就是贫穷、天生就有罪。

这就是资本家巧妙地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利用工人阶级对党的感情和信赖，来迷惑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上当受骗，沦为他们统治和奴役的驯服工具。

更令人发指的是，资本家一方面在利用共产党的组织，另一方面又在拼命地毁坏党的信誉，动摇党在群众中的基础，最后达到推翻共产党的罪恶目的。他们除了使用上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奴役工人阶级以外，还利用党组织直接和工人阶级制造矛盾、制造对抗，这样的事例很多。一般，工人阶级在受到了资本家的剥削压榨进行抗争时，他们会用党的一些理论和上级党组织的一些说法来对付你，让你觉得似是而非，无法和其做进一步的争论而就此罢休。当工人阶级的利益受到极大的侵害，或者发生了工伤死亡等事件，甚至出现反抗引发的群体事件、暴力事件等等，资本家会利用企业的党组织、工会、妇联等组织分化瓦解工人运动，甚至充当打手，帮助资本家镇压工人运动。工人群众由于在事件中直接面对的是政府或者是企业的党组织，他们就会把愤怒和仇恨直接对准党组织和政府，引起人民群众的党和政府的不满，加上国家和政府有时候处理不当，群众对党的不满情绪会进一步的激化和加深。而资本家则躲在后面偷乐，因为不但伤不了他们，反而挑起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矛盾，这是他们做梦也在想要得到的结果。

善良的人们，不要以为资本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们真正的爱党、爱社会主义。他们不可能、也绝对不会，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帝国主义，资本家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死对头，他们和共产党有食肉寝皮之恨，他们就怕中国的劳苦大众在共产党的教育和带领下，推翻他们的统治和奴役。所以，他们是另有目的的，他们入党，就是要为了混入党内，控制和改造共产党，将共产党改变成为他们自己的政党，为他们服务。现在，他们利用共产党、披着党的外衣来剥削和奴役工人阶级和中国的劳苦大众，挑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制造党群矛盾，制造对立对抗，其险恶用心就是要最终推翻共产党，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党。但推翻共产党他们自己不敢而且也做不到，只有毁坏了共产党的形象，让工农群众自己来放弃他、背离他，最后推到他，这就是苏联共产党灭亡的前车之鉴。这就是资本家入党，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的险恶用心。

2011 年 3 月 21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2 日修改

第六篇第二章第四节 文化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二章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

第四节 文化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以下为网文摘录)

一、社会保障体制从有到无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体制主要包括保障就业和社会保障。在就业方面，国家保证全体有劳动能力的人获得工作/劳动岗位，从根本上保障了全社会劳动者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条件。这种不允许失业的劳动/就业制度，即后来被不无贬义地叫做“铁饭碗”、“大锅饭”的制度，是当年中国区别于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显著特征。改革前，中国已经形成了覆盖全国人口的基本社会保障网络，这就是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村人口“五保户”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以及根据 1951 年初政府公布实施的《劳动保险条例》（1953 年修订）建立的城镇人口社会保障体系。中国还在全国实行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民免费教育。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迄今仍然普遍缺乏相对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才能在经济水平依然低下的条件下，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为全国人口的生老病死提供保障，解决被认为低收入国家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曾经被有的国际组织看作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但是，促进中国人文社会超前发展的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却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效仿的。这一点，也为中国转上市场经济之后自身的实践所证明。

中国在转上市场经济之后，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随之基本瓦解。首先，保障就业的“铁饭碗”制度被打破了，劳动者重新变成了商品，失业成为“正常”现象。虽然政府设立了一定的救济、补助机制，但劳动者从此失去了工作保障。结果，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有工作的劳动力随时面临失业从而面临丧失生活

来源的威胁，而失业的劳动力则已经丧失了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权利。

在市场化改革中，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瓦解，新体系至今未能建立起来。在城镇，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退出历史舞台。原来由这些企业承担的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随之消失，只有政府和国家事业单位职工还能继续享有原来的基本社会保障。纷纷建立的各类私营企业在政府不加强制的条件下通常不遵守《劳动保险条例》，导致作为城镇职工及其家庭社会保障基础的条例实质性死亡。在农村，集体体制转变为个体农户经济。失去了集体经济的支撑，原先依附于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以及五保户制度也同样瓦解了，农村人口仅有的集体福利荡然无存。比较改革前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可以看出，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无到有，覆盖了几乎全国人口；标准明确，全国大致统一；单位主管，贯彻有效；在城镇，完全不需个人付费，在农村，合作医疗也只需要极少量个人付费。不足的地方是，农村人口在社会保障程度和保障项目上远远不及城镇人口，尚未建立农村养老金制度，城镇不同职业的保障程度也存在一定差别。此外，与劳动单位挂钩的体制导致社会化程度较低。改革后，全国性社会保障体系从有到无，支离破碎，人口覆盖范围急剧缩小，大多数人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结果，保障程度和项目差别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显著扩大，社会化程度不是更高，而是更低了。

总之，改革不但没有克服原来的问题，反而丧失了已经取得的进展，回到了基本上不存在全国性社会保障体系的状态。

在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覆盖面最大的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到 2006 年，全国还只有 25% 的劳动力享有养老保险。广大农村劳动力仍然几乎没有任何养老保险。1 亿多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没有社会化的养老保障。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的覆盖面更低。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表现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一般特征，即：不存在政府主导、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名目繁多的商业/私人保险，而它们的对象只限于有支付能力的少数人。当个人财力不再能解决生老病死、上学升学等问题的时候，人们只好求助于所谓“好心人”，寄希望于他人怜悯出手相助，这就产生了重建所谓慈善事业的需求。事实也正是如此。改革后，经常性的社会募捐不但用来应对突发灾难，而且成为解决常规发展问题筹集资金的手段，例如用

来资助教育的“希望工程”。慈善事业在中国兴起并成为社会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改革后的“新生事物”，在“濒临崩溃”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尚且能够提供社会保障，而在创造了增长“奇迹”的今天反而丧失了这种能力。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变迁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关系，而与经济政治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中国在改革前后都属于经济不发达国家。但由于前一个时期独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革前的中国却不是一个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原有的制度特色逐渐丧失，在经济、政治、社会保障体制上与其他低收入市场经济国家日益趋同，越来越难以发现与它们之间的差别。

二、人文社会发展滞后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在社会发展领域取得了非同寻常的巨大进步，得到了世界公认和赞扬。作为一个低收入国家，中国几乎所有社会人文指标的进步都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包括人均寿命、普及教育、减少文盲、婴幼儿死亡率等等。到改革前夕，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已经十分接近中等收入国家。通常，一国社会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对应，但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却是一个突出的例外，其社会发展的世界排名远远超过其经济水平的世界排名，而且是世界上两者名次差别最大的国家。在改革前夕，中国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最贫穷国家的第 22 位，而在人文发展中却位居第 51 位，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此外，1960-1980 年间，世界上从低人文发展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的国家不过十几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更突出的是，在这十几个国家中，中国取得的进步最显著，因为中国位次上升的幅度最大。因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长期以来，中国倾力投资于人文发展。因此，尽管人均收入低，它却位于中等人文发展指数的国家类别。中国在人文发展指数与人均 GNP 之间的名次差距最大，相差 49 位，表明它非常明智地使用了自己的国民收入。”中国当年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它在发展中国家中独树一帜，取得了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社会进步，显示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在促进人文社会进步上具有优越性。

中国从而被一些国际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的榜样。改革 30 年, 中国的 GDP 高速增长, 2004 年人均 GDP 相当于 1978 年的 10 倍多。中国无疑比过去更富有了, 总体生活水平更高了, 按常理推测, 中国的人文社会发展将在原有基础上出现更大跨越。事实却并非如此。一方面, 中国人文社会发展的超前性越来越小, 即越来越接近其经济水平, 另一方面, 在某些人文发展指标上, 例如在人均寿命增长方面, 中国近年来的进步甚至达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由领先者落到了后进行列。从人文社会发展的总体进步来说, 中国的表现不但与 GDP 快速增长不相称, 未能体现“增长促进”的效果, 而且,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崩溃, 连原有的“支持导向”优势也丧失了。1949 年到 1978 年的 29 年间,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 35 岁提高到 68 岁, 增加了 33 岁, 远远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达到了当时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改革后, 人均预期寿命增加速度大为放慢。1982-2002 年的 20 年间,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增长 2.9 岁, 不但低于亚太地区的 4.0 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5.4 岁、南亚的 8.9 岁、中东和北非的 9.1 岁, 而且低于高收入国家的 3.9 岁。比中国表现更糟的只有两个地区, 即欧洲和中亚(增长 0.3 岁), 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减少 2.5 岁)。这两个地区不但没有能与中国一比高下的 GDP 增长, 相反, 撒哈拉以南非洲长期处于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 欧洲中亚地区由于俄罗斯转型期间遭遇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导致人均寿命大幅度下降。

婴儿死亡率是人文社会发展另一个重要指标。1990-2003 年期间, 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幅度在高收入国家平均为千分之 3 (从 8 下降到 5, 为 2002 年数字), 中等收入国家为千分之 12 (从 42 下降到 30), 低收入国家为千分之 15 (从 95 下降到 80), 而中国仅为千分之 9 (从 39 下降到 30)。从这些数字表明, 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在 1990 年好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但到 2003 年则与之拉平, 进步速度明显放缓, 进步速度更是远远落在低收入国家后面。中国的表现似乎只好于高收入国家, 但高收入国家婴儿死亡率已经非常低, 继续下降的空间非常有限, 并不具有可比性。同一个来源数据还表明, 在这一期间降低婴儿死亡率方面, 中国的进步落后于几乎所有地区的平均水平, 包括东亚/太平洋、欧洲/中亚、拉美/加勒比、中东/北非以及南亚, 与中国相当的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其他健康的指标上存在类似趋势, 例如疾病和传染病感染和死亡率、精神病发病率、

高自杀率等等。1975 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农村普及合作医疗、防治血吸虫病、麻疯病以及地方病等方面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赞誉中国只用了世界上 1% 的卫生资源，解决了世界人口 22% 的卫生保健问题。中国总体的医疗条件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 21 位。20 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排在 191 个国家中的 144 位，而卫生公平性竟排在 188 位，全球倒数第四。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医疗领域改革的市场化导向，政府大规模削减医疗投入。有医疗权威人士指出，发达国家用于医药卫生开支均占 GDP 的 10% 以上，就连在发展中国家，巴西为 7.9%，印度为 6.1%，赞比亚为 5.8%，而中国只为 2.7%，而且，中国政府的卫生投入在整个医药卫生总支出的比例逐年减少。1985 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为 38.58%，1995 年为 17.97%，2000 年以后只剩下 15%。相反，让老百姓自己掏腰包、支付医药费的比例却逐年增加，1985 年为 28.46%，1995 年为 46.40%，2000 年以后一直接近 60%。

改革期间中国的教育进步同样不符合预期。新中国建立时，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文盲国家，人口文盲率超过 80%。经过不到 30 年时间，政府在人均收入很低的基础上努力普及教育，到 70 年代末，文盲率在城市下降到 16.4%，在农村下降到 34.7%。这是一个骄人的进步，因为在同期，印度的城市和农村文盲率分别高达 34.9% 和 67.3%，埃及分别为 39.7% 和 70.6%，而人均收入远远高于中国的巴西分别为 16.8% 和 46.3%。中国普及教育的成就超过其他发展中大国，走在了它们的前面。基于建国后扫除文盲的速度，人们本来期待，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家拥有更多财富，彻底扫除文盲指日可待。但事实并非如此。改革 30 年来，政府制定的普及全民教育目标屡屡以失败告终，大学生比例提高，但普及教育的脚步显著放慢了。2005 年，根据当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 6 岁以上人口的文盲比例仍然高达 10%。这个数据印证了另一个来源提供的信息：据中国教育部高官透露，截至 2005 年底，文盲总人数达到 1.16 亿人，占世界文盲总数的 11.3%，仅次于占世界文盲总数 15.0% 的印度。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教育原来取得的优势正在大大缩小，尤其在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方面。改革期间，一方面是大学生入学率提高了，另一方面却有 1 亿多人仍处于文盲状态，得不到基本教育，表明中国越来越回归一般发展中国家教育不平衡的状况。也正

如在其他一般发展中国家一样，在中国，未能普及教育的原因，同样习惯性地被归结为经费不足。但历史事实是，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水平更低，政府却能够组织数次全国性大规模扫盲运动，使文盲率显著降低。有人警告说，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可能无法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 2015 年实现一半文盲脱盲的目标。国家的发达程度最终反映在人文社会发展水平上。改革后，中国的变化轨迹表现为优势逐步丧失。诚然，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总体水平尚不处于明显劣势，但与 GDP 高速增长提供的物质基础相比明显滞后。出现这种情况也许并不难理解，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不但难以建立“支持导向”的人文社会发展模式，而且，由于收入高度不平等，不能使全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从而必然严重阻碍人文社会的相应进步。

三、大学美丑分界线

我国当代大学变丑的主要原因是三大运动、五大歪风。

所谓三大运动：一是从 1993 年开始的合并运动，第一所合并的大学是南昌大学，先后由江西大学、江西工业大学、江西医学院合并而成。南昌大学是解放前的老校，1952 年错误的把南昌大学取消了，江西为了建设自己的名校，合并后顺利的进了“211”工程，从而掀起持续至今的合并运动。

二是“建一流大学”运动。1998 年 5 月 4 日，时值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国家领导人号召要建设中国若干所一流大学，从此开始了千军万马争一流运动。什么世界一流、中国一流、中西部一流、东部一流……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

三是 1999 年开始的扩招运动。1999 年扩招了 52 万人，相当于增加了 52 所万人大学啊，不得了。当年的扩招率好像是 49%，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从没有过的纪录，重复了 1958 年“大跃进”的错误。

五大歪风是什么呢？一是瞎指挥，二是冒进，三是浮夸，四是相互攀比，五是造假。风是不见其形只见其影的东西，它们越演越烈，屡禁不止。每当我看到这些情况，就痛心疾首，没有办法啊！尽管他们没有说是运动，但按照运动特征看他们地地道道是在搞运动，是以运动的方式指导高等教育。从 1993 年到 2003

年的十年中，正是大学最烂的时候，合校、建一流、大学扩招、大专升本科、乱改名、大建楼堂馆所等，都发生在这个期间。

大学之丑归纳起来就三个字——乱、脏、臭。

乱——现在中国的大学乱了套，对大学一定要有准确的功能定位，必须各司其职。现在大专、专科院校也都成为大学了，它们都只是知识或技能的培训机构，没有资格成为大学，从本质上亵渎了大学的真谛。大学之乱，怎么个乱法？请看：独立学院不独立（他是二级学院，但又不隶属某大学，说它独立吧，又要接受母体大学的限制。）、成人教育没有成人（实际上是招收高考落榜生，变相搞文凭教育赚钱。）、函授学院要面授、自学考试要上课（集中阶段上课，考前搞串讲，实际上是变相漏题。）、普通大学乱篡位（很多地方大学也要搞一流大学，也要建研究型大学，大量培养研究生。）、重点大学不务正业（搞应用型研究，办培训班、办分校、搞开发区等。）。

脏——肮脏，个别导师要跟女研究生上床、潜规则，院长上妓院，大学教授组织换妻俱乐部，这不肮脏？博士生导师拉研究生打牌，也有潜规则：学生只能输不能赢，简直是斯文扫地！

臭——经济腐败、学术腐败、学术造假还不臭吗？而且现在经济腐败、学术腐败暴露的仅仅是冰山一角。为什么呢？因为都有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有保护伞。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同是做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和各部门的应用研究院，基本上没有在报纸上被披露学术剽窃的。很显然，学术剽窃具有高等学校的特征性，这就与教育部的政策和政策导向有直接关系，教育部对学术腐败应负直接领导责任。

我所谓的臭是什么呢？铜臭，衙门臭。用这两个臭来概括现在的大学很形象，铜臭不用说了，一个知名作家在某重点大学兼职 3 年，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他说这个大学就是一间大公司，从上到下人人都在赚钱，作家的眼光是敏锐的，洞察入微啊。后来，他又自费到俄罗斯考察月余，俄国人告诉他，现在的俄罗斯只有莫斯科大学和圣女公墓是干净的，而我国像莫斯科大学这样的大学也没有了。

有人形容，中国面临教育灾难。是不是灾难可能有分歧，分歧主要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俗话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就是这个道理。体制内的人往

往由于本位主义或是利益所限，当然他们不可能看到问题之所在。但是，危机是客观的，真正热爱教育的工作者，都能实事求是的做出评价。教育灾难是个笼统的概念，承认危机也不甚什么可怕的事。灾难也就是危机，包括哪些方面呢，人们所指的更多的是高等教育。现在有句话，挨骂的最多的是大学，其次是中学，小学骂的人少。对于基础教育来说，现在的素质教育只不过是说说而已，自我安慰，宣传秀，实际上还是应试。教育部的一位领导说，光骂教育不能解决问题，其实人们并不是光骂，也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可是你们充耳不闻嘛！

我们只教会学生考试，全社会推崇的还是上名校、考高分、补习、奥数。所以我说现在全社会需要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从教育部到民众都不懂什么叫教育改革，应当改什么？启蒙就是去掉蒙昧，启迪文明。现在的大学教授们、院长们也还是考虑择校啊，据说某大学四个教授常年雇一个小轿车，把孩子送到市内上重点，早上送晚上接，真是不惜血本呀。为什么现在公务员热，70%的博士都在官场，是学而优则仕的反映。这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不光是做官，而是把学习目的极度的功利化，如颜如玉、黄金屋和千钟粟等，广义上都是学而优则仕的体现，这是造成学生压力大和负担重的主要原因。欧美国家的教育，教学生会提出问题，特别是稀奇古怪的问题，学会质疑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并不要求学生考高分，注重创造思维能力的培养。这是与我国传统教育根本不同的，我们应当深刻的反思，尽快走出应试教育的误区。大学合并运动就是逼良为娼，我的观点是：强强合并是不可取，强弱合并似可虑，弱弱合并有其需。当初，合并运动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建造学科齐全的航空母舰。但世界任何一个名大学也不一定是一个学科齐全的大学，哈佛大学就没有农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就没有法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所以这是站不住脚的说法，搞强是假，“好大狂”才是真的。

第二个理由是中国的大学太多了不好管，合并了以后好管，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合并前中国 890 多所大学，不是太多，美国有 4000 多所大学。还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大了好管还是小了好管呢？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明明是强词夺理嘛。功利主义的思想诱导人们合并，为什么呢，因为合并以后就进“211”工程，不合并就成不了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比如说在贵州，新贵州大学是 7 所大专学校合并起来，合并之前进不了“211”，合并之后就顺利进了，而且 7

所当中合并了 4 所专科学校，这就戳穿了“强强联合”的谎言。

在汉字中，世和代是相同的概念，一世也就是一代人，往往是指 30 年。许多人尚没有意思到，中国大学的危机，二三十年后将更为严重，因为 3 个因素的影响将是持久的。一是学风坏了，一个好的学风需要几代人培育，好学风遭到破坏，又将殃及到几代人；二是人才的素质大大的降低了，由不合格的人培育出更不合格的人，形成恶性循环；三是大学合并背上的沉重包袱和负面影响将会是长远的，至少是 50 年，1951 年院系调整的不良后果，至今尚没有完全消除就是证明。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大学经历了市场化(如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国际化(如“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规模合并)、产业化(如疯狂扩招和建大学城)三大高潮。它变得像混合了政府和企业功能的奇怪公司：是公共服务，却由家长们高额支出；是产业经营，却背负了 2500 亿元债务；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是投资，却不保证你的回报。大学的理念越来越混乱，而其行政管理、评估体系、课程、老师和学生，都出了问题。大学的定位和专业设置同质化严重，从教授到学生的造假舞弊令学术成为笑话。大学的腐败、两性和安全乱象总在社会新闻版出现。中国的大学不再精心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而热衷于培养“就业员”。大学从残酷社会中的象牙塔，堕落成了生产不合格产品的坏公司，这是可怕的事！少数好教师和好学生在此瑜不掩瑕，更多人的青春在此虚掷，梦想没来得及描绘就已挫败，这是可怕的事！大学不教新生代做“人”和做事，只教他们听话和考试，这是可怕的事！大学生相信关系和潜规则，甚于相信知识和能力，这是可怕的事！2010 年，中国 957 万名考生参加了高考，其中 657 万人有机会成为大学新生。我们的大学更像一间公司，无论好坏。这间公司是怎么做市场的 一个高三学生如果有幸连续看过这十多年的高考志愿填报手册，一定会晕掉。十多年来风水轮流转，各种热门专业层出不穷，如果大学是公司，那它们就是深圳华强北那些山寨手机厂商，iPhone 流行时就做 HiPhone，什么流行就一窝蜂仿它、山寨它、做滥它。早些年流行经济类专业，各个大学学院纷纷开设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金融学、应用经济学等等；后来又流行法学，人人都想着进公检法，过“律考”；接下来是工商管理、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市场与营销等市场管理专业；没几年风头又转到了 IT 行

业，于是计算机类学科汗牛充栋；然后是影视、艺术、表演、播音与主持类专业挤破了头，连工科院校都敢设影视学院；最后是物流管理、电子商务、艺术品投资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物业管理、动漫设计等面向新时代的专业热得烫手。看看十多年来的大学热门专业，几乎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走向。经济数字虽然高亢，可经济学的学生大多不过在当会计和营业员。“律考”通过率低得可以媲美公务员考试，而公检法早就人满为患，没有后台你想都别想。学商科的去卖保健品、搞传销，学计算机的在网吧里当管理员。学表演的如今连潜规则都不一定捞得上了，转年又有一茬水灵的新人。播音主持、影视编导想去电视台？你等着去当栏目聘的编外民工吧。物流管理去快递公司，电子商务在淘宝卖外贸货，动漫设计的要么在熬命，要么在画山寨动画。唯有房地产红旗不倒，如果你运气好早点去卖楼，你就算赢了。

十多年的大学专业热潮，每一次大学里的专业热潮之后都预示社会上这个行业的烂掉。你必须相信这一点，当下最热的专业，等你毕业的时候一定会烂掉，中国的大学有这个能力。因为它们是山寨公司，它们看重的是“快速反应能力”，谁能短平快地抓住热点，大量吃进原料囤积，迅速做出仿版，就算战略上的成

功。这间公司是怎么做运营的

你总算入学了，来到学校之后你才发现，你所在的校区居然离照片上那个著名的学校大门有几十公里远。这还算好的，要是你在挂着一个城市名前缀的校区里，你会发现它在地图上和本校相距上千公里，要用谷歌地图才能览其全貌。

现在的大学流行开分公司，所有大学都到一个地方去开子公司，于是称作大学城。整合资源、辐射效应、集约模式、融资管理、引领发展、促进转型，这些在大学城建设中经常出现的词汇，就如同商业教科书。大学既然是一间公司，大学城自然应该是一盘生意，这盘生意的体量大得惊人，占地动辄几十平方公里，建筑面积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平方米，投资金额是天量，流水账目自然也是天量。

有知名大学的生意好做，没有知名大学的城市也有新招，便由政府出面撮合当地二三流学校与外地知名大学联办分校。对于当地来说，可算得上是招商引资，对于外地大学则算是拓展业务。负责一点的，隔三差五有本校教师飞行执教，算是连锁经营；不好的则是自生自灭，留个招牌而已，只能算是授权加盟。

有分自然有合。大学公司的生意还有一种是兼并。院校合并算是我国教育界的一项

盛事，学院合并升格为大学，专业性大学合并升格为综合大学，理工大学有人文学院，科技大学有影视学院，更不用说如今几乎每所大学都有医学院。合并风潮据说目的是为了集中师资力量、加强学科水平，为合出几所世界级大学而努力。最高目标自然是全国合为一所大学，如此一来，世界大学排名榜必然会有一所仰之弥高的中国大学，再不济，学生人数也是世界前列。兼并重组到最后，难道就是公司运营手法的尽头了？不，大学们不久后一定会发现资产剥离、拆分上市其实是资本运营的更好办法，这样合并的大学又可以拆开来各自挂牌，再来一次资产评估、征地搬迁、结构调整、资源重组、院系学科调整。这间公司的收入与支出既令人惊讶又在意料之中的是，大学这间公司运用了如此多的手法，最后它的资产负债表却如此不堪入目。大学负上巨债已经不是新闻，燕山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吉林大学等学校都欠下了几亿、十几亿乃至几十亿的债务，曾有媒体报道的数据说，我国高校负债实际的数字可能在 4000 亿到 5000 亿元之间。这真是任何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噩梦。但好在大学这间公司，有着不同凡响的翻身策略：“扩招负债，卖地偿还”。以平价征得的教育用地，再以数十倍的价格拍卖出去，偿还债务不成问题。别家公司负债搞到破产，大学这间公司负债还会微赚。也有大学校长提出，因为“大学不印钞票，也不卖产品，大学的主要产品是人才，但是大学人才送出去是不收费的……培养的人才是无偿供应给社会的”，所以大学的债务应该全社会承担。有总经理如此，董事局主席当笑而不语。大学固然不印钞票，可学生们的钞票却是源源不断地流进来，教育体制改革中的诸多口号中，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执行得最有力的，这直接就意味着学费连年上涨，扩招年年实行。大学这间公司的生产方式本来就特殊，先收钱，后办事，赢得口碑继而趋之若鹜。如果，学生进大学要交学费，毕业后有公司买走还要花钱，如同机场高速公路一样，进出都收费，那真算是一大经营创新，世界企业史的一朵奇葩了。大学这间公司美妙的地方是，它的收入既来自政府拨款，又来自学费等自创营收，它的产出既算是公共服务，又算是商品。这样哭穷、赖债时两头都有道理，排列组合一下有不少选择可用。所以我们看到，既有校长呼吁增加拨款，又有校长抱怨学费太低，硬件不够时怨钱少，就业率低时怪社会，负债时它说自己公共服务，收钱时它又成了产业经营。当然，最美妙的还在于，它永远不用对资产负债表负责，永远不用对股东负责，

永远不用对产品质量负责，永远不用对客户负责。作为普通公民的我们，以纳税人的身份已经为这间公共服务公司缴过税，再为子女入学向这间经营性公司交一次费，然后毕业就业再由自己解决，最后它负债还要所有人一起承担。即使这样，我们也永远看不到它的账单。大学的企业文化没有哪间公司的新闻比大学这间公司更像娱乐新闻了。这里有学术抄袭，从博导到校长，学术抄袭新闻的频发程度比起音乐圈歌曲抄袭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有男女关系的潜规则，从艺术院校到外语院校，年龄跨度、爆料程度比起影视圈来也不遑多让。这里有骂战，有炒作，有勒索，有杀人，有指桑骂槐，有暗箱操作，这里不仅有情色故事，居然还有推理小说。

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新闻总是能上网站新闻头条——猛料迭出，随便拎个元素出来就是上好的标题。历数一下近年的大学，从招生、教学、考研、学术、收费、征地、贷款、就业乃至师生关系、校园生活、社会活动，无不是丑闻连连。一间公司做到整条生产线从头到尾全都有新闻亮点，不能不说是企业文化培育的经典案例。一名学生，自入学到毕业，从原材料到成品，从产品继而变为员工，经历过这间公司完整的生产线。你以学费为投资，试图换取一个未来，终于——恭喜你，你毕业了。

四、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泛滥成灾

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面临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在一些高校，有人正在变本加厉地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全面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全盘西化的现象愈来愈严重。他们大搞挂羊头、卖狗肉，偷梁换柱、红皮白心的鬼把戏。一是歪曲党的经济学教学方针，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不搞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导的“单轨制”，长期以来坚持搞中西并重的“双轨制”。近来又进一步肆无忌惮地将“双轨制”改为全部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主导的“单轨制”，迫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一步边缘化。二是教学内容西化。胆敢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偷换成西方经济学，不开《资本论》课，不讲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来分析金融危机原因，大肆吹捧反马克思主义的“诺奖得主”。三是教材全部西化。责令研究生全部采用美国的英文原版教

材，并作为考试依据。四是教师队伍西化。大批引进经济学“海归派”，充当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教士”，占领大学讲台和经济研究机构。五是研究生考试方式西化。有的高校在研究生考生考试中，所出试题在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招魂，用西方高级宏观、微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西方计量经济学取代马克思《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为经济类学科考试的基础课和专业课。

总之，当前中国经济学的西化倾向愈来愈严重，西化愈来愈彻底。从经济学教学方针、教师队伍、教学内容、教材到考试方式等，正在加紧推行全盘西化、整体上西化。妄图使中国经济学“跟着美国走”，贩卖美国货，照搬美国主流经济学模式，推销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误引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一些主流经济学精英们，不仅充当“美国鸚鵡”学舌，而且充当旨在使中国经济私有化的科斯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掮客，大肆贩卖、强行推销。他们充当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买办，正在步步紧迫地加速推进打着所谓“经济学现代化”招牌的中国经济学的殖民化，妄图使中国经济学领域为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殖民地。在不久前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经济理论研讨会上，有人公然大肆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更有人在大会发言中高呼：“我的结论就是一句话：资本主义好！”他们在公众场合放肆地发泄对马克思主义的仇恨情绪，气焰十分嚣张，为资本主义、为行将毁灭的新自由主义招魂。

五、中国出现了极其严重的信仰危机

多年以来，中国出现了极其严重的信仰危机，许多官员经不住灯红酒绿的诱惑，过不了金钱、美色、权力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盛行，一大批掌权者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买官卖官，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腐化堕落，甚至泯灭人性。放眼今日之中国，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行政腐败，军队腐败，教育腐败，医疗腐败，经济腐败，学术腐败，体育腐败……腐败现象比比皆是，几乎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其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天下之前。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2008 年报告，过去五年全国立案侦查贪污受贿 10 万元以上、挪用公款 100 万元以上案件 35255 件。涉嫌犯罪的县处以上国

家工作人员 13929 人，其中厅局级 930 人、省部级以上 35 人。五年共审结贪污、贿赂、渎职案犯罪案件 12 万件，同比上升 12.15%。据媒体最新披露，山西某县一个小贪官，在几年时间内，凭借职权，非法敛财 3 亿多元，在北京购买豪宅 30 多处。类似这样的贪官污吏，在全国各地可谓比比皆是。老百姓说，真正被抓住的贪官比汽车撞死人的机率还要小！

2011 年 3 月 28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2 日修改

第六篇第二章第五节 社会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二章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

第五节 社会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以下为网文摘录）

一九七六年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产业化，社会群体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产阶级兴起来，工农大众弱势化。

私营经济的发展意味着新资产阶级（或视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这一阶级，从 1995 年到 2005 年这十年间，户数从 66 万户增至 430 万户，增长 5.5 倍；雇工从 822 万人增至 4715 万人，增长 4.7 倍，资本从 2262 亿元增至 61331 亿元，增长 26 倍。

2005 年的私营企业主群体与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相比，户主数相当于那时 16 万人的 26.8 倍，雇工数相当那时 250 万人的 18.8 倍；资本额相当那时 24 亿元的 639 倍（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如果说那时存在一个资产阶级，为什么不承认现在存在一个新资产阶级呢？

工人阶级（包括劳动知识份子）和劳动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但工人阶级已经出现了“雇佣化、贫困化、弱势化、分散化”的现象。广大农民除了极少数村庄（如南街村、华西村）一直坚持集体经济、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以外，绝大多数农户分散经营小块土地，处于无法规模化经营和采用先进技术的困境。进城务工者的劳动和生活条件相当恶劣。过去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就业制度瓦解之后，住房难、上学难、医疗难、就业难成为困扰许多居民的突出难题。

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已形成“五大等级”“十大阶层”的“金字塔”（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调查报告）。工人、农民包括失业工人和下岗失地农民，处于最底层。据上海对 4000 户就业意愿的入户调查，只有 1% 的人愿意做工人。这一数据结合有关大量资料，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由国家的领导阶级、主人翁地位跌落到社会结构“金字塔”最底层的惊人落差。

一、资产阶级中的各个阶层及基变化

(一) 民间资产阶级 (或视为私营企业主新阶层) 的再生

1990 年——2005 年私营企业主及其投资、雇工情况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户数 (万户)	9.8	65.5	176.2	202.85	243.5	300.6	365.1	430.1
投资者 (万人)	22.4	134.0	395.4	460.83	622.8	772.8	948.6	1109.3
雇工 (万人)	147.8	822.0	2011.2	2253.03	2786.4	3526.3	4068.7	4714.7
注册资本 (亿元)	95.0	2262.0	13306.9	18212.24	24756.2	35304.8	47936.0	61331.1
增长速度 (%)								
户数	—	568.3	169.0	15.14	20.0	28.2	21.5	17.8
投资者	——	498.2	195.1	15.56	35.1	24.1	22.7	16.9
雇工	——	456.1	144.7	12.03	23.7	26.5	15.4	13.4
资本	—	2281.1	488.3	36.86	35.9	42.6	35.7	27.9

注：①增长速度：1995 年 2000 年栏内是 5 年的增长幅度，其余各栏是年度的增长速度。②资料来源：1990-2003 年数字，摘自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办公室编《工商行政管理统计汇编（2003）》第 89 页；2004 年和 2005 年数字摘自全国工商联编《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6）》第 15 页、第 85 页。

从表 2 可以看出：从 1990 年到 2005 年这 15 年中，私营企业从不足 10 万户增加到 430 万户；雇工人数从不足 150 万人增加到 4700 多万人；注册资本从不足 100 亿元增加到 6.1 万多亿元。其增长速度之快，是世所罕见的。

拿 2005 年私营企业主群体同 1956 年我国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相比，现在的私营企业主人数为当时的 16 万人的 26.8 倍；现在的雇工人数为当时的 250 万的 18.8 倍；现在的资本额按可比价格计算为当时的 24 亿元的 639 倍（紧缩指数：2005 年的 4 元等于 1956 年的 1 元）。私营企业主就是资本家，私营企业主群体（或集团）就是资产阶级。大家都承认 1956 年在改造之前存在过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现在这个比 1956 年私营工商业者

在户数、雇工数和资本额方面都大过许多倍的私营企业主群体，为什么不能说是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呢？

（二）国企资产阶级（国有、国有控股企业高层管理人员）

（三）买办资产阶级（外资企业中方高层管理人员）

（四）外方资产阶级（外资企业所有者）

（五）官僚资产阶级（党群、行政、军事、司法、文化、教育、卫生、新闻等等县团级以上官员）

（六）黑恶资产阶级（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从事非法活动的企业、团体的高层管理人员）

二、工人阶级的情况与变化趋势

据统计，我国 2005 年职工 10850 万人，其中企业事业单位 9777 万人，机关 1073 万人（《中国统计年鉴——2006 年》第 134 页）。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工人阶级，主要是产业部门的职工状况有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雇佣化

——目前约有一亿职工在私营企业、个体经济、“三资”企业等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就业。党的十三大指出，职工在私营企业中劳动是雇佣性质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行了“小卖大股”。一部分中小国有企业卖给私营企业主，变为私有企业；一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实行经营者持大股，这些企业的经营者“一夜暴富”，成为一个特殊的“新百万富翁”社会群体，职工也成为雇佣劳动者或者实质上具有雇佣性质。许多国有大型企业改为股份制，有外商和私营企业入股，国有股部分强调企业经营者是产权代表，企业经营者持有股份，并实行年薪制，年薪所得高于普通工人的十几倍、几十倍以至百倍以上。在这样的股份制企业中，工人的劳动也带有雇佣性质。

（二）贫困化

——比之私营企业主、外商投资者、个体经营者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份子上层，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是有限的，是相对贫困的。2001 年私营企业主注册资本 1.8 万亿元，其来源正是无偿占有职工的剩余劳动。外国资本家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获取大量超额利润。据《中国教育、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提供的材

料，1995—1999 年的制造业，在中国对每个劳动力所付出的成本，相当于美国的四十分之一，日本的四十三分之一，韩国的五分之一，泰国的四分之一，甚至比印度还低。工人阶级中还有一部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即最低生活水平也难以维持。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和最低工资线以下的收入；一是虽然收入超过最低工资线，但家人有大病，或遇其他灾害，生活过不下去的。绝对贫困的职工有多少，可以从一个数字做出推算。全国享受低保的有 2053 万人，还有漏保的，实际的数字比这个大。他们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承受子女上学、看病买药和住房的负担。在他们那里，就发生了卖血、自杀等事件。职工的贫困，是以失去劳动条件为特征的。有社会上的失业者，还有国有企业下岗的 2700 万人。

（三）弱势化

——对职工群众，有“困难群体”的称谓，是就其经济生活状况而言；也有“弱势群体”的称谓，是就其社会政治活动状况而言。职工群众每日每时能感受到的权力就是对企业有参加管理权。过去，尽管职工代表大会形式主义，但总是起一定作用的。现在，有的是严重形式主义，有的干脆不开了。特别是企业如何改制、企业要职工买断工龄这样影响到企业命运和职工命运的重大问题，都很少让职工讨论。第十届全国人代会中，工人、农民代表是 511 名，仅占代表总数 2984 人的 18.46%。现在有一种说法：工人、农民没有议事能力，不能当选代表。现在党和政府召开各种征求意见会、座谈会、茶话会，参加的各界人士都有，唯独不见职工界。在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上升的同时，职工群众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在下降，这是职工政治地位降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分散化

——工人阶级是靠社会化大生产培育起来的最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工厂为家是新中国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现在，职工群众与企业的关系是一纸合同。职工对于用工者来说，总是处于弱者和依附的地位，合法权益常常受到损害，就是“白领”职工也不例外。老板欠发工资，多数白领职工不敢讨要。只有在离职后才敢讨要。失业和下岗的职工，有的做小买卖，有的打零工，有个体化的现象。在全国职工中，工会会员只占 37%。许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和农民工中没有工会组织。现有的工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往往软弱无力，患了软骨病。职工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发生群体事件时，往往甩开党政

和工会组织，自发地组织起来。今天的职工对于说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很有反感。许多下岗职工买断工龄后，党员关系不知道转到哪里。他们反映：“不但买断了工龄，连党龄也买断了。”在职工群众中很少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地侵蚀工人阶级。针对这些问题，刘文建议：重申并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制定并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具体措施；治愈中国工会当前存在的软骨病；等等。

与上述工人阶级的雇佣化、贫困化、弱势化相联系，当前我国众多的工人受到异常残酷的剥削。我国近年来迅速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特有的野蛮性质和残酷性。许多私营工厂被称之为“血汗工厂”，许多煤矿生产出来的煤炭被称之为“带血的煤炭”。2007年5-6月间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经过暗访，揭发了山西洪洞等地黑砖窑的内幕。社会上一些黑中介，在各地拐骗或绑架少年、老人和智障者，贩卖到多处黑砖窑作苦力。其中年龄最小者仅八岁。黑窑主雇用打手用棍棒监管，工人每天劳动十七八个小时。稍有怠慢，即被打得遍体鳞伤，有的被打致残、致死。新砖窑出窑，往往尚未冷却就强令工人背出，烫得红肿溃烂。饭食只有馒头、凉水，还限15分钟吃完。晚上挤在黑屋里，睡地铺，冬天不生火，终年不刷牙、不洗澡，完全像牲口一样。数年来，当地党、政、公安机关对上述现象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其中有些黑窑就是地方党政干部的儿子或亲友开的。这些事件被媒体揭发后，中央、国务院指令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认真清查、解救工人，对有关责任人依法严惩。现已在山西运城、晋城、临汾解救出374人（其中有少数童工）。但河南400位失去孩子的父亲仍联名发出“泣血呼救书”，声称他们的孩子大部分尚未找到，可能已被黑窑主转移；而已被解救出来的工奴，今后如何求得生计，尚无着落。

类似上述黑窑工的事件，近年来早有多次报导。例如：

——2004年8月17日《民主与法制时报》刊登题为“4名矿工被骗身陷魔窟惨遭剝指烙脸非人虐待”的文章，河南荥阳市崔庙镇曹坡村惊现奴隶煤矿。

——2005年3月25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题为“盘锦惊现现代‘包身工’”的报道，30多位离家打工的农民成为芦苇场的奴隶。

——2004年4月19日的《四川日报》发表题为“民工遭非人待遇，每天劳动19小时，监工带电警棍”的报道，揭露了奴隶砖厂的真相。

——云南《生活新报》发表过题为“揭昆明黑心砖厂：老板暴力奴役，工人像畜牲”的报道。

2007 年的 1 月 9 日，《北京晚报》发表了关于出租汽车司机现实生存状况的报道。标题为：《北京十万的哥为份儿钱奔命，自称是公司赚钱机器》。报道说：“每天的清晨、正午、夜晚，行驶在北京大街小巷的近十万‘的哥’们，大多被一只无形的手牢牢掌控，无法挣脱。8 小时、12 小时，甚至 16 个小时的超负荷工作，多数‘的哥’换来的却是远低于应当所得的收入，大部分的血汗钱，也就是行业内所谓的‘份儿钱’，都上交给了出租车公司。”“滴着血汗的‘份儿钱’！”“本市一家体检机构曾对北京 1 万名出租车司机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出租车司机的健康状况堪忧：半数以上的哥患有职业病。”“每天十几个小时蜷缩在狭小的空间内，患上了胃病、腰椎病、前列腺炎、痔疮等多种疾病。生病一般扛一扛，吃点药，自己去医院检查还要排长队，嫌麻烦。一年到头，每天就像绷紧的发条，根本想不起来对身体做系统检查。”的哥刘先生无奈地对记者说。“在记者采访的十几位出租车司机中，几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患上了不同症状、不同程度的职业病。有的因不能定时用餐，患上了消化道疾病；有的长期保持开车坐姿，造成颈椎患病、腰肌劳损；有的因长期入厕不及时出现肾病；还有的因工作压力大，出现心理疾病，经常莫名地烦躁、失眠；另外，患高血压、心脏病等的比例也很高。”

2005 年 10 月新华社也曾发出过：《出租车司机生存状况调查——挣钱何时不再“玩命”》的专题报道：“2004 年 2 月，北京朝阳区出租司机王某在驾车行驶途中突然感觉胸闷、憋气，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5 月，北京顺义区出租车司机李某，在驾车时突发心肌梗，被乘客送往医院抢救途中死亡。10 月，一辆出租车行至北京东三环农展桥附近时，司机赵某突然猝死，乘客跳车逃走。2005 年 2 月，在北京海淀区车道沟桥西北侧的一片荒地里，一名北京银建出租公司的司机被发现猝死在了自己的红色富康出租车中。”

据媒体于 2007 年 4 月报道：“根据一项上海 4000 户入户调查，仅有 1% 的人愿意做工人；人们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该报导还评论说：“工人，越来越不被人看好，究其实质，还是与当前社会的利益分配和身份认同有关。如果说既得利益的多少

还只是外在的物质决定因素的话，那么更深层次的身份差异则是影响着公众不愿意做工人的内在主要原因”。“计划经济时代，工人‘老大哥’的身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一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唱出了那个年代的工人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但是，‘威风’的工人身份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而失去了力量。”“当工人缺乏参与改革的话语权时，当工人在利益博弈中力量被边缘化时，人们不愿意做工人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广州日报》2007年4月9日，原文标题《咱们工人还有力量？》）

（五）半无产阶级化 与发达国家的无产者相比，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更高比例的半无产者。可以说，如果无产阶级化是发达国家劳动力变化的主要特征，那么，发展中国的典型特征是劳动力的半无产阶级化。改革期间，在产生了遍及全球的“中国制造”的“工业化”浪潮中，中国的劳动力具有这一特征。 一般认为，工业化伴随着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即小生产者被剥夺，使之除了自身劳动力之外没有其他谋生手段，从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成为雇佣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或者通常所说的工资，必须足以维持劳动力基本生存和再生产。这个过程就是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但是，综观全球，基本实现了劳动力无产阶级化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国家的劳动力能够完全依靠工资所得和基本福利来供养家庭，实现劳动力再生产。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存在一部分完全依靠工资为生的工人家庭，但大量劳动群体却生活在半无产者家庭中。他们除工资之外，还需要而且必须从各种兼职中获得收入，包括小农生产，因为他们的工资通常低于维持劳动力生存和再生产的水平。这种状况是世界经济结构所决定的。资本全球扩张的目的不在于把劳动力变成无产阶级，而在于榨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半无产阶级化更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而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维持半无产阶级化的条件。 与无产阶级化相比，半无产阶级化的劳动者所受的剥削更加深重。他们的劳动时间更长，劳动强度更大，劳动条件更恶劣，更缺乏生活和权利保障。他们在低于劳动力价格的工资水平上之所以还能生存，完全是由于他们和/或家庭在这份工作之外，还通过其他劳作获得收入，才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就业工人的家庭及其子女供养本来应该计入劳动力成本，但他们得到的低工资不足以支付这一部分费用，因此，半无产阶级的劳动者及其家庭子女通常不得不参加劳动，全部或部分地自食其力。

发展中国家以半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为特色，这些劳动力大量表现为季节工、临时工、流动工人、兼职工人等。1949 年之后，中国迅速消灭了血汗工厂，加速进行的工业化把大量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国家建立的劳动保护体系很快覆盖了各类企业的工人，实行 8 小时工作日制度，劳动条件显著改善。保障就业的政策使所有工人都捧上了“铁饭碗”，劳动者没有失业之忧，享有与就业相联系的一系列福利待遇，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等。在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下，工人获得了与西方现代工厂不相上下的劳保条件，在有些方面，例如工人的劳保医疗，甚至比有些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当年的一些工厂更优越。产业工人能够完全依靠本职工作所得，保证家庭和子女的生存。可以说，在获得足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工资和其他报酬这一点上，当年中国工人阶级更接近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状况，劳动力朝无产阶级化的方向演进。所不同的是，当年中国还存在着大量完全农民身份的劳动力。改革中断了中国劳动力无产阶级化过程，使之转上了半无产阶级化的轨道。改革以来，劳动力变成了商品，劳动者身份地位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职工的“铁饭碗”被砸碎了，劳动力的就业取决于资本需求，工资随行就市。中国不但产生了固定的失业大军，而且，随着劳保福利的基本消失，相当多就业人员的工资越来越难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即不足以养活全家人口。同时，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季节工、临时工、流动工、兼职工等越来越成为中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形式。正如在其他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劳动力进入半无产阶级化过程。中国半无产阶级大军的主体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他们是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农民工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而是典型的半无产者。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家里有地，本人在城镇和/或工矿务工，部分家庭成员还留在农村务农，他们的流动性强，工作和生活极不稳定。中国的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改革后劳动力变化的半无产阶级化状况。首先，农民工在数量上举足轻重，目前规模估计为 1.3 亿左右。按 2005 年中国 2.7 亿城镇就业人口计算，几乎占了半壁江山，29 他们大约占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 58%，加工制造业的 68%，在服务行业也超过一半。其次，他们的工资水平低，处于非农业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底层。有数据表明，农民工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年薪大约是国有企业职工的 53-55%，而在传统服务业中工作的大多农村妇女的年收入比制造业和建筑业还低很多。这种工资水平实际

上低于劳动力成本，远不足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农民工的报酬水平大大低于劳动力价格，使他们难以在就业的城镇地区养育家庭。因此，长期的城乡分居就成了农民工的主要生存方式，因为他们必须依靠农村收入的补贴，才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据统计，目前农民纯收入中 40%来自农民工从事非农劳动获得的工资。

第三，他们是改革后大量涌现、遍及全国的血汗工厂劳动力的主力军，是城镇建筑业以及城市人不愿从事的其他工作的主要力量。他们通常不享有任何劳动保障，不享有任何医疗、教育等福利，也没有工伤、养老保障。他们在缺乏基本生产安全的条件下工作，工作环境最恶劣，劳动强度最大，劳动时间远远超过《劳动法》的规定，是工伤、职业病最大的受害群体。他们工作不稳定，流动性最强，很多人不停地在不同地区、行业、城乡之间流动，相当一部分人的工作带有季节性特征，因为他们需要兼顾留在农村家庭的农业生产。第四，由于工作分散和不稳定、工作技术含量低等原因，他们比城市产业工人更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几乎完全不具有与雇主/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是遭受资本无情驱使和最大限度压榨的劳动力群体。对很多人来说，能够按时拿到微薄的报酬已属幸运，因为工钱被克扣的现象长期、大面积发生，很多人甚至得不到任何劳动报酬。直到今天，农民工仍然不得不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追讨工钱，甚至反遭迫害。第五，他们的家庭承受沉重苦难和压力。家庭成员长期离分给城镇务工的农民工及其家庭造成难以弥补的身心伤害。被迫留在农村的家人成了“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各自承受着残缺家庭、留守状态带来的额外生活压力和痛苦。有资料显示，2006 年在外出务工的 1.3 亿人中，已婚者有 1.06 亿人。除去举家迁移的大约 3900 万人，只有一方外出务工的人数达 6700 万人，以 70%男性计算，农村仅“留守妇女”就有 4700 万人左右。有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留守儿童”大约为 5800 万，平均每 4 个农村儿童就有一个，他们没有与父母一起生活的起码条件。正如其他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劳动力半无产阶级化也成为了一种统计常态。西方一些组织以及政府热衷于批评中国的血汗工厂，批评中国劳工遭受不公正待遇，似乎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但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必然后果，也是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必然产物。不过，血汗工厂在中国重新出现并迅速扩散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虽然在 1995 年颁布实施了《劳动法》，但《劳动法》迄

今没有得到切实贯彻。劳动者的权益难以保障，致使大量劳动力的工资所得不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除了政府执法不力外，一个深层原因是，没有任何低收入的市场经济能够解决本国劳动力的半无产阶级化状况。今天的中国并不例外。

三、劳动农民的情况与发展趋势

据统计，我国 2005 年乡村人口 7.45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57%；农林牧渔劳动者 3.35 亿人，占就业总人口的 44.8%（《中国统计年鉴（2006）》第 99、125 页）。

一九八四年以后，分户经营的弱点日益凸现，农业生产呈徘徊、停滞或低速增长的态势，城乡差距转为扩大。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1978 年为 2.5：1；1985 年缩小为 1.85：1；1990 年扩大为 2.8：1，2005 年进一步扩大为 3.2：1（《国民经济主要统计指标（1978—2006）》第 46 页）。

解散人民公社以来，农业长期的分户经营，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贫富两极分化。一方面出现了少数十万、百万、千万甚至更多财富的富翁（不限于经营农业）；一方面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农村贫困人口（国家统计局数字：2005 年为 2365 万人）。

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分户经营，不仅妨碍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和科学技术的采用，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由于集体经济组织的解体，原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医疗、教育、社保等项制度也随之解体了。原来以“赤脚医生”为特色的、村、乡、县农村医疗体系垮台，使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凸现出来。原来由公社集体经济支持的对老弱残疾者的“五保户”制度消失，使农村社保问题凸现出来。原来由公社集体收入开支的农村教育和公益事业费用，都改由农户缴纳，使农民负担问题凸现出来。尽管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但在医疗、教育、社保以及公益事业方面的开支增加了。特别是由于行政权力下放，乡、村行政机构和“七站八所”等基层事业机构人员急剧膨胀（如湖北省洪湖县棋盘乡，1990 年吃税费的干部不过 120 人，2000 年超过 340 人，群众说“干部如蝗虫”）等原因，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生活和政民关系。

2006 年国务院宣布“全免农业税”，实施起来并不容易。需要把原来依靠农业税费维持的乡村各种机构和冗员精简掉，而这些冗员大部分是县、乡、村三

级干部安插的子女和亲友，工作难度相当大。一些地区出现“免了税长了费”的现象。据河南省监察厅副厅长储亚平到农村调查，下边存在“税内损失税外补”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在征收内容上，由农业税费转向行政性专项收费；(2)在收费方式上，由乡村集中收费转向各有关机关、单位分散收费；(3)在收费的对象上，由面向全体农户转向要求办事或提供服务的部分特定农户，把本该免费提供的服务，分别改由中介组织、协会等服务机关收费，甚至以不为农户办事相威胁，强制收费（《新华每日电讯》2007年3月7日）。

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三农的投入，加强了农业支持补贴制度，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问题。例如，新华社记者到河南省中牟县调查时，大王村的农民说：“这几年，只要农民用的东西没有不涨价的。就说这复合肥，去年一袋不到70元，今年就85元。一亩地要两三袋，就多花三四十块，把国家的补贴全吃掉了。还有农药、农膜，价格一个劲儿往上涨。那么多部门，咋就管不住呢？”（《新华社每日电讯》2007年4月16日）

“只为老板铺路，不为农民服务。”“出门是宽阔的马路，抬眼是工业厂房；虽有路可走，但无地生存。”这是农民对乱占农民耕地发出的抗议。《人民日报》记者在一篇题为《“圈地热”惊人的背后——关于地方政府土地违法案件的调查与思考》的报导中，详述了政府圈地、农民失地过程中的四个特点：一是乱设园区：“规划跟着项目走”、“规划跟着领导走”。二是违法圈地：虚假指标，暗箱操作，乱批乱占，低价出让。三是补偿欠缺：“地方政府请客，老百姓买单”，出现“三无农民”（“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四是腐败温床：利益诱惑，权力寻租，执法不力，“尚方宝剑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人民日报》2004年4月23日）。

解散人民公社以来，农业长期的分户经营，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贫富两极分化。一方面出现了少数十万、百万、千万甚至更多财富的富翁（不限于经营农业）；一方面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农村贫困人口（国家统计局数字：2005年为2365万人）。一些“先富者”占有了较多的财富，必然要求政治上的统治权。2004年初，《重庆日报》记者写道：“‘富人’治村是大势所趋，”“‘富人’治村的时代已经到来。”该记者报导了重庆市北碚区玉峰镇6个村的24名村官中，私有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占一半以上。又据浙江省民政局提供的材料，该省2002年选出的13万新一

届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占到 30%。其中，“先富群体”在义乌市村委会成员中占 60%，在村委会主任中占 65%。（见《商界》2004 年第 1 期）。又据中央电视台在一个以《村官的价格》为题的节目中报导，河津市下化乡老窖头村村民王玉峰为拉选票，发给选民共计 223 万元现金。后被人揭发，才被依法没收。还有一篇题为《600 万元选出高价村官》的电视报导。村官本来是基层的小小“芝麻官”，为什么有人出如此高价贿选？主要是可以从征地和乱收费中捞取钱财（见《中国电视报》2002 年 2 月 2 日）。

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北京的韩村河等村，多年来一直坚持集体经济，不仅大幅度提高了生产，而且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共同富裕。在那里，没有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没有贪污腐化，没有卖淫嫖娼，基本上没有刑事犯罪；而且群众的教育、卫生、住房等问题也得到较好的解决，干群团结，党群关系紧密。据估计，这样的村在全国约有 6000 个。它们的存在与广大农村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

官方科研机构也不能不承认：社会结构已经出现了“金字塔”——“五大社会等级、十大社会阶层”。

该《报告》说：“本报告的图 1 在分出十大社会阶层的同时，已依据各阶层拥有资源的量及其重要程度，提出一个等级位序。”在图示的社会等级，即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下一层五个等级中，当代中国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农民（“农业劳动者阶层”）基本上属于第四层（中下层）和第五层（下一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则全部属于第五层（下一层），而这部分人实际是工人、农民中的一部分。总之，工人和农民由于“拥有资源”少、“重要程度”低，处于社会结构“金字塔”的最底层。

该《报告》还指出：处于“金字塔”顶部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是改革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并且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较大受益者之一。”

“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中积累资金成长发育起来的。他们不仅经济上受益最多，而且政治地位显著提高。调查材料显示：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已大大超过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中共产党员的比例。

该《报告》指出：“产业工人中党团员比例在下降”，“有关的访谈调查还反映出，现今工人与党组组织没有多少联系，他们既很少参与也很少关心党组织的活动和有关政策精神的宣传学习。这些情况表明：工人阶层的政治地位在下降，与党的关系逐渐疏远。如此发展下去，是与工人阶层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这一原则不相称的。”

该《报告》还指出：“综合上述各阶层的政治地位变化的情况来看，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在逐步地向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但另一方面，执政党近年来在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社会基础受到部分削弱。这是一个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因为工人和农民在人口中仍占较大比例。”（《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 37—38 页）

总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量调查资料说明了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两个基本情况：一是工人农民的地位降到“金字塔”的最底层，成为“老八”、“老九”、“老十”；二是执政党的基础向“拥有经济文化资源的阶层”倾斜，与工农群众逐渐疏远。

2011 年 4 月 4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2 日修改

第六篇第三章第一节 当前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外部关系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三章 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 进行社会主义伟大革命

第一节 当前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外部关系

一、当前中国的国际环境

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早已不复存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消失。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搞垮以后，正在逐步恢复。

世界资本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之后，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它们曾经预言这是历史的终结。很快就暴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

当前的世界形势仍然是划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的两霸在苏联瓦解之后，只剩下美国一家独霸世界；第二世界增加了俄罗斯、东欧一些国家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印度、巴西；第三世界仍然处在分裂混乱状态，遭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当前中国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主体，形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在这个经济基础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

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多廉价高质劳动力的“世界工厂”，中国富了起来，去年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已经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并且还能向欧洲一些国家施行“中国式马歇尔计划”，被西方政要称誉“挽救了资本主义”。胡锦涛 2011 年访美，拿出了 450 亿美元的大买单，使为国内高失业率惶惶不安的美国舒了一口气。中国先是被拉进了“G8”，再是被列入了“G20”，现今则已被公认为与美国“共同治理世界”的“事实上的 G2”了。

商务部统计显示，截至 2010 年 7 月，中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69.8 万家，实际使用外资达 1.05 万亿美元。2010 年前 7 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 583.5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65%，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4459 家，同比增长 17.9%。2010 年全年利用外资 900 亿美元……

有统计显示，近 10 年，外资对我国制造业市场控制度在 30%以上；在我国 28 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 21 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已经开放的产业当中，每个产业前 5 名全部是外资企业。外资以并购的形式对我国实施市场控制、股权控制、品牌控制、技术控制，从而影响我国的产业安全。国内很多矿产、粮油加工等诸多上下游企业，外资其实已涉足控制很深，但名义上仍是中资控股。此外，部分产业、行业正在遭受着通过并购形式的外资渗透，这种渗透正在呈几何级数蔓延。

中国的经济增长 74% 依赖出口。

中国经济具有相当大的依附性。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很低，但大量的海外投资已经涌现，甚至有赶上外商对中国投资水平的趋势。

根据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0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09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再创新高，连续八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长速度达 54%。2009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 565.3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1.1%，截至 2009 年底，我国共对 177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投资，投资覆盖率达 72.8%。

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领域几乎覆盖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零售业、建筑业和高科技产业等各个领域，并呈现出分布更为广泛的特点。投资范围也从以亚洲国家为主扩大到欧洲、北美和拉美等地，同时投资额均显著上升。截止到 2009 年底，中国 1.2 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 177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直接投资企业 1.3 万家，对外投资累计净额超过 2457 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 1 万亿美元。

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每年的海外投资额定为 120 亿美元左右，5 年海外投资总计 600 亿美元。而实际情况是，2010 年一年的海外投资额即有望在 600 亿美元左右。商务部数据显示，2010 年 1-7 月，中国以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 61 亿美元，占同期投资总额的 22.8%，其中仅仅民营企业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瑞典沃尔沃轿车公司 100% 股权 17.88 亿美元等，就占到金额的近 30%。

同时, 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在快速增加。1-6 月,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 3.6 倍, 达到 6.05 亿美元; 对欧盟直接投资 4.06 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07.2%。此外, 过去近八成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亚洲以及加拿大等国家的格局, 已经被打破。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范春永估计, 目前中国对外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 1:2 的比重, 可望在 2015 年前后升至 1:1。由于目前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成为新的投资动力, 同时中国也改变了过去投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中国未来的投资数量和质量有望上新的台阶。受此影响, 2013 年海外投资将过千亿美元, 存量可望达 5000 亿美元的规模。

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国际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估算, 从 1999 年到 2008 年这 10 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达到了 80.43%。他说: “这个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 高于我们 GDP 的增长速度, 也高于外贸的增长速度。” 他表示, 如果按 30% 的增速测算, 到 2015 年, 我国的年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 3000 多亿美元, 到 2018 年, 将达到 7000 多亿美元。即使按 10% 的增速测算, 到 2015 年,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能够达到 1089 亿美元, 到 2018 年, 每年可以达到 1450 亿美元。卢进勇说: “应当说这个数字也是不小的。” 据他介绍, 截止到 2009 年底, 我国海外投资的累计存量为 2460 亿美元; 截止到 2010 年 6 月底,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已经超过了 1 万亿美元, 两者之比是 1:4, 这说明我国在海外的投资存量还是没有我们吸引外资的存量数量大。同时, 从人均对外投资数额看, 上海人均对外直接投资为 50 多美元, 北京为 17.4 美元, 从人均来看,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还是比较低的。 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对外投资分别所处阶段, 据卢进勇分析, 处在人均 GDP400~2500 美元第二阶段的有 6 个, 占 19.4%; 处在 2500~4000 美元第三阶段的有 15 个, 占 48.4%; 处在 4000 美元以上第四阶段的有 10 个, 占 32.3%, 即我国处在对外投资加速发展阶段的地区已经达到了 80% 左右。他说: “这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发展的阶段。一旦人均 GDP 过了 3000 美元, 对外投资你想阻拦也阻拦不了, 这是企业自身的要求。” 他认为, 以后我国对外投资的实力将会进一步提高, 对外经济的发展将从以商品输出为主的阶段逐步走向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举的阶段。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10-2012 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认为, 中国是 2010

年至 2012 年全球第二大最具潜力的对外投资国，位居美国之后，超过德国、英国、法国。

中国经济正在逐步向外扩张。

现今的中国对国际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外来资本，具有很大的依附性。但这种依附，不是殖民地依附，而是工业-金融依附、工业-技术依附。同时，它也正在逐步向外扩张，特别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它具有很大的依附性。

现今的中国既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也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正在发展的中等发达的、对主要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具有相当大的依附性的、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种情况说明，中国已经脱离了第三世界，进入了第二世界。

二、当前中国的外部矛盾

当前的中国在外存在着复杂的的矛盾，包括与美国的矛盾、与第二世界各国的矛盾、与第三世界各国的矛盾、与周边各国的矛盾，等等。

其中主要矛盾是中国与美国的矛盾。这个矛盾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矛盾。中国政府要溶于以美国为霸主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它必须处处与国际接轨，听从美国的摆布；但它由于经济力量不断上升，对外投资、抢占资源不断扩张，必将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美国政府要霸占中国的各种资源，它支持中国政府实行的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且认为还不够，但不满意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由于中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快速上升，对外扩张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它在全球的未来的主要对手。它们既相互勾结，又互相争夺。

另一方面是中国各族人民同美国帝国主义的矛盾。这是民族矛盾。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问题，是美国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国的资产阶级压迫、剥削中国的劳动人民，中国的一部分剥削阶级站在美国资产阶级一边，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共同压迫剥削中国的劳动人民。

三、当前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

从世界范围的人民革命来说，头号的敌人无疑是美国帝国主义，它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它支持各国的反动派，镇压一切人民反对剥削阶级的、一切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

从一国人民的革命来说，头号的敌人无疑是本国的反动统治阶级，除非外国帝国主义直接出兵，侵占本国的领土，支持本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本国的人民，镇压人民革命，促使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使它们自己成为被侵略国家的头号敌人。

一国人民的革命与世界人民革命是相互联系的。

各国人民革命是相互支援的。

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世界人民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正在恢复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处于低潮，正在逐步向上发展时期。

2011 年 4 月 11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2 日修改

第六篇第三章第二节 当前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结构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三章 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 进行社会主义伟大革命

第二节 当前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结构

一、当前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

现今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主要是由两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个体劳动生产关系组成。

两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第一种是中国本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国资本主义经济，又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民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第二种是外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是指那些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演变而来，挂着“国有经济”招牌，具有垄断性、收益特大的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这些国企实际掌握在官僚、国企的高级管理人员中，他们不仅享受高薪、股权，而且可以运用这些资本谋取私利。这种经济既为其他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服务，又与其他经济成分争利。在现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力量居于主导地位。

（二）民企资本主义经济

主要是由民间人士举办的中小型企业。在现阶段，民企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对发展生产力、缓解就业压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它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外来资本主义经济一起，排挤、搞跨了社会主义经济。

（三）外来资本主义经济

第一，外来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了中国的“国有”银行以及其他国有金融机构。

第二，外国垄断资本实体经济企业，以各种形式大批转移到中国，利用中国特有的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和中国政府给予外资的特别优惠条件，以及它们本身具有的资本、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对中国企业不断进行参股控股，由产业并

购而产业替代，在中国国民经济体系逐步形成优势地位。

第三，中国工业产品销售的外贸依存度高达 66.9%，超过那些国民经济立足于外贸的国家和地区。

外来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以及就业的好处，但是也挤占、甚至在某些行业垄断了中国的市场。并且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民企资本主义经济一起排挤、搞跨了社会主义经济。

（四）农村和城市的小私有经济

这种个体小私有经济正在日益分化，其中大多数日趋贫困破产，极少数成为新富农或煤窑砖窑烟花爆竹等企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

二、当前中国社会的社会性质

现今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主要是由两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农民小生产者私有制生产关系组成。因此，现今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

现时的中国是一个中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它已经掌握了当代许多领域里的先进技术，它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它的经济总量已经占世界的第二位。但按人平均计算，它的许多经济指标仍然处在世界的中下水平。

三、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

（一）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中包括：

1，官僚资产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是掌握国家政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从总体上控制着国家的所有资产。（县团级以上的各级党政军的官员）。

他们是由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集团，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和美帝从内部摧毁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在毛主席逝世之后，篡夺了党和国家的全部权力，演变而成的。所以，它的行动多以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两面手法进行。

他们大搞私有化，出卖国企，通过物权法。

他们具有极大的买办性，疯狂地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2, 国企资产阶级

国企资产阶级是管理“国有企业”生产资料实际所有权的高层管理人员。

他们以高薪、股权的形式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对企业的支配权、管理权。

3, 民企资产阶级

现中国的民企资产阶级是现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以“国退民进”、“招商引资”、“能人创业”等政策，官商勾结，扶助起来的，和官僚资产阶级一起摧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以，现中国的民企资产阶级与生俱来就带有明显的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反动性。民间资本主义企业对工人剥削的残酷性，也十分突出，臭名昭著的“黑”字号煤窑砖窑和包身工，都出在官商勾结的民营企业里。现中国民企资产阶级无论人数和经济实力都远远大于当年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其中很多人都已是执政党的党员、干部，不少人已经开始以专家身份进入国家和地方政权机构。在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大方向上，官僚资产阶级和民间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具体的经济、政治权益上，官僚资产阶级对民间资产阶级主要是扶助，利用，勾结，但也有限制侵害的一面。民间资产阶级对官僚资产阶级主要是依赖，利用和勾结，但也有抵制争夺的一面。

4, 外来资产阶级

外来资产阶级包括港澳台来大陆投资的资本家以及其它国家来华投资的资本家。

5, 买办资产阶级

他们是有权与外资企业进行交易并从中谋取暴利的中方人员以及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的外方中籍高级管理人员，以高薪、股权的形式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对企业的支配权、管理权。

6, 黑恶资产阶级

他们打着合法企业的幌子，实际干着非法的活动——贩卖毒品、贩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赌博、走私、欺行霸市、打家劫舍，等等。

(二) 工人阶级

- 1, 现代产业工人
- 2, 公司职员
- 3, 农民工

(三) 农民及个体劳动者阶级

- 1, 农村个体劳动者
- 2, 城市个体劳动者

(四) 知识分子阶层

- 1, 官僚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 2, 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 3,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 4, 劳动知识分子
- 5, 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四、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当前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包括地区矛盾、民族矛盾、生产矛盾、需要矛盾、阶级矛盾等等。其中主要的是阶级矛盾。

在当前社会中存在着复杂的阶级矛盾，其中包括：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

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及其他个体劳动者的矛盾；

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及其他个体劳动者的矛盾；

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

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

个体劳动者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等等。

当前中国社会阶级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重点是同掌握着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

2011 年 4 月 16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2 日修改

第六篇第三章第三节 当前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三章 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 进行社会主义伟大革命

第三节 当前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

一、国体——国家的统治阶级

(一) 统治阶级

占统治地位是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其他个体劳动者都成了被统治阶级。

(二) 统治集团

掌握国家政权的是官僚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三) 政治路线

鼓吹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二、政体——政权的组织形式

(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名称没有改变，但代表主要由官僚、资本家以及为他们服务的文化人组成，选出的领导机构执行的是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政治功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二) 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名称没有改变，委员主要由官僚、资本家以及为他们服务的文化人组成，选出的领导机构执行的是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政治功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三) 政党制度

执政党——名称没有改变，党员成分增加了资产阶级分子，选出的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执行的是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政治功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参政党——名称没有改变，党员成分也没有变，政治功能变了：由为社会

主义服务的党派，变成了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党派

（四）行政机关制度——形式没有变，人员构成、政治功能变了：由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变成了为资产阶级办事的机关。

（五）司法机关制度——形式没有变，人员构成、政治功能变了：由保护人民的机关，变成了保护资产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机关。

（六）军事机关制度——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担负着保卫国家的重任，但也担负着对内镇压、向外扩张的任务。

三、统治思想

现今社会的统治思想，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一，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明确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分开，这是十七大的一大贡献。让一些思想糊涂的人清醒过来。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包括三个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

这三个部分是一脉相承的。

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领导集团通过“拨乱反正”的首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领导集团继承了邓小平理论而又把它向右发展的结晶。

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领导集团继承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又把它们加以改良的观点。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各具特色。

所谓邓小平理论，就是 1978 年至 1992 年，邓小平领导集团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指导、实践反映。

它的基本纲领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它的基本路线就是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

一个基本点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发展私有制，改造公有制，溶于世

界资本主义体系。

一个基本点就是“四个坚持”：坚持特色社会制度、坚持对革命派专政、坚持邓小平集团的领导、坚持邓小平理论。

所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 1992 年至 2002 年，江泽民领导集团推行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国企改革的思想指导、实践反映。

它的基本纲领就是形成新的资产阶级各社会阶层。

它的基本路线就是用市场经济的原则去改造一切。

用市场经济原则改造经济：不加限制地发展壮大私有经济，不加限制地改造公有经济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用市场经济原则改造文化：在文化、教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等部门推行产业化，搞利润挂帅。

用市场经济原则改造政权机关：把大批新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纳入各级政权机关，用招商引资作为考核政绩的硬指标，

用市场经济原则改造党组织：把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改为人民的先锋队、民族的先锋队，吸收资本家入党、让先富起来的“能人”担任基层组织的领导人。

用市场经济原则改造党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实质涵义就是：

代表先进生产力：谁拥有先进生产力？中外资产阶级！也就是说他们要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经济精英。

代表先进的文化：谁掌握着先进文化？为中外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人！也就是说他们要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文化精英。

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谁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外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客！也就是说他们要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精英。

这些说明，江泽民领导集团执政时期的所作所为，以及它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确确实实继承了邓小平理论又把邓小平理论向右发展了。搞得社会矛盾日益紧张，民怨沸腾。

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 2003 年至今，胡锦涛领导集团推行的社会发展、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实践反映。

它的基本纲领就是维持现状，有所改良。

它的基本路线就是发展要科学、社会要和谐。

这两点都是针对江泽民执政时期造成的问题提出来的。

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比作一个三段论，那么邓小平理论就是正（肯定），江泽民思想就是反（否定），胡锦涛观点就是合（否定之否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有继承又有扬弃。

邓小平试探着要在中国走一条搞私有化的道路。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的这条路子，但又搞得太猛、过头了，搞得老百姓的日子过不下去了。胡锦涛要继续沿着邓小平的路子走下去，不后退、不回头。但是他又看到江泽民的搞法太狠了，必须对老百姓作出一些让步。这样才能维持现存的社会结构，使贫富两极相安无事，也就达到了社会和谐。

2011 年 4 月 25 日初稿

第六篇第三章第四节 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三章 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 进行社会主义伟大革命

第四节 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一、革命性质

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性质，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主要矛盾，当前中国的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

（一）现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和国企资产阶级，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剥削早已彻底被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复辟了资本主义，但没有复辟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制，这个官僚资产阶级、国企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剥削没有联系，推翻它的统治和消灭它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二）现中国的民企资产阶级与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外来资产阶级既有勾结又有争夺。民间资本主义企业既有对工人剥削的残酷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面，又有发展生产力、缓解就业压力的一面。对民营企业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三）现中国的外来资产阶级是以帝国主义、经济霸权主义为后盾的。他们控制了相当大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与国企资产阶级、民企资产阶级既相勾结又相争夺。外来资本主义企业残酷地剥削工人，侵占国内市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它又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发展了生产，增加了就业。外来资本主义企业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服从中国政府的管理，并缴纳规定的税金。对外来资本主义企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同样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四）在现中国，无论是当前反腐败、反卖国、反复辟的斗争或是即将到来伟大的群众革命运动，都是基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主要社会矛盾的革命，都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二、革命的对象

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因为它们掌握着国家政权。

其它的国企资产阶级、外来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黑恶资产阶级当然也是革命的对象。但它们的问题，将会在工人阶级从官僚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及以后逐步解决。

民企资产阶级同样是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它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在未来的革命浪潮中会不会转化，将由那时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它的态度决定，现在难以推测。

三、革命的动力

革命的领导阶级，依然是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新梯队。实践证明，工人阶级是最忠实于社会主义的，他们和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

个体劳动的农民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

劳动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可以争取的同盟军。

四、革命的任务

第一步，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恢复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第二步，对私有制、市场经济及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五、革命的形式

积极开展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迎接政治斗争的新高潮

（一）经济斗争

近年来为争取生活保障待遇同地方政府发生对峙和新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进行的罢工斗争来看，他们均缺乏有形的组织而表现为自发运动。这一方面因为专制政权不择手段地压制和打击，工人没有条件建立自己的组织；另一方面，恰恰因为不存在有形的组织才使得斗争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群众运动的形式通常都局限在一厂一事的范围内，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很难使他们跨越这一范围进行更广泛的动员。然而，无论是有组织的抗争，还是群众运动，都是斗争的外在形式，真正推动运动前进的是斗争的实际内容。对于老工人而言，他们的斗争内容是分层次的，既有最低要求也有最高目标。

最低要求就是大家通常看到的，表现为经济的内容，反映的是个体生活的要求。诸如“要吃饭，要生存”的口号便是这一目标的表述。这一要求能最广泛地动员群众，也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工人免遭政权的打击。

其次是保护或夺回工厂的斗争，具有反私有化的性质，表达的是一个单位工人集体的共同利益。这一斗争反映的是工人这样的理念：工厂企业是工人们的劳动积累而不是资本家的，是政府做嫁通过官商勾结私分了工人的财产，打碎了工人的饭碗。

再次，工人们的斗争矛头直指当地政府，“保护国有资产”、“惩治腐败分子”等口号便是表达这一层次斗争内容的。如果需要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概念来表述，那么，这一阶段的斗争就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过渡。

（二）文化斗争

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宣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揭露复辟资本主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揭露投降帝国主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批判修正主义的特色资本主义错误理论

（三）政治斗争

最高要求便是政治的并涉及社会制度的要求，2002 年东北一个地级城市辽阳发生的工潮，是在同一个城市由多家工厂联合并有数万工人参加的持续数日

的群众运动，他们打出的主标语“罢免 XXX，解放辽阳市”就表现出了浓厚的政治斗争取向。这说明，工人的斗争一旦超出工厂范围并表现为阶级的行动，便可能向着政治斗争的方向发展。

在一定的地区一定的条件下，工人斗争表现为阶级的联合斗争后，斗争的方向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而不会停留在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自由要求阶段。

革命的政策

- (1) 一切革命派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 (2) 一切爱国者在反对卖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 (3) 全国人民要在反对官僚腐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2011 年 5 月 3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2 日修改

第六篇第三章第五节 问题讨论

第六篇 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革命征程

第三章 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 进行社会主义伟大革命

第五节 问题讨论

一、目前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

有人说：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应该定义为是社会主义已经变质的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

有人说“社会主义已经变质”，是因为“已经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中国社会“非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什么封建主义社会。并非就是说中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因为：第一，“如果中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就不需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了”。第二，“今天的社会仍然是共产党领导，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形式”，“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制度”。

这些人说西方帝国主义“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因此就证明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似乎理由不充分。第一，国际上普遍认为，一九七六年以来，中国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早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持上述观点的人也承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变质”。第二，西方帝国主义对目前的中国社会制度不满的是他们所谓的“一党专制”、“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但并不能因为它是西方帝国主义反对的就能证明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的。

关于目前中国的“四个仍然存在”就非常值得研究了。第一，它们与主张者的“已经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大前提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承认剥削阶级已经在中国占了统治地位，剥削阶级的这种统治地位体现在哪里？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执政的共产党仍然是原来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仍然是中国的指导思想、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仍然是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经济制度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形式呢？第二，决定社会性质的是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所有制。目前中国的社

会性质究竟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归根结底是由这个社会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中国目前占主体地位的的生产关系是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第三，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的国有经济，究竟是社会主义的，还资本主义的？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首先可以肯定：国有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国外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国有经济，那种国有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其次，目前中国的国有经济如果说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证明它与国外的资本主义国有经济有什么区别。一个剥削阶级已经重新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国有经济，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这能说得通吗？第四，中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早已经瓦解，仅仅剩下的一点残余——所谓土地仍然属于生产队集体所有，还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形式吗？

目前的中国社会确实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是由社会主义和平演变而来的，还仍然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痕迹：第一，这个社会虽然是剥削阶级已经重新占统治地位，但是这个国家政权仍然自称是人民政权。第二，这个政权的组织形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变成了全国官员代表大会，抽掉了由人民决策把关的功能”，但仍然保留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名称；“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变成了明星俱乐部，抽掉了为治国安邦出谋划策的功能”，但仍然保留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第三，“党官一体化抽掉了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功能”，但仍然保留了共产党的名称。

有人说：“正是由于这套基本制度丧失了原有功能，社会权力出现了约束真空，才使权力和资本双双达到了为所欲为的登峰造极地步，人类数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伦理全面崩溃，整个社会变成了动物世界。”这些话，如“登峰造极”、“全面崩溃”、“动物世界”等等，是言重了、过头了，但也多少揭露了“这套基本制度”的本质。只是叫人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又要坚持说“这套基本制度”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

其实主张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很清楚：“这套基本制度”在毛泽东时代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也是人民拥护、坚持的。一九七六年以后的，“这套基本制度”逐渐变质，现在已经变成了由官僚资产阶级把持的、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也是人民坚决反对

的。主张者采取偷换概念的方法，抛弃“这套基本制度”的性质、内容，而要人们去维护“这套基本制度”的抽象形式。然而，“这套基本制度”的抽象形式只存在于人们的概念中，并不存在于客观实际中。一些思想不清醒的人，被他这么一绕，就认为：目前的“这套基本制度”是应该拥护的，谁反对它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二、目前中国社会究竟是附庸资本主义，还是二流帝国主义？

当前，在左派中，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属于资本主义形态的共同前提下，具体的分析又存在不同意见。

一种认为，是最坏的附庸半附庸性质的资本主义；

另一种认为，是二流帝国主义。

在前一种意见看来，所谓“最坏的附庸半附庸性质的资本主义”，也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从他们关于主要矛盾、革命性质的意见来看，似乎中国社会又回到了建国前的社会。

商务部统计显示，截至 2010 年 7 月，中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69.8 万家，实际使用外资达 1.05 万亿美元。2010 年前 7 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83.5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65%，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4459 家，同比增长 17.9%。2010 年全年利用外资 900 亿美元……

有统计显示，近 10 年，外资对我国制造业市场控制度在 30%以上；在我国 28 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 21 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已经开放的产业当中，每个产业前 5 名全部是外资企业。外资以并购的形式对我国实施市场控制、股权控制、品牌控制、技术控制，从而影响我国的产业安全。国内很多矿产、粮油加工等诸多上下游企业，外资其实已涉足控制很深，但名义上仍是中资控股。此外，部分产业、行业正在遭受着通过并购形式的外资渗透，这种渗透正在呈几何级数蔓延。

中国的经济增长 74% 依赖出口。

这说明中国经济具有相当大的依附性。但是不能过分夸大目前中国社会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性。世界上难道说有一个能参加“G20”、“G8”、“G2”等等会议

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国家吗?

在后一种意见看来,所谓“二流帝国主义”,也就是新帝国主义。似乎中国社会已经完完全全地成为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意见过分夸大了目前中国社会的向外扩张性。中国向外扩张,认真说来是从二十一世纪才开始的。

根据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0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09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再创新高,连续八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长速度达 54%。2009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 565.3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1.1%,截至 2009 年底,我国共对 177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投资,投资覆盖率达 72.8%。

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领域几乎覆盖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零售业、建筑业和高科技产业等各个领域,并呈现出分布更为广泛的特点。投资范围也从以亚洲国家为主扩大到欧洲、北美和拉美等地,同时投资额均显著上升。截止到 2009 年底,中国 1.2 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 177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直接投资企业 1.3 万家,对外投资累计净额超过 2457 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 1 万亿美元。

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每年的海外投资额定为 120 亿美元左右,5 年海外投资总计 600 亿美元。而实际情况是,2010 年一年的海外投资额即有望在 600 亿美元左右。商务部数据显示,2010 年 1-7 月,中国以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 61 亿美元,占同期投资总额的 22.8%,其中仅仅民营企业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瑞典沃尔沃轿车公司 100% 股权 17.88 亿美元等,就占到金额的近 30%。同时,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在快速增加。1-6 月,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 3.6 倍,达到 6.05 亿美元;对欧盟直接投资 4.06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7.2%。此外,过去近八成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亚洲以及加拿大等国家的格局,已经被打破。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范春永估计,目前中国对外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 1:2 的比重,可望在 2015 年前后升至 1:1。由于目前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成为新的投资动力,同时中国也改变了过去投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中国未来的投资数量和质量有望上新的台阶。受此影响,2013 年海外投资将过千亿美元,存量可望达 5000 亿美元的规模。

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国际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估算,从 1999 年到 2008 年这 1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80.43%。他说:“这个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高于我们 GDP 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外贸的增长速度。”他表示,如果按 30%的增速测算,到 2015 年,我国的年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 3000 多亿美元,到 2018 年,将达到 7000 多亿美元。即使按 10%的增速测算,到 2015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能够达到 1089 亿美元,到 2018 年,每年可以达到 1450 亿美元。卢进勇说:“应当说这个数字也是不小的。”

据他介绍,截止到 2009 年底,我国海外投资的累计存量为 2460 亿美元;截止到 2010 年 6 月底,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已经超过了 1 万亿美元,两者之比是 1:4,这说明我国在海外的投资存量还是没有我们吸引外资的存量数量大。同时,从人均对外投资数额看,上海人均对外直接投资为 50 多美元,北京为 17.4 美元,从人均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还是比较低的。

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对外投资分别所处阶段,据卢进勇分析,处在人均 GDP400~2500 美元第二阶段的有 6 个,占 19.4%;处在 2500~4000 美元第三阶段的有 15 个,占 48.4%;处在 4000 美元以上第四阶段的有 10 个,占 32.3%,即我国处在对外投资加速发展阶段的地区已经达到了 80%左右。他说:“这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发展的阶段。一旦人均 GDP 过了 3000 美元,对外投资你想阻拦也阻拦不了,这是企业自身的要求。”他认为,以后我国对外投资的实力将会进一步提高,对外经济的发展将从以商品输出为主的阶段逐步走向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举的阶段。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10-2012 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认为,中国是 2010 年至 2012 年全球第二大最具潜力的对外投资国,位居美国之后,超过德国、英国、法国。

目前中国的军事实力主要是防御性的,还不足以成为向外经济扩张的有力后盾。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仍然处在发展变化中。

现今的中国对国际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外来资本,具有很大的依附性。但这种依附,不是殖民地依附,而是工业-金融依附、工业-技术依附。同时,它也正在逐步向外扩张,特别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它具有很大的依附性。

现今的中国社会既不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也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社会,而

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中等发达的、对主要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具有相当大的依附性的、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社会。

三、目前中国的执政党究竟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

有人说：

彻底否定就表现在对当今中国共产党基本性质的判断上，坚持认为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完全变了。

如果说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完全变了，那么，毛主席的党建思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也就完全错了，至少是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说共产党已经完全变了，已经彻底没指望了，还要文化大革命这种演习和实战干什么？

不要把共产党和共产党内的什么人完全等同起来，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即使现在这些人全都烂掉，中国仍然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原有的阶级性质，但仍然是共产党。

主张者总算承认：目前，“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原有的阶级性质”。但是他坚持认为：现在的共产党的基本性质还没有完全变。为什么呢？他没有对现在的共产党的基本性质作具体分析，而是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话：如“如果说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完全变了，那么，毛主席的党建思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也就完全错了，至少是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说共产党已经完全变了，已经彻底没指望了，还要文化大革命这种演习和实战干什么？”

“不要把共产党和共产党内的什么人完全等同起来，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即使现在这些人全都烂掉”。

现在的共产党的基本性质是由哪些重要因素组成决定的？

第一，党的指导思想。它的指导思想变了：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制造了一个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为内容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二，党的政治路线。它的基本政治路线变了：抛弃社会主义制度，不搞

阶级斗争，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建立和谐社会。

第三，党的领导机构。它的领导机构中的成员变了：清除了革命派，招纳的是修正主义分子。

第四，党的组成人员。它的党员成分变了：资产阶级分子、思想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大量招纳入党，工人、农民占的比例不断减少。

由此，原来的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真共产党，就变成了具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假共产党。当然，这决不说现在的假共产党内的“现在这些人全都烂掉”了。而且，中国共产党具有近六十年的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修正主义集团想在三十年中把它斩尽杀绝，也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这个党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有点类似：成了个大杂烩，党内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左派，还有国民党右派，还有官僚政客，还有贪官污吏，还有汉奸买办。因此，对这样一个党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这种意见羞羞答答地承认了：现在的这个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执政党已经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至于他说什么“这个党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有点类似”、“对这样一个党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无非是要说这个党内还有人是要革命的，是要搞社会主义的。对于这点：第一，革命派从来不反对这种看法；第二，肯定这一点并不能否定对这个党的性质的认定；第三，对具体人的评价，革命派保留自己的意见，并反对给现职的中央一级的某些领导人带上“社会主义改革派”的帽子。

四、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矛盾、还是两条道路矛盾？

这个问题初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难道说两个阶级的矛盾与两条道路的矛盾能够割裂开来吗？

但是，确实有一种意见认为：从主要矛盾的角度说，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而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第一，这种意见的大前提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只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这个主要矛盾，而不存在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这个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只存在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这个主要矛盾，而不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这个道理是说不通的。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就只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而不存在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这个主要矛盾呢？它的理由无非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就不存在社会主义，何来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但是，请不要忽略：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追求社会主义的阶级、政治势力，它们实实在在地不断地为实现社会主义进行着不懈地斗争，并不断地取得了成果。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只存在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这个主要矛盾，而不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呢？它的理由无非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不存在资产阶级，何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是，实践的经验告诉人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消灭资产阶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初期不发达阶段，只是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仍然存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仍然存在，因此，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也仍然存在。

1957年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毛选》第五卷 第475页）这里说得很清楚：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并不是说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而不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样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那么它们的区别何在呢？就在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化。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就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社会就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资产阶级实现了复辟，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又重新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社会的性质就又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毛主席教导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

性质。

第三，这种意见的小前提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执政党的地位，中国社会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不再重复。现在执政的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现在的中国社会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即假社会主义社会。

五、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还是民族矛盾？

有种观点：美国的侵略已经成为主要危险，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

他们说：现在的社会性质是附庸半附庸资本主义，而不是什么完全的资本主义，因此，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既是阶级矛盾，又是民族矛盾，实质是阶级矛盾，表现为民族矛盾。

分析一下这种观点：

第一，前面已经说过，附庸半附庸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第二，无论是附庸半附庸资本主义，还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甚至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一般来说，在其社会内部，主要矛盾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第三，在殖民地社会，外国帝国主义者成为了社会的直接统治者；在半殖民地社会，外国帝国主义者成为了社会的间接统治者（通过代理人），这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才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化为人民大众与官僚军阀买办阶级的矛盾。

第四，目前，外国帝国主义者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直接或间接统治者了吗？外国帝国主义的军队直接入侵到了中国吗？现在的执政党已经成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了吗？如果没有，怎么能得出：“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样的结论呢？

第五，说这个矛盾既是阶级矛盾，又是民族矛盾，实质是阶级矛盾，表现为民族矛盾。或者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是主要矛盾，两者已经合二为一。这

些观点是站不住的，因为：

其一，对中国人民来说，对广大劳动人民、工人阶级来说，外国的侵略是否已经成为主要危险？民族矛盾是否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判断问题，不能不慎重考虑。如果外国的侵略已经成为主要危险，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革命党人看不见，结果脱离了广大劳动人民，也不能联合一部分与外国侵略者有矛盾的剥削阶级；如果祖国沦陷，劳动人民会更加重一层民族压迫。问题在于：现在的形势，民族矛盾是否上升为主要矛盾？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已经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各自支持一派军阀势力进行混战，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把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而是将主要的斗争矛头对准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北方军阀，联合孙中山的国民党人，发动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作为美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代理人统治了中国，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把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而是毅然决然地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等一系列的武装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步侵占我国的东北、华北大片国土，一九三五年，中国共产党判断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号召开展全民族的抗日救国运动。

当然，在现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许多新的形式——新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实现，不一定要侵占殖民国家的领土，也不一定要推翻该国的不愿完全合作的合法政府，而是更多地采取经济形式，更多地依赖被殖民国家的政府的合作。帝国主义侵略危险的程度，主要表现在本国政府卖国的程度。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必须反对本国的卖国政府和卖国势力。

其二，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天然代理人，它是在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虽然与帝国主义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是，它们为了自身的阶级利益，又依附于帝国主义，带有极大的买办性。现在中国的统治集团就是这样一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集团。在这个集团中，有一部分势力带有更加直接的买办性，更多地依附于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在中国的现行的政治体制下，中国目前这种依附于帝国主义、出卖劳动人民的利益的状况，决不是由某个人或某几个利益集团造成的，而是由整个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造成的。

其三，无论是反帝也好，还是锄奸也好，如果不铲除官僚资产阶级，都只

能是停留在空话上。现在是谁在勾结、投降美国帝国主义？是官僚资产阶级。是谁在保护汉奸买办集团？是官僚资产阶级。只要中国人民推翻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人们成天担心的种植转基因主粮、外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房贷、外资控制我国金融及其他行业等等问题，都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只要中国人民推翻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那些汉奸卖国集团终将被人民审判，得到可耻下场。如果不然，今天反这个、明天反那个，除了造点舆论，一个也反不了。今天锄这个，明天锄那个，一个也锄不掉。尤其可笑的是，有些人居然要联合官僚资产阶级（也就是他们说的修正主义）一起反帝锄奸，还说是扩大爱国统一战线，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其四，所谓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融合为一的论调也是站不住的。

说民族斗争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这是就阶级社会中民族矛盾的政治意义来说的。并不能因此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划等号，也不能把两者融合为一。这里说的民族矛盾特指的是中国与外国的矛盾、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中国与美国帝国主义的矛盾。这是中国外部的矛盾。阶级矛盾是特指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包括官僚资产阶级、民间资产阶级、外来资产阶级等等。这是中国内部的矛盾。解决民族矛盾并不就等于完全解决了阶级矛盾。如果把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就必然要求调整国内的阶级关系，放弃对整个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把斗争的矛头只对准一部分所谓的“汉奸”、“奸相”、“代理人”即“官僚集团”或“买办集团”。

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一方面极力限制、镇压人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又利用人民群众与外国帝国主义的矛盾，煽动民族情绪，转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视线，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民间资产阶级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也有联系，又有较多的矛盾。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不对形势作阶级分析，只是抽象地宣扬爱国主义。一方面可以引起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警惕，加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另一方面，也削弱劳动人民对本国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警惕，放松对国内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反抗。

六、当前的革命的性质究竟是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有人提出“二次革命”论：第一次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目标是打倒官僚资产阶级或权贵资产阶级，任务是夺取政权；第二次革命才是社会主义革命。

当前进行的革命，究竟是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根本政治立场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策略问题。

第一，一个革命的性质是由要解决的生产关系问题、所有制问题决定的。如果一个革命所要消灭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革命的性质就是民主主义的；如果这个革命所要消灭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革命的性质就是社会主义的。

第二，一部分代表民间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他们也打着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权贵资产阶级的旗帜，进行所谓的“民主革命”反对“一党专政”，企图建立不带社会主义、共产党色彩的资产阶级政权、没有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经济。但这只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幻想，如果他们“革命”取得成功，也不过是建立一个更加依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

第三，一部分代表外来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他们也打着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权贵资产阶级的旗帜，进行所谓的“民主革命”反对“一党专政”，其实质是建立另一种更加彻底的依附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权，发展更加附属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经济，更加彻底的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残余。

如果革命的人们也把自己的革命规定为民主革命，不仅在政治上与这些右派划不清界限，而且还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尾巴。

有的人认为：今天的共产党人，还要为党的最低纲领的完全实现而奋斗，这个奋斗仍然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两个内容，一个是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一个是人民民主。这种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目前的中国是完全错误的，它只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不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它只反对买办资产阶级，不反对官僚资产阶级。

对于那些站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没有变、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没有变的立场上的人来说，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革命，需要的只是“民族崛起”、“社会复兴”。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不变，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制度不变，坚持五星红旗的政治格局不变。”

这种政治立场确实不同于革命派，也不同于反革命派，姑且叫它做中间派或者附属派（因为它是附属于执政党的）吧。

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锄奸，还是铲除官僚资产阶级？

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锄奸的人，不仅假设了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的命题，而且假设在执政党内单独存在一个代表外国帝国主义利益的政治派别——西化派或西化卖国集团。

中国执政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全党必须服从中央，不允许成立政治派别。人大、政协、国务院、检察院、军队武警等等各方面的重大工作，都必须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

但是，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中确实存在不同政治色彩的政治人物，实际上代表着资产阶级中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

有人说：现在出卖国家利益的事都是以温家宝为代表的西化派或西化卖国集团干的。

请问：这些重大问题是谁决策的？难道说仅仅是国务院或国务院的某一个领导人、某一个派别、某一个利益集团决定的？

如果说承认在中国存在着一个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那么，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恰好就是中国现在的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而不是执政党中的某一个派别或集团。

官僚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当然有区别。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具有极大的买办性，买办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本身就是官僚，它们相互交错。但是，这终究是资产阶级中的两个不同阶层。官僚资产阶级是掌握国家政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从总体上控制着国家的所有资产。而买办资产阶级是有权与外资企业进行交易并从中谋取暴利的中方人员以及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的外方中籍高级管理人员。现在人们说的作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买办资产阶级，即汉奸，通常是指的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完全投靠帝国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在政治上是最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又与帝国主义相争夺。这种争夺虽然谈不上是什么“民族性进步性”，但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

级可以利用这种争夺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所以，当前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锄奸，而是要铲除整个的官僚资产阶级。

在有些人那里，甚至“反帝锄奸”都成了一句空话，剩下的只有“扩大百姓民权，加强中央集权，约束地方官权，限制外来洋权”。这大概就是智囊们为执政党提供的政治改革路线图吧？

八，是保国，还是重新建国？

国家有两种涵义：一是从政治地理学或抽象的意义来说，国家是具有国际公认而又有相对明确政治边界的某一国土区域，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二是从政治学来说，国家是指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政权是国家的具体化身，也是通常意义上对国家的理解。它是一种拥有治理一个社会的权力的机构，在一定的领土内拥有外部和内部的主权。

有些人经常把两种意义不同的国家混淆在一起。用前一种意义的国家来掩盖、代替后一种意义的国家。

在历史的现阶段，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保卫前一种意义的国家，不许外国侵犯。至于后一种意义的国家，就要加以分析。如果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我们当然要捍卫，如果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我们就要反对。

当前，中国的国家政权已经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机器，国家基本制度再好也改变不了这个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国体问题而不是政体问题，国家的基本制度可以继续保留，以后逐步改革。

我们提出的目标是重建一个崭新的更加美好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国家。要高度发扬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最广泛的民主，这就是要人民群众能真正行使管理权、监督权、选举权、罢免权。要缩小工资级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九，是拚命挽救假共产党，还是重新建立真共产党？

有人提出来：不能对毛主席缔造、历经磨难、多次在九死一生险境中转危

为安的中国共产党完全丧失信心。哪怕是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不应当退党、弃党、打倒党，而应当拚命挽救党。

中国的执政党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这是由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执行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路线决定的。在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中，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社会主义的改革派”。过去的陈云算不上，现在的薄希来更算不上。

这个党的党员中有不少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党员，这也改变不了这个党的资产阶级本质。

把真假共产党分开，把真共产党假共产党这个口号喊出来：我们要代表劳苦大众的真共产党，不要代表贪官污吏资产阶级的假共产党！

所谓拚命挽救党，无非是在假共产党内，期望当权者左转。幻想有一天，经过左派的斗争，召开一个新时期的遵义会议，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就会转变政治立场，重新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

实践证明：八九政治风波以后，新的领导人上台，并且喊出了要搞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不搞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的口号。善良的人们期待着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改变资产阶级的路线。十几年过去了，他们用“三个代表”的思想完完全全地改变了中国，把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十六大以后，又一个新的领导人上台，一开始就去西北坡朝拜，喊出了“两个务必”、“世世代代高举”的口号，善良的人们又期待着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改变资产阶级的路线。善良的左派名人还提出要用“胡温新政”来划分左派与右派。八年又过去了，他们用“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路线，维持了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用“关注民生”勾引起劳动者改善处境的新希望。人们又失望了，通钢工人开展了坚决的斗争，富士康的工人用十 N 跳表达了他们的反抗。在这种形势下，“重庆模式”出来了，十八大即将召开，善良的人们又期待着执政党的中央领导集团改变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善良的左派名人又提出种种左转的预言。只恐怕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既然假共产党不可能转变为真共产党，那就只能重新建立一个真共产党，要建立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的斗争的共产党。

现在的主观条件客观条件都不成熟，不能急于求成。

现在的左派思想上不统一，要求革命的少，期望改良的多；组织上涣散无力，缺少大批骨干。

要做扎实的群众工作，各地方建立各种学习小组，研讨会等，提高群众的觉悟。

有朝一日条件成熟，联系起来就是一个党。

十，如何对待执政党内的干部、党员？

对于那些已经转变政治立场，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拥护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高级干部，应该把他们看作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而不应该把他们看作是“三中全会派”或“官僚资产阶级的左翼”。

对于执政党内的广大干部，只要他清正廉洁、肯为人民办实事的，应该在反对官僚腐败的旗帜下，争取团结他们。只要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汉奸卖国行为，应该在反对卖国主义的旗帜下，争取团结他们。只要他反对错误的改革开放政策，应该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帜下，争取团结他们。

对执政党内的党员，应该进行阶级分析。对于广大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者中的党员，比一般群众受到的修正主义毒害较多一些，但不应该歧视他们，而要更多的争取他们。对于一九七六年以前入党的老党员，受到的毛泽东思想教育比较多，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亲身经历，更应该争取他们参加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列中来。

对于执政党内的“毛派共产党人”应该一分为二。他们中的一些人表示愿意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们坚持认为，中国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变质、剥削阶级已经占据统治地位，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没有变；中国的人民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功能，但是这套基本制度的根本性质没有变；中国共产党已经丧失了阶级性，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领导作用没有变；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主要

任务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这样就可以复兴社会主义、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东方文化；如果说革命，也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不是民间资产阶级，也不是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左翼具有民族性进步性，共产党的上层和主流有许多人都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派，维护国家统一的领导力量，仍然是现在的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反帝锄奸，救党保国”，支持“胡温新政”，要反也只能反温，不能反胡；要充分支持共产党上层的一些重大改革措施，如重庆模式，这些都是共产党左转能力的证明、向毛泽东思想的回归，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复兴。这些观点与革命派的立场存在根本分歧，是革命派决不能赞成的。对于他们积极的一面，革命派将继续支持；对于他们消极的一面，将坚决与之划清界限，并尽量减少它对群众的消极影响。

革命派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但团结不是无原则的。我们的口号是：

一切革命派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一切爱国者在反对卖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要在反对官僚腐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十一，如何对待民间资产阶级？

这个问题涉及到一系列革命的基本问题。

要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

前面说过：

“现今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主要是由两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农民小生产者私有制生产关系组成。因此，现今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

“现时的中国是一个中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它已经掌握了当代许多领域里的先进技术，它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它的经济总量已经占世界的第二位。但按人平均计算，它的许多经济指标仍然处在世界的中下水平。”

要正确认识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

前面说过：

“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性质，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的

阶级结构和主要矛盾，当前中国的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

如果认为当前的革命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那就完全忽视了现今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演变成了完完全全的资本主义社会。

如果认为当前的革命应该是回到过去已经完成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也是忽视了：现今社会是从原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演变成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过去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三）要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

前面说过：

“当前中国社会阶级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重点是同掌握着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

如果不牢牢把握住“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往往就容易搞错革命的性质，迷失革命的大方向。

如果不牢牢把握住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重点是同掌握着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往往就容易在革命的某一阶段，搞错打击的重点对象，忽略可以争取的对象。

（四）要正确认识民企生产关系、民间资产阶级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阶级结构中的地位、作用。

第一，民企生产关系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一种，民间资产阶级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搞垮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第二，在民企生产关系中，资本无偿占有了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力，在民企的社会关系中，工人与资本家处于对立的地位，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两大对抗的阶级。

第三，当前的中国民企是在国家政策的扶植下，是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贸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民间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外国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它们有极大的依赖性。另一方面，中国民企又受到国家垄断

企业、外资企业的压制、排挤，以及腐败官吏的种种压榨，民间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外国资产阶级又有矛盾，有争夺。

第四，民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农民及其他独立劳动者，既是重要原料来源，又是它的产品销售对象。同时，它又经过市场竞争，不平等的交易，实现对农民及其他独立劳动者的剥削。

第五，民企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差别，民间资产阶级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如大的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小的资产阶级。有的民企资本家与外商勾结比较紧密，有的不那么紧密。有的民企资本家与国企勾结比较紧密，有的不那么紧密。有的民企资本家在略夺了劳动人民的财富以后，早已转移到国外或作好了外逃的准备，有的企图在中国发展，成就一番事业。

要正确估计民间资产阶级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

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民间资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当然是革命的对象，而不是革命的动力。但这并不等于说：在任何革命阶段、革命时期，它都将成为革命的打击对象或重点打击对象。

在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阶段或时期，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国土的阶段或时期，民间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有可能作为某种中间势力而存在。其右翼可能成为革命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成为革命的朋友，其中间部分可能成为革命的争取的对象。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对社会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或时期，民间企业将成为改造的重点对象，这种改造仍然可以吸取过去实行限制、利用、改造政策的有益经验，把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绝大多数民间资本家，作为内部矛盾处理，保证他们得到应有的权力和利益。

关键是要对民间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作出正确的阶级分析。

对社会上活动的各个政治代表人物，要对他们的阶级属性作出正确的分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些人绝大多数都只会标榜自己是代表“公众”、“人民”、“社会”，而不会公开承认自己是代表某一部分人，更绝少有人承认是代表某一阶级利益的人。

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根据某个人的一贯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光是贴上一个阶级的标签，不等于就是作出了正确的阶级分析。判定某一个人是代表官僚资产阶级的，还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或是代表民间资产阶级的、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亦或是代表无产阶级的，这需要根据系统的资料，作出全面的分析。

判定了民间资产阶级的某一个政治人物、团体、派别的基本阶级属性以后，还要对他或他们的政治倾向（左的、右的、中间的）及不同时期的变化作出进一步的分析。这样才能决定对他或他们是采取反对、争取或联合的政策。

2011 年 4 月 16 日初稿

2012 年 3 月 22 日修改

2012 年 8 月 11 日再修改